

K295.1  
13  
2:5

# 上海地方史资料

(五)

上海市文史馆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B 419965

---

K295.1  
13  
2:5

# 上海地方史资料

(五)

上海市文史馆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B 419965

---

## 目 录

- 外国人在上海办的报纸……………曹聚仁(1)  
上海国人自办的中文日报……………汪彭年 陈孚卿 钱化佛(11)  
《申报》七十七年大事记(一八七二——一九四九)…徐忍寒(22)  
《新闻报》和《申报》的竞争……………张秋虫(36)  
记《民权报》、《中华民报》和《民国日报》……………李健青(48)  
《商报》琐闻……………张秋虫(66)  
上海小报史料……………平襟亚(70)  
上海报纸琐话……………丁 悚(87)  
记《译报》、《每日译报》……………王季深(91)  
回忆《女声》杂志……………王伊蔚(100)  
旧上海无线广播电台漫话……………冯 皓 吴 敏(112)
- 谈解放前上海的话剧……………高黎痕(124)  
上海职业话剧的起源……………林道源(148)  
上海电影事业话旧……………高黎痕(157)  
旧上海电影业概貌……………姜 豪 张 翼 姜星谷(169)  
爱国影剧家郑正秋……………高黎痕(185)  
上海昆曲集社源流简史……………平襟亚(192)

上海戏园琐话.....	王仲钧	胡仲龄(195)
沪剧的起源.....		葛荫梧(205)
上海早期的西洋画美术教育.....	丁 慷	(208)
近代上海美术组织记略.....	王 端	(212)
忆吴昌硕先生.....	谭少云	(221)
上海早期的讽刺画和漫画家.....	孙 俊	王敦庆(225)
上海的江南丝竹.....		张萍舟(236)

# 外国人在上海办的报纸

曹聚仁

## 一、上海最早的中文报纸《上海新报》

一八四五年，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圈设租界以后，一八五〇年八月三日，亨利·奚安门(Henry Shearman)创办一种英文周刊，叫做《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后来，又出刊了一种日报，名《航务商业日报》(Daily Shipping and Commercial)。到了一八六四年七月一日，改名《字林西报》(North-China Daily News)。这是上海最早的英文报。在《字林西报》前，《北华捷报》曾办了一份中文报纸，名《上海新报》，曾有十二年历史，比《申报》还早十二年，这是上海最早的中文报纸。

《上海新报》发刊于一八六一年(清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下旬，开始是每星期出一次，到了第二年五月七日，改为每周发行三次(逢二、四、六出版)。一八七二年七月二日，改为日报，每日出一张，星期日休刊。该报发刊就用上等白报纸印行，单面印刷，非常讲究。该报篇幅仅及现行报纸的四分之一，高十八英寸，宽十一英寸，作狭长式。

《上海新报》的发刊，意在报导市场消息，以商业为主，因此发刊启事中说：“所有一切国政军情，市俗利弊，生意价格，

船货往来，无所不载”，但把它喂养成长的，却是“战神”。该报创刊时，正当太平军和清军战争最激烈的时期，那时上海租界来了许多长江下游及浙闽等地的殷富之家，上海市场畸形活跃，这些流寓人士，对于军息及乡情非常关心，因此这份洋人办的中文报就为一般人所注意。一八六〇年，太平军夺取了杭州，继又粉碎了清军的江南大营，大军直下东南，进迫上海。清廷勾结洋人，组成洋枪队，助清军攻打太平军，最前锋就在静安寺路跑马厅（今南京西路人民公园）。上海市民十分注意这些战讯，该报所刊“第一等新闻”（即头条新闻）都是从外国人和教会那边得来的。

主编《上海新报》的西籍教士，先后有伍德（M.F. Wood，第一任），傅兰雅（J.Fryer，第二任）和林乐知（Y.J.Allen，第三任），他们都精通中国语文。另有一位中国助编，为董明甫。到了一八六八年二月一日，革新版式，充实内容，改称新第一号，每天一张，高十四英寸，宽二十四英寸，对折为二，两面印刷，共四页，每页各宽十二英寸。内容如次：第一版，告白；第二版，中外新闻，选录香港《近事录》及《香港新报》，选印《广州七日报》，选录《中国教育新报》、《苏省日报》等；第三版，告白、船期表、银行物价表；第四版，银洋物价表、机器图说等。一八七〇年三月二十四日起，每条新闻上均加简明标题，用头号活体排印，本文则用四号字。

这份报纸，曾独霸上海新闻界十年之久，直到一八七二年四月三十日《申报》出版，才碰到了劲敌。

## 二、英文《字林西报》

上海之有《字林西报》，仿佛香港之有《南华早报》，在外国人办的外文报中乃是最有势力的一种。先后执笔于《北华捷报》的报人，如奚安门、马诗门、詹美生、盖德润、海单、巴尔福、李德尔、毕尔、葛林，都是很有名的，该报所载上海开埠后情形，足供治史者的参考。《字林西报》可以说是纯英国风格的报纸，在上海为工部局的喉舌，其言论，常常和我国人民的观念相反，可以看出英国绅士们的意向。直到一九四九年停刊。

《字林西报》馆从前设在汉口路，后来搬到九江路，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七年)搬到外滩十七号，和炙手可热的汇丰银行为邻，代表英国在中国的两股大势力：金融与舆论。《字林西报》发展时期，有一位大众所称的“巴柏叔”(Uncle Bob)是很重要的，他名李德立(Robert Little)，是英侨中的首要人物，做过茶商，也做过上海电力公司秘书和A.D.C.剧团台柱。一八八〇年(光绪六年)任工部局总董。一八八九年以后，任《字林西报》主笔。他爱在黄浦滩边散步，呼吸新鲜空气。那时许多外国资本家，要在滩边造码头，他以工部局总董地位，反对这种损害自然美的企图，在黄浦滩头，保留了一点清静环境。“巴柏叔”乃是上海人所熟悉的一个外国人，他爱好和街头人士闲谈，颇懂得中国人的心理，倒是一种很好的记者风度。

《字林西报》的突飞猛进，和路透社在远东的伸展密切相关，它开头是上海独家采用路透社电讯的英文报纸，因此，别的外文报都不能和它相争。

### 三、开乐凯的《水星》报(文汇报)

一八七五年(光绪元年)英人开乐凯(J.D.Clark)开始对新闻事业发生兴趣。此人生于英国萨福克,十余岁时随意大利加力波从军于欧洲大陆,后来服役于英国海军,再后投身于南美共和国的海军。一八六一年到远东,身经下关鹿儿岛之役。其后六年,倦于海军生活,乃在日本经商,他的好动心理,驱使他到了上海。

那时上海有一家英文晚报,名《上海差报》,名记者费烈德·巴尔福任总编辑。一八七九年,巴尔福应北京同文馆之聘,担任文学教授,《上海差报》预备改夕刊为晨报,开乐凯动了办夜报的雄心。

他的夜报名叫《Mercury》,这个字的含义非常有趣,它可解释为“水星”,又是“商业之神”(见罗马神话),把它当作普通名词用,又可解作“报纸”或“卖报者”。开乐凯又把这份报题了一个中文名称,叫《文汇报》。抗战时期的《文汇报》,便是接上这一报统的中文名而来,也就是今日上海《文汇报》和香港《文汇报》的初源。

英文《文汇报》出版于一八七九年四月十七日(光绪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傍晚。那份准备改为晨刊的《上海差报》受了一激,即打消改晨刊之意,跟《文汇报》竞争起来。结果,还是《文汇报》取得了胜利,到了一八八九年,《上海差报》的馆主将它的招牌和印刷机都出让给《文汇报》。开乐凯对于新闻事业特别有兴趣,他以馆主兼总编辑在上海从事新闻事业四十多年。以他



那么好动的性格，却永久地献身于这一社会事业，也是一件怪事。

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开乐凯年老多病，辞退馆务，改居顾问地位。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六日下午三时，病逝上海，葬在静安寺路外国公墓(今改建为静安公园)。其后八年，一九三〇年，这家晚报，归并给《大美晚报》，因此《大美晚报》英文版名尾上，有“END MERCURY”字样。

一位朋友在一家公寓发现了一份一八八五年八月十日(光绪十一年七月一日)的《文汇报》，才知道这份晚报，也曾刊行过早报，只不知发行了多久。在那张报上有一段有趣的话：“毕林启事：经过多年之熟虑，我已经断定一生中三件最困难的事情：(1)带一把活的鳗鱼，上峻峭的小山而不泻掉一条。(2)扮演一个公正人于一场狗斗时而不发疯。(3)编辑一张报纸，而后者较前两者为尤难。”可见他们毕竟是懂得新闻工作的艰辛的。

#### 四、法文《上海日报》

上海有种种外国人，也有种种租界，大体说来，有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这些租界里外国人都办有自己的外文报纸，即如抗战结束，日军投降，第一个传出这一消息的，乃是当时在法租界出版的一种俄文报。

法国人在上海用法文出版的第一种法文报，叫《上海新闻》(Le Nouvelliste de Changhai)，始于一八七〇年十二月五日(同治九年闰十月十三日)。执笔者比埃，幕后支持者是法租界

公董局，局方决定将每次常会会议录交给《上海新闻》发表。第二年三月间，一位年老的巴黎天文台助理员，名兰壁茜，到东方来任北京同文馆教授，在上海创办一种法文报，叫《进步》(Le Progress)。他有意和《上海新闻》对立，一年后，即一八七二年一月，《进步》、《上海新闻》相继停刊。

接在《上海新闻》之后，法国人曾出过一种《上海差报》(Le Courrier de Changhai)的周刊，只出了三期。到一八八六年(光绪十二年)，又有法文的《上海回声报》(L'Echo de Changhai)出版，出了十个月停刊。其间停了十多年，到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才有《中国差报》(Le Courrier de Chine)出现。馆址在福州路，并不在法租界。主笔是卡史退拉和雷墨尔。那年九月间，《中国差报》改名《中国通信》(Le Messenger de Chine)，由雷墨尔独任主笔，到一八九七年四月间，改为日报。那年七月间，由法国三德堂(三德堂乃是天主教神父的资产总机构)收买，改名为《中法新汇报》。

这份《中法新汇报》，主要是宗教性的宣传刊物，他们丢开了国际性和地方性的新闻，只留着宗教性的新闻。慢慢地政治性新闻走进这份报纸，而教育掌权者一直不欢喜这一性质的转变，他们认为混合着政治和宗教，乃是一件困难多而不容易讨好的事。于是，经过了长时期冲突，乃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十日停刊。

在上海的法国侨民迫切需要一份不含宗教内容的新报纸。于是，法国旅华商会组成另一报业公司，派黄德乐到巴黎去物色一位受过新闻学训练的助手，他们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间回

到上海，创办了法文《上海日报》(Le Journal de Changhai)。在短短几年之中，这份报纸在远东的法国人中建立了崇高的地位。一九二九年，它的销数只有三百五十份，到一九三四年，便每天出版两大张至四大张，销到二千份以上。马利赛和助理主笔乐伦司的才能是不错的。黄德乐原为《小巴黎人报》的远东通讯员，《上海日报》创办以后，乃由马利赛任主笔。这份报纸有一句口号是：“增进良善的意念与健全的意念。”

### 五、上海早期出现的日文报

《上海新报》是上海最早出版的一家日文报纸，系一八九〇年(光绪十六年)六月五日由松野平三郎组织的修文书馆创刊，每周一期，每份定价十钱。其次是一八九二年由上海日本青年会创办的《上海时报》。这两份日文报均属短命，发行不到一年就先后停刊。

接着，乍浦路共同活版所发刊的《上海周报》出版，内容侧重日中贸易交往，介绍上海商界情况。还有《佛门日报》，主笔为佐野则吾，以宣扬佛教为主旨。

杉尾胜三于一九〇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复刊《上海新报》周刊，又于次年三月十六日易名《上海日报》，是一张相当老牌的日文报纸。宫地贯道于一九一四年十月一日创刊《上海日日新闻》，报道中国政局内幕及经济事务。以上海日本证券交易所为后台的《上海经济新闻》，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创刊，以经济纪事详尽为特色，一九二四年十月改名为《上海每日新闻》。

这是上海早期出现的一些日文报纸的大概情况，其目的在刺探我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各方面的情报。它如在北平、天津、青岛、济南、大连、沈阳、长春、滨江（即哈尔滨）、汉口、福州、广州以及香港等地，均有日本人办的日文报，有日报，有隔日刊、半周刊、周刊。其中最早为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大连创刊的《辽东新报》日刊，但较《上海新报》迟了十五年才出版。甚至在东北的抚顺、营口、安东、铁岭等一些中小城市也有日文报出版，这大概是同当年他们的侵略阴谋相配合的。

此外，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毕业生波多博，于一九一四年在上海自办东方通讯社，专门搜集中国的消息，以宣传所谓东亚主义，并于一九二〇年开始向中国报纸发华文稿，实行其所谓“在中国表示东京的意见”的使命。

（此节由任尧嘉补写）

## 六、路透社在上海

路透社在旧中国设立了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汉口、滨江及香港七个分社。上海分社是远东总经理办事处所在，为路透社八区之一。

路透社在中国的活动始于一八七二年，那时由伦敦总社派科林兹(Henry W.Collins)到上海组织远东路透社分社，其主要目的在搜集有关中国的情报，供应给总社，趁便向上海的一张权威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发稿，这对于《字林西报》是一种独特的权利。因此，《字林西报》在路透社电讯下，写明“本报专稿”

字样，英文为“Supplied Solely to The N.C. Daily News”。这对于上海其他外文报是极大的痛苦，任何外文报都难于和《字林西报》竞争。

到一九〇〇年，上海有《字林西报》、《益新西报》(Shanghai Daily Press)、《捷报》和《文汇西报》(China Gazette and Shanghai Mercury)四家英文日报，《字林西报》和《益新西报》系晨刊，《捷报》和《文汇西报》为夕刊。《字林西报》既有工部局的资助，又得路透社的专用电讯，其他外文报便积愤不能忍。先由《文汇西报》出面挑衅，每天把《字林西报》的路透社电转载过来，而且注明转载字样。《字林西报》便以侵犯版权罪起诉，结果这场官司《文汇西报》打输了。《文汇西报》总董开乐凯就拿这件讼案向路透社办交涉，打破了《字林西报》的路透电在上海的垄断权，实际上倒是《文汇西报》打胜了。路透社便让上海各西报获得平等供应权，不过《字林西报》还保持一部分路透专稿。《字林西报》曾刊行过一种汉文的《字林沪报》，路透社电讯的译载，比其他上海报纸早一天，但那时看报的不十分留意国际新闻，《字林沪报》销数也并不好。

到了一九一一年，上海路透社才向上海华文报纸发稿，那是上海路透社总主笔科克司(M. J. Cox)决定的。那年秋天，中国报纸订用路透社电讯稿的共有十八家。到了一九三一年，沈阳事变以后，中央社发展得有点规模了，路透社才把对中国的新闻发播，由中央社转发。中央社和路透社订立了新闻交换合同，由路透社代表邓尔勤、张士乐两氏和中央社代表程天放、陈布雷两氏，在南京国际联欢社签约。

赵敏恒任路透社南京特派员很久，他曾在回忆录中说：“上海路透社外籍职员厕所门口，写明‘华人不得入内’，这个歧视中国人的恶例，被我打破了。外滩上海俱乐部，可以说是帝国主义大本营，从来没有中国来宾；科克司有一天请我去吃饭，我在大厅里签名簿上写了我的名字，据说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可见当年外国人在上海的声势。

（邓珂云 整理）

## 上海国人自办的中文日报

汪彭年 陈孚卿 钱化佛

### 一、《汇报》及《彙报》、《益报》

《汇报》为上海华人自办最早之报，创刊于一八七四年六月（同治十三年五月），是最早留美学生容闳集资开办。当时华人在租界办报，言论殊不自由，容延英人葛理（Grey）为总主笔，黄子韩、贾季良为编辑，适英商怡和洋行强筑吴淞铁路，先开工造江湾段，清政府与人民同起反对，《申报》著论赞助怡和，《汇报》则攻击之，英当局欲为难该报，容氏遂于九月一日宣言，由英人葛理承顶，改名《彙报》，延管才叔为主笔，仍与《申报》对立，凡申报不利于中国的记载或论著，即与反攻。后因经济关系加股，于一八七五年七月改组为《益报》，换朱莲生为主笔。半年后，朱因故辞去，报亦停办。

### 二、《中外日报》及《时务日报》

汪康年主办的《中外日报》由强学会而来。强学会系文廷式、汪康年、黄遵宪、岑春萱、陈宝琛等组立于北京，时在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后康有为、梁启超加入。他们因受中日战争的刺激，主张变法，并在上海设分会，发行《强学报》，

日出一册，不取报费，风行一时。未几文廷式被参革职，强学会被封，上海分会也被取消，改为时务报馆，《时务报》于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发刊于上海，汪康年为经理，梁启超为主笔，月出三册，提倡维新，销行甚广。复因该报系旬刊，注重论文译著，又由汪另出《时务日报》，于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刊行。该报革新编辑与印刷，成为当时比较新的日报。六月间，四明公所血案起，该报加发传单，法领事下令禁止该报在租界内出售。同月，清廷下令将《时务报》改为官办，因此《时务日报》即改为《中外日报》，由汪仲阁为经理，叶浩吾为主笔。后《中外日报》因经济拮据便于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接受上海道蔡乃煌的津贴。蔡派沈仲赫到馆监督，馆内编辑反对，汪遂将报产全部售与蔡。未及两年，蔡去，无人负责，另行改组，名《中外报》，终因不能支持，停办。

### 三、《苏报》及《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

《苏报》于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由胡璋（铁梅）创办。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售与陈范。陈为江西铅山县知事，因教案落职，愤而来沪办报，先言维新，继趋革命，延吴稚晖、汪文溥、章士钊等为主笔。吴与章炳麟、蔡子民等组织光复会，从事革命，会员有徐锡麟、马宗汉、陈伯平、秋瑾等，鼓吹革命，即以《苏报》为大本营。一九〇三年七月，《苏报》因苏报案被封。一九〇三年八月，又由该报同人组一《国民日日报》，用西人高茂尔（A. Comell）顶名，主笔为连横（慕秦）。报之宗旨与《苏报》无异，且规模扩大，攻击清廷官吏不遗余力。刊附刊《黑



暗世界》及《南渡录演义》，揭露清朝统治下中国社会的腐朽黑暗，鼓动国民进行革命。上海道袁树勋向江督魏光燾建议，禁止该报对外销行，魏即通知长江一带各督抚一体示禁，并咨部令邮局停止该报邮寄，但当时邮路不普遍，邮件多由民信局递寄，该报照旧向外埠发行，后因内部发生意见，停刊。

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冬，蔡子民为承继《苏报》及《国民日报》，创立《警钟日报》，李春波为经理，刘师培为主笔。发行至第二年春，该报登一来函，内述钱良南下为清廷搜括等情，上海道袁树勋即令公共租界会审员关炯之出票拘人，关谓须有领袖领事信方可执行，旋由袁与领袖德领事交涉，由德领事致函会审公廨，谓《警钟日报》污蔑中国皇太后、皇上，应即拘办。关即出票派捕至该报发行、编辑两所，捕去戴普鹤、王信生、徐士芬、何少卿、朱存仁五人，并将两所发封，经两堂会审，判决戴系司报发行，押西牢一年半，何系校对，押西牢半年，王、徐、朱开释，印刷机充公，《警钟日报》就此停办。

#### 四、《时 报》

《时报》创刊于一九〇四年六月(光绪三十年四月)，主持者为狄葆贤(楚清)。他曾与唐才常在沪组织中国独立协会。义和团起事，外兵占领北京，狄又邀各省在沪名人在张园开会，组织国会，推容闳、严复为正副议长，唐才常为总干事，以为对外民意机关。后因唐在汉口运动失败，狄遂在沪办新闻事业，延请陈冷为主笔，鼓吹变法维新，并注意教育，出《教育周刊》，为教育界所喜阅。报中小说，由包天笑担任，亦受大多数人欢

迎。狄精于书画鉴别，在报馆内设一有正书局。专以彩色摹印古今名人书画，风行一时，旋自建新屋于望平街口，屋成，狄病。一九二〇年，狄将《时报》财产全部售与黄伯惠(承恩)。黄富有资财，于一九二七年，购进德国四色转轮机，注重形式的美观制彩色铜板，报头上字印红色。对于内容，为避招是非，删除社论，只载社会新闻，终致销路低落，停办。

### 五、《神州日报》

《神州日报》始于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由于右任、汪彭年等创办，主笔杨笃生，以革命为职志，未几另组报馆离去，杨去英留学，报务悉由汪彭年主持。汪本革命精神，一方面宣传主义，一方面抨击清廷，旋与《民呼日报》相唱和。是时上海报纸慑于清廷淫威及鉴于《苏报》、《警钟报》之覆辙，更抱明哲保身主义，对于革命绝不敢言，只有该报不畏强暴，大声疾呼革命，因此深得人心，销路大增，几为上海各日报冠。一九〇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宣统元年三月三日)，上海发生印捕强奸华女事，各报皆略而不详，该报却大事记实，力揭其恶，公共租界出而干涉，控之于会审公堂。

控诉原因，先是辜鸿铭受江督派充浚黄浦局总办，查出工程处英人等多方舞弊，辜尽为揭出，以英文写送《字林西报》与《泰晤士报》，两报不肯刊载，辜改用中文送《神州日报》，该报一一为之披露，英人恨甚。适《神州日报》著论攻击印捕，论内有“这作恶多端之污秽印奴，应逐出上海，凡我华人皆不雇用这印奴”等语。工部局即假此指《神州日报》扰乱社会秩序，侮

辱全体印人，工部局总办麦克伦出面，以刑事向会审公堂起诉。当即由捕房将《神州日报》负责人汪彭年传去，押及一日未放，后由律师出争，以案未定讞捕房不能任意将人押禁，时当黎黄氏案大闹公堂后，捕房亦不敢再行越法，遂交保待审。

汪出捕房后，有比利时人杜孟书，持麦克伦所写华文更正道歉书交汪，据云照书登载，麦可撤消诉讼。文中写有“印度人亦是同胞，不应加以侮辱，更不应扰乱秩序，号召华人不佣印人，特为更正道歉”等语。文稿由麦克伦亲笔签名，汪拒绝刊登，将道歉书收下，并商诸辜鸿铭。辜愤甚，怂恿到公堂反抗，并为《神州日报》请前上海英国法庭审判官，现为皇家律师的德格来斯出为辩护。德任审判官时，曾因与工部局冲突辞职，经辜接洽，允为出力。斯时上海各日报皆为《神州日报》不平，同起组织一日报公会，援助《神州日报》，并公请英人爱立斯律师出庭为神州辩护。

会审公堂开审，由英领事与中国会审员宝颐会审，此案轰动上海，到堂旁听的人挤满内外。先由英领事令原告麦克伦陈述，麦即依诉状说明，内中要点，一为侮辱印人为奴隶，二为号召华人不佣印人，并驱逐出境，有犯刑法，请将《神州日报》负责人处罪，报馆查封。麦说毕，德格来斯即起立问麦：“你懂得中文奴字字义否？”麦答：“懂。”德又问：“中国自古所称匈奴、倭奴，这个奴字作何解？”麦不答。德云：“此奴字是又一种人之称，印度为另一种人，是不错的，你不明中文奴字各种用法，强指印奴说是侮辱印人是奴隶，加人以罪，此是诬告。”德格来斯又问麦克伦：“居留上海印人，在近半年内犯多少刑事案？”

麦答不知。德云：“你为工部局主持人，对于地方治安并不注意，却说他人扰乱治安，殊觉为你愧。我告诉你，此半年中印人犯刑事六百余案，占印人在沪的人数五分之一，如此情形，如何不引起沪上居民反对。况《神州日报》所说污秽之印奴，华人不雇佣，当逐之出境，乃指不好的印人，并非说所有印人不分好恶一齐不佣，一齐逐出。你们工部局开董事会，曾有董事某某说过印度人在沪作恶多端，应遣之出境，此皆有案可稽。你能说董事说了无罪，他人说了就犯刑法吗？工部局对《神州日报》所起之诉，不能成立。”爱立斯继德起立说，印人在沪作恶多端，此次印捕又强奸华女，居沪华人同起公愤，《神州日报》代表民意指责作恶的印人，是正当的。我代表上海日报公会出庭，为《神州日报》辩护。

爱律师说毕，德律师即将麦交《神州日报》道歉书文稿陈堂，并诘问麦：“印度系英国属地，我问你对印人认为同胞否？”麦不答。德又说：“你尚不认印人为同胞，却要华人认印人为同胞，直是侮辱华人，你为工部局总办，《神州日报》在尔管辖范围内，你以权力强迫神州尽不应尽的义务，刊载道歉书，是为英法所不许。麦为英人，应该堂上依英法处置。”

被告律师辩护毕，英领与中国会审员略商几句，即宣布判决：“工部局麦克伦对《神州日报》所诉刑事案，理由不充足，撤销。麦克伦强迫该报登载道歉书是违法的，今与警告，下次不可。”案就如此结束，此案继黎黄氏大闹公堂案后，为华人反帝斗争案之一，该报销数也因此骤增。斯时上海日报销数最多的不过七千，而《神州日报》销达一万以上。

辛亥武昌革命，该报于起义第二日，著一论文，首两句即云，“天佑我汉，胡运告终。”《神州日报》由于大量刊登各地起义新闻，日出传单多次，索阅传单者，望平街途为之塞。袁世凯称帝，事尚在秘密运动中，各报皆不知，而该报即于民国三年间，登载北京通信《辟帝谣》，以揭发其隐。迨至民国四年，该报主持人汪彭年在京时，帝制派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派警察多人，将汪之南横街住屋包围，禁汪外出，并将该报驻京记者何雯拘禁于军警执法处。时延两周，由袁之亲信袁乃宽派袁之秘书沈兆祉对汪明言，警察围禁，是因为你在《神州日报》上反对帝制，你将报让出，可放你回沪，否则有生命危险。汪被逼，觅保回沪，将《神州日报》交与孙钟、王太甦接办。从此风景不殊，河山顿异，神州之名虽存，神州之精神已失，以前受人欢迎者，一变而被唾弃。民国五年六月袁世凯死，孙、王难以立足，交与钱芥尘承顶，钱支持一载，又由余大雄接办。因大势已去，余也无法挽回。即于馆内另出一个三日刊《晶报》，除单独发行外，更随《神州日报》附送。《晶报》在小型报中颇有销路，而《神州日报》仍一蹶不振，延至一九二七年春，遂全部让与蒋裕泉，改组为《国民日报》，办至四月，国民党清党事起，停刊。

## 六、《时事新报》

《时事新报》由商人集资，于一九〇七年十二月（光绪三十三年冬）创立，内容平常。至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延请汪仲闿主持，大加扩充，但营业仍不发达。入民国后，与梁启超

联络，成为进步党的机关报。袁世凯称帝，该报曾力加反对，被袁政府停止邮递。袁死黎出，始复邮权。一九一八年三月四日起该报增出《学灯》副刊，由宗白华、郑振铎等编辑，颇受学界欢迎。该报先属于梁启超系，继又与政学系结合，致迷政治方向，遂于一九二七年八月，改让合记公司承项。该报共办了二十年，耗资六十余万，虽竭力支持，终是不振。

### 七、《民呼日报》及《民吁日报》、《民立报》

《民呼日报》为于右任所办。于是陕西人，因作诗触忌清庭，不容于陕中清吏，避而来沪，和汪彭年等创办《神州日报》，后离神州。加入同盟会，组织一《须弥日报》，由其乡人李秉直主持，旋于一九〇九年五月十五日，另办《民呼日报》，自主持之，力攻清吏，招上海道忌。适《民呼日报》馆代收陕甘赈款，上海道蔡乃煌遂假此诬以吞没，飭令会审公堂拘究。八月二日捕房即将于拘去，押狱四十余日，审无实据，判于驱逐出境，报馆发封，该报共发行九十三日。

于出狱后，走日本，未几返沪，续办《民吁日报》，由谈善吾出面，并请法人博士律师以法商名义，在法领事署注册。该报著论攻击日本，驻沪日领松岗于十一月初照会上海道，说《民吁日报》连日所登论文，有伤中日感情，应请传究。上海道因该报为法商，无权过问，遂一面商请法领撤销注册，一面飭知会审公廨禁阻，该报不受禁阻，照旧攻击，日领即面请沪道严办，沪道允之，商妥领袖领事，札行会审公廨云：“《民吁日报》所登，《买日货者看看》及《论中国之危机》、《锦齐铁道与远东和

平》等文，漫骂日人，有意造谣，着即发封传讯。该报即于十一月十九日被封，编撰范鸿仙被传，订期会审，事后民众不平，在该馆门首及城内南市大街口等处粘贴揭帖，痛言封报缘由，并指责沪道。沪道出示云：“《民吁日报》挑动中日衅隙，损害两国邦交，既为日本领事所持，故飭令封禁。”旋会审员宝颐会商日领，判将《民吁日报》永远停止出版，所有主笔免于深究完案。该报出版日期比《民吁日报》尤短，仅四十八日。

于又于次年九月办一《民立报》，执笔者宋教仁、徐血儿、范鸿仙、杨千里等。报之主张虽仍急进，但论文多以学理为根据，唤起国民同情革命，力除叫嚣之气，销路甚广。入民国后，宋教仁被应桂馨、武士英暗杀，于又奔走政治，报事完全托给范鸿仙。时当赣宁之役后，迫于经济停办。

#### 八、《亚细亚报》

《亚细亚报》，薛大可办，主笔刘竺佛。薛系受北京筹安会之命，派到上海设言论机关，鼓吹帝制。报于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九月出版。在出版前，上海各报已揭载薛之背景，即以“君主之敌”、“中国公民一份子”等名称写信给薛，谓如出版鼓吹帝制的报纸，必以激烈手段对付。该报第一号即暴露真相，第二日（九月十二日）下午七时，有人在望平街十一号该报门首，掷一炸弹，死华捕一，路人两，受伤的十余人。该报并不停刊，且挟政府之力，要求当局严办。十二月十七日下午九时，又有炸弹从二层楼窗口飞入，炸毁临街之玻璃窗及桌椅器具等，主笔刘竺佛几被炸死。该报附近商店，以两次发生炸

彈，不但害及營業，且有生命之危險，遂邀同房主呈請會審公堂，限之星期遷移。該報因無處可遷，並知民意可畏，即自動停刊。上海日報受民力壓迫停刊，此是特有的。

### 九、《民國日報》

《民國日報》是陳其美(英士)於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創办的，主持者為邵力子、葉楚傖。發刊後三個多月，陳被人暗殺，報事遂由邵、葉完全擔任。時當軍閥橫行，報雖稱為國民黨機關報，而國民黨在經濟上絕無援助，邵、葉艱苦支持，迨至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中山先生建總統府於廣州，遂撥款資助，為其添置較精良的印刷器具，遷報館至適宜發行的山東路，大事擴充。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邵力子參與黨務赴粵，交葉獨力支持。嗣葉又往廣州，報即由同人維持。迨至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夏，由於該報接近黨內西山會議派，粵政府否認它為國民黨機關報，斷絕接濟。這時北伐軍興，該報為孫傳芳所忌，於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一月自動停刊。至三月間，國民革命軍克復上海，該報復刊，國民黨上海市黨部把它作為黨的機關報，隸南京中央宣傳部。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日，日本浪人焚毀引翔港三友實業社，該報詳細加以報道，涉及日本海軍陸戰隊，陸戰隊本部於二十二日派中尉土山廣端持通牒式之公函到館，函云：“貴報本月廿一日發行第二張‘日浪人藉陸戰隊掩護’之記事，全與事實相違，故意破壞本陸戰隊名譽，於此對貴主筆嚴然要求下列四項：(一)主筆來隊提出公文陳謝；(二)揭載半張大的謝罪文；



(三)保证将来不再发生此种事情；(四)罢免直接责任记者。以二十三日午前五时为限，要求答复，若不承认，莫怪也。昭和七年正月二十二日午后五时，日本海军陆战队。”次日，日侨开完居留民会后，蜂拥到该馆捣乱。因事先有戒备，未被捣毁，而日兵压境，形势日益严重，迄二十六日下午，工部局通知该报云：“现因本埠形势紧张，工部局董事会，劝告贵报停版。”同时即有武装西印捕，将报馆封闭，报遂停刊。及至一九三二年（民国二十一年），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傖在沪设《民报》，由胡朴安主持，即是继承《民国日报》的。

# 《申报》七十七年大事记

(一八七二——一九四九)

徐 忍 寒

《申报》于一八七一年(同治十年)开始筹备,自一八七二年四月三十日(同治十一年壬申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出版创刊第一号,至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第二万五千五百九十九号停刊,历时七十七年零二十六天。

其中一八七二年至一八八九年,计历十七年,由创办人安纳斯脱·美查(Ernest Major)主持。一八八九年至一九〇七年,计历十八年,由美查公司英人董事兼大班埃波诺脱(E.O. Abuthnot,又译阿柏拿)代理主持。以上两期,共历三十五年,均由英国人主持,是为《申报》幼年时代。

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丁未)五月三十一日,至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十月二十日,由席裕福(字子佩)与英人订约,收回自办,计历五年半。报纸内容稍有革新,日销数增至一万份,营业略有进展,是为《申报》成长时代。

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三四年,计历二十二年,由史量才接办,发扬光大,朝气蓬勃,是为《申报》的黄金时代。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九年,计历十四年半,从史君遇害至上海解放,中间被日伪及国民党两度劫持,是《申报》黯淡多事

时代。

在此七十七年中，世界形势和中国、上海的局势，不断发生重大变化，这些都与《申报》息息相关。例如：世界方面有两次世界大战，巴黎和会，十月革命等等。本国方面有甲申中法之战，甲午中日之战，戊戌政变，庚子八国联军，辛亥革命，日本二十一条，洪宪称帝，五四运动，省港大罢工，十年内战，“九·一八”事件，西安事变，“七·七”事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等。上海方面有四明公所案件，大闹公堂案件，抵制美货运动，宋教仁案，齐卢战争，“六·三”纪念，五卅惨案，“一·二八”和“八·一三”抗战，上海解放，等等。《申报》本身方面，则有美查创办，重印《古今图书集成》，美查回国改组公司，席子佩收回，史量才接办，史量才遇害，五十周年、六十周年、七十周年纪念等重大事件。因此，《申报》七十七年的历史，实为中国和上海近百年史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笔者出生较后《申报》诞生二十五年，在《申报》任职短暂，仅于民初工作八年，加以职位低微，未参机密。现据文献资料，参以见闻，率尔操觚，难免误漏。

一八七一年五月十九日 英人安纳斯脱和他的朋友伍华德(C. Woodward)、濮兰幽(W.B.Pryer)、华绮楼(Jhon Wachil or)签订一份合同，四人各出规银四百两，合办一张华文报纸，即为《申报》。

一八七二年四月三十日(清同治十一年壬申三月二十三日)《申报》诞生，由美查主持馆务，馆址设在汉口路(江西路河南路之间)。初系两日刊，隔天出版一次，单面印毛太纸一张，分成八版，每版高阔均约二十公分。新闻用四号字，广告用五号

字。报价零售钱八文。

**一八七二年五月七日** 《申报》第五号改为每天出版，星期日停刊。当时先后主笔政者为蒋芷湘、钱昕伯、黄协坝(式权)，襄理笔政者为蔡宠九、蔡支佛、胡桂笙、姚竹君、沈饱山、张筱轩、钱明略、赖慧生、刘鹤白、金剑花、雷君曜、赵孟逸、潘正卿、黄宪生、沈寅阶。总理译务者为葡萄牙人毕礼纳，副董筠孙；总司会计者为赵逸如、席子眉，子眉死，其弟子佩继之。

**一八七五年至一八九四年(光绪元年至二十年)** 《申报》用铅制活字，仿乾隆《聚珍版丛书》排印新著及旧书，也称《聚珍版丛书》，先后刊印一百六十余种，颇为当时文人学者所重视。

**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八月间** 创设《瀛寰画报》，登载世界时事风俗图说，为不定期刊物，由英国名画师绘画，蔡尔康加以说明，共出五卷，为吾国画报之鼻祖。

**一八七九年四月二十七日起** 《申报》星期日不停刊，照常出版。

**一八八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上海天津间电报建设完成，《申报》天津访员遵照美查预嘱，即用电报传送当天清廷谕旨，第二天在报上刊出。中国新闻界用电报传送新闻，这是第一次。

**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四月** 石印《点石斋画报》创刊，计图八页，售洋三分，用图画代替文字传播新闻，深入广大民众，极受读者欢迎。

**一八八五年至一八八八年(光绪十一年至十四年)** 《申报》经营的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将一千六百二十八册的《古今图书集成》用活字版印行，历时四载，当时西人称为《康熙百科全

书》，此版本称为美查版。

一八八九年（光绪十五年）美查忽动思乡之念，于是将所经营的事业，包括江苏药水厂、燧昌火柴厂、申报馆、申昌书局及申报馆房屋基地等改组为美查兄弟有限公司，资产共计为三十万两，同时招收外股，美查收回原有资本，折成两千股，航海返国。公司事务改由董事埃波诺脱（E.O.Abutnot）、麦边、麦根治、梁金治四人及经理芬林主持，其时国人已获得美查公司一部分股权，所以梁君也列为四董事之一。

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公司大班为埃波诺脱，翻译为葡萄牙人毕礼纳，华经理仍为席子眉，主笔为黄式权、金剑花、赵孟遴。馆中办事权限，营业部由席君主持，编辑部由黄君主持，而全馆总权，操诸英大班之手。惟大班不谙华语，遇馆事有所商酌均由毕礼纳传译，由毕沟通中外联络上下。此时报纸之内容及形式，无甚改进，每日销数约在七八千份之谱。

此时《新闻报》与《申报》角逐争雄，阅《申报》者以官绅为多，阅《新闻报》者以商人为多。《申报》首重论说，论说之后为上谕或官门抄，继之为各省各埠新闻，择其较重要者另行标题，末为本埠新闻。其时尚无专电名词，只有由电局传递之上谕，此外如各省兵变、大灾或大员出缺等，闻由访员发电报告。总共拼三版，余皆广告。春秋两季赛马之胜负，与夫各处考试之题目，皆随到随登，乡会试金榜，尤须快着先鞭。每届江浙发榜时，同人翻译电报，必竭全夜之力，翌日报纸销数之旺较诸平日可增三分之一。良因时人重视科名，报纸为营业计，必须迎合社会心理，故不惜糜金钱耗精神以争之。凡此状况，历久不变。

我国自庚子义和团起事后，新政勃兴，上海一埠增添之报纸，如《时报》、《中外日报》等，乘时崛起，各树一帜，精神形式力求更新。而《申报》固步自封，不思适应社会趋向，因此销数一落千丈，公司大班深恐营业失败，急谋改弦更张。

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四日 《申报》进入一万号。是日评论题目为《本报第一万号》，中云：“所望中国惩前毖后，竭力维新，有利皆兴，无废不举。”此后《申报》稍自振作，渐图改进。

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年底 全馆干部人员讨论了两日两夜，议定了改革的办法，推举金剑花总其成，添聘张蕴和专任论著，力谋革新。当时张弟叔通，已先在《申报》担任论著，相得益彰。

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初三日 《申报》论说改变一贯持重作风，为康梁翻案，阅者耳目一新，大为欢迎。至于新闻方面，尤竭力整顿，不惜巨金，函请北京及各省机关中人担任重要访稿。专电络绎，消息灵通。更向外商等处觅取秘要文件，次第披露。时适沪宁铁路酿借款风潮，其暗幕中秘密档案均在《申报》一一宣布，局中人见之非常惊奇。本埠各机关各公署均有特约访员，刺探机要。又多译东西各报关于中国之记载评论，作为参考借鉴。任译员者为颜仲珊、严诒庭、陆达权。从前报务至傍晚已告竣事，至此则事逾午夜，编辑房犹人影憧憧，下笔如春蚕之食叶。盖环境大变，客观形势逼人，不得不迎头急赶，力争上游。其他换纸张，增篇幅，改行款，加圈点，用符号等，凡形式上可以改观者，无不千方百计设法改进，苦

干巧干，精益求精。维时担任撰著者，除上述诸人外，又得沈景贤君为助。沈君思想高超，识见广远，文笔精警，洵为报界英俊人才。如论铁路、论米禁诸篇，读者无不动容。以是未及数月，社会上对于《申报》之革新、相顾惊奇，声誉鹊起，销数增至一万以上。继往开来，重要关键，实由于是年之改组。

**一九〇五年迄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 为《申报》逐步发展时代。其间如江都王毓仁，宝应刘申叔，吴县杨千里，青浦张继斋，上海孙玉声，嘉定黄虞孙、黄久之，皆曾任《申报》短期撰著，而始终辛苦维持，绝不稍形懈怠者，惟金剑花、雷君曜、张蕴和等数人而已。

**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丁未）春** 由席裕福与英人订约，将《申报》收回自办，上距美查创办，历时已三十五年。张蕴和纪其经过云：“青浦金君剑华，松江雷君君曜，迎合新潮，继黄式权君总持笔政。又以公司大班虽于中国政情隔膜，不大干涉，然以一国之言论机关而为外人所左右，不能自由独立，则甚危险。乃力促华经理席子佩君，向西人交涉收回。公司大班商之于各董事，允以七万五千元之代价，将申报馆全部产业让与华人，即由席君与之订约，《申报》至是始完全入于吾华人之手。”金、雷两君旋亦离馆，张君继主笔政。

**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戊申）** 美查在英病故，享年七十有九。《申报》三月二十八日接到电耗，在三月二十九日的封面报端，刊一“报馆开幕伟人美查事略”，以志哀悼。

**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 因新闻拥挤，各种重要长件未能登载，于每星期日，特出一种周报，名曰《新申报》，以补《申

报》之不足。

**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申报创刊《自由谈》，由王钝根编辑[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三月十八日起，由吴觉迷编辑。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四月一日起，由姚鹑雏编辑。姚氏任期内，内容偏重文艺，多载南社同人诗词。一九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起，由天虚我生(陈蝶仙)编辑，刊载家庭常识。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四月一日起，由周瘦鹃编辑。一九三二年(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一日起，由黎烈文编辑。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起，停止出版。一九三八年(民国二十七年)十月十日复刊，由王任叔编辑]。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 席裕福将申报馆售与史量才，价银十二万元，于同年九月二十三日订约，十月二十日移交。史君自任总经理，聘陈景韩(冷)为总主笔，张蕴和为副主笔，张竹平为经理。史君入馆后，筹划一切行政事务，将馆务次第扩充。陈君则将编辑部事逐渐整理。故斯时之《申报》，更有欣欣向荣，大踏步向上发展之势，俨然成了上海报业界领袖。

**一九一五年** 购得汉口路山东路转角处基地，从事设计绘图，招工承揽，建造新屋。同年元旦，袁政府上海镇守使迫令《申报》加印洪宪年号，报社迫于军阀淫威，消极抵抗，特刻六号最小铅字“洪宪元年”四字印出。

**一九一六年** 新厦开始兴工。

**一九一七年一月起** 于第五张副刊《自由谈》外，另辟一栏，名曰《老申报》，载四十余年之回顾，并摘取申报四十年来所载奇闻异事及政治、风俗、诗歌、游戏文章等，以饷阅者。



**一九一八年** 新厦建筑完成，是年十月迁入。新厦五层，外表壮丽，内部轩爽，计建筑费七十万两。上海华人报馆自建馆屋以此为最早最新最大。内有房屋百余间，那时确乎绰绰有余。但报馆业务日益扩展，人员与日俱增，办公房屋又觉狭小，乃于民国十九年，就旧屋之南添建新屋一座，与旧屋合成一口字形。

新屋落成之后，印刷机件亦大事革新，原有平版机器每小时每架仅能印报纸四张各三千份，然销数日增，已非原有机器所能胜任，故于新厦落成之翌年，即一九一九年，向美国订购最新式印报机一架，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又先后添购三架，于是十余万份之报纸能于两小时内完全印毕。此外若铜版机、浇字机、纸版机、铅版机、铅字铜模亦陆续置备，器材日见完备，效力日见增加。

**一九一八年十月十日** 特刊国庆增刊两大张。

**一九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出版《星期增刊》两张，由项远村、康通一等编辑，专译述世界政治、外交、经济、军事、工商、学术等大著，多译国外报章杂志之论著与要闻，对国际时事作有系统的介绍，以补日常国际新闻之不足。并载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记，以便利无暇天天阅报之读者。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始创耶稣圣诞增刊。

**一九二〇年一月一日** 特出元旦增刊《计划》专号一大张，由徐忍寒编辑。同年六月一日，增辟《常识》增刊，杨老圃（荫杭）专任评论，由沈信卿、徐忍寒担任编辑。内容分常评、法律、经济、道德、卫生、科学、问答等。十一年一月，增宗教、市政，灌输国民应有之普通知识。

**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日** 国庆增刊共出十二大张，由徐忍寒编辑。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创设《汽车》增刊，登载公路建设消息及利用汽车文字。

**一九二二年** 申报五十周年，发刊《最近之五十年》纪念刊一巨册，内容分五十年来之世界，五十年来之中国，五十年来之新闻业三编，由黄炎培主编。是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晨十时，英国伦敦泰晤士报主人北岩爵士(Lord North-Cliffe)莅申报馆访问参观，由总主笔陈冷等招待。

**一九二四年二月八日** 增出《本埠增刊》，专为本埠各界服务，不寄外埠。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申报》进入二万号，主笔陈冷为文纪念，略云：“《申报》乃历史之缩影，《申报》乃历史馆，虽属过誉，惟愿从二万号始，寝假而至十万百万号，永远为公众服务，进而可作世界观。”是日申报同人举行一纪念仪式，很是热闹，同时因为《申报》最老的职员张蕴和任职已二十六年，所以一并庆贺。

**一九二九年** 为纪念发刊二万号，采用“木铎”商标，呈请批准。是年秋，总主笔陈冷辞职，由张蕴和继任。后不久，经理张竹平因致力经营《时事新报》而辞职，由马荫良继任。

**一九三〇年五月十八日** 出版《图画周刊》，用橡皮写影版印刷，铜版纸精印，由戈公振主编，精选国内外时事照片和艺术图照，对开一张，分作四页，逢星期日出版，随报附送，读者爱阅。

**一九三二年一月** 成立总管理处，为总揽全馆事权的最高

机构。是年七月二十一日，创刊《申报月刊》，十二月出版《申报年鉴》第一卷。是年冬，刊印《中华民国新地图》及《中国分省新图》，纪念申报六十周年，颇有参考价值。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农历十月初六日下午三时，总经理史量才自杭州循沪杭公路返沪，在海宁翁家埠中途遇害，子咏虞幸免，咏虞同学邓祖询及司机黄锦才先遭殃及。计自史君民初办理《申报》暨服务社会文化事业，先后共历二十二年，晚年思想进步，办事用人确有才能，中国新闻界失此骨干，自是一大损失。是年冬，《申报》重要同人起先均属意前总主笔陈冷出任总经理职，但陈氏推却，最后决定组织董事会以代总经理职权，董事十一人，为陈冷、史咏虞、马荫良、张蕴和、王晓籁、钱新之、杜月笙、张啸林、黄任之、胡笔江等。

**一九三七年七月** 《申报》正式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由史咏虞、张蕴和、王尧钦、孙洁人、马荫良五人出任第一届董事。同年十二月十五日，因日寇检查新闻，自动停刊。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 《申报》在汉口出版。同年八月一日，汉口版停刊。同年十月十日，迫于环境，用美商哥伦比亚出版公司名义复刊，董事长兼总经理阿特姆司（W.A.Adams），总主笔阿乐满（N.F.Allman），沪港两地同时出版。

**一九三九年冬** 服务最久（三十五年）最勤之主笔张蕴和积劳病逝，全馆哀悼。

**一九四〇年四月五日** 营业部主任王尧钦被绑架，绑架者威胁王君打电话约被敌伪通缉的馆员到秘密地方吃饭，以便一网打尽，王君断然拒绝。同时庶务主任黄炎卿在另一处被特工

逮捕。不久，他们又企图绑架营业部重要职员陆以铭，陆君事前闻风避开，乃将陆之七旬老母及男女小孩全家捕去。

**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六日清晨** 暴徒以手榴弹一枚从报馆窗口掷入，一时烟雾弥漫，弹片四射，职员石征鸿、工友王安陆等五人受伤。王因受伤过重，不久殒命。暴徒在窗口掷弹之后，又在门外投掷两弹，无辜路人中弹片受伤者，至十四人之多。这是《申报》受奸伪袭击的第一次。不久在一个初秋的黄昏，伪特工又投了三枚炸弹，追获一暴徒，经审讯后，供明其为七十六号所指使。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伪中央银行开幕前，《申报》刊出一篇题为《中日货币战》的座谈会纪录，揭发敌人的金融阴谋和伪币窘态，大为汉奸们所愤恨。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下午** 报社门口的人行道上，发现三枚手榴弹，幸而未曾爆炸。后来伪中央银行送来一大幅开幕广告，要求于开幕之日刊出，遭报馆当局拒绝。一月六日黄昏，又有第四次投掷炸弹之事，暴徒一共投了三弹，只有一弹爆炸，招致四个路人受伤（另外还有两次，奸伪秘密地将炸弹带了进来。一次放在编辑部的书橱中，一次放在图书室的书架上，把四五本西装书挖空，放入一枚定时炸弹，幸而炸弹早已失效，否则爆炸起来危险性更大，这是一九四〇年夏秋间的事）。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日黎明** 《申报》记者金华亭在爱多亚路大华舞厅附近，预备雇汽车回报馆，恰巧汽车行的车子全部出差去了，他只好在那里徘徊等候，不料暴徒已伺伏在旁，立刻向他包围袭击，连发数枪，金君中了四弹毙命。事后调查原因，

就是为了申新两报拒登伪中央储备银行开幕巨幅广告，金君主张坚决而起。又有人说，金有重庆政府背景，《申报》另一记者钱华有敌伪背景，与金对立，先遭枪杀而死，杀金可能是敌伪报复。故当时申报馆许多退职及在职同人，对金钱两人之死都一致严正批评，略云：“一失足成千古恨，金钱都为金钱死！”不过金为坚决反对储币而殉，稍高一筹耳。

**一九四一年夏** 开始办理“申报读者助学金”，全馆职员分别担任各项工作，另成立一个委员会主持其事。助学金运动展开后，社会上反应强烈，捐款源源而来，大都是小市民节衣缩食用血汗换来的钱。报馆方面根据“纯洁”和“简单”两项原则处理这项捐款，审核时对于申请人的家庭状况、学业成绩和操行特别重视，帮助了许多苦学生。太平洋事变发生后，报纸已受敌伪统制，于是将更大的精力放在助学金运动上。从一九四一年夏开始，迄一九四五年胜利为止，前后历时四年半，《申报》共收到捐款四千余万元，受资助的大、中、小学生在二万人以上，显示了互助的力量，发挥了崇高的服务精神。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 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全市沦陷，《申报》再度停刊，后敌伪强迫复刊，不久又派陈彬龢前来强迫接收。从此历史悠久的《申报》为敌伪所劫持，丧失自由意志，暂时陷入黑暗时期。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申报》胜利复刊，事先国民党中央派潘公展为指导员兼总主笔，陈训恂为总经理兼总编辑。

**一九四六年五月** 指导期满，交还公司。五月十五日，董监事联席会议决定聘潘公展为社长兼总主笔，陈训恂为总经理

兼总编辑，从此《申报》又被反动统治所控制。

《申报》复刊后，反动派利用飞机运报、照片展览、无线电广播等，进行反动宣传，原属一无是处，但客观上对于新闻事业的改进不无有些帮助。一是复刊后销数激增，远及绥宁甘肃西康等地，为远地读者便利起见，曾发行便于航空递送的“缩影版”，不但减轻了读者的负担，而且清晰美观，皮藏亦更相宜。二是经常从各地得到许多照片，除一小部分在报纸上刊出外，大多数因受篇幅限制，未能登出。一九四七年元旦，将这许多未经用过的照片，在杭州举办了一次时事照片展览会，接着又在南京、苏州、南通、福州、台湾、北平各地展览，当时虽属反动宣传，但可为后来种种宣传借鉴。三是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起，《申报》与全市十八家民营及公营广播电台合作，每日晨、午、晚播送新闻三次，颇得当时各界好评。旋又举办星期日全天特别广播，轮流在各电台举行，内容有一周时事评述、名人演讲、各地通讯、科学常识讲座、社会服务项目，配以音乐唱片、游艺节目。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日 《申报》发行二万五千号，适为七十五周年纪念，出版纪念特刊，史咏庚发表感言一篇，上半段完全出于肺腑之诚，下半段字里行间颇有难言之隐，对于杀父之仇及自己死里逃生，同窗好友邓祖洵惨遭毒手等，均讳莫如深，只字不提，可见当时环境令人啼笑皆非。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申报》最后一个总主笔陈亦（陈冷之子）到馆就职，因反动分子纷纷逃亡，《申报》笔政无人负责，出而维持。仅隔三天，即解放停刊。有人戏谓史量才之

《申报》，陈氏父子始终共事。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上海苏州河南市区解放，解放前盘踞申报三年四月余之反动派纷纷作鸟兽散，潘走台湾，陈去香港。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申报》出版第二五五九九号而最后停刊，距一八七二年四月三十日创刊，计共七十七年零二十六天。

## 《新闻报》和《申报》的竞争

张秋虫

提起以前上海的两张老牌报纸《申报》和《新闻报》，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总认为是“鲁工之政，兄弟也”。所以对于它们名次的先后，大都信口唤来，无所用心。有人称之为“申新两报”，也有人称之为“新申两报”，仿佛五雀六燕，难分轩輊。但在当时的两报中人，特别是老板看来，这问题却不能那么随便，而是卢前王后在所必争。这一点充分表现在两报的广告中。《新闻报》上所刊广告总是称“新申两报”，《申报》上则必称“申新两报”。如果我们去细细查对一下，这种不成明文的规定，竟是铁案如山，万无一失。尤其在一九二九年史量才收买《新闻报》股权以前，更觉壁垒鲜明。这也可以说是两报竞争的一个显著标志。

据说汪汉溪在任《新闻报》总经理时期，曾谆谆告诫广告部的职员，对于外间送来的广告，如有“申新两报”字样，一定要劝告来人改为“新申两报”，如果对方不允，可以拒刊。有时广告部百忙中没有看仔细，校对部一经发现，也不妨代为改正。那时《新闻报》有个传统规矩，客户送来的广告即使写错或欠通，也应该完全依照原文登出，绝对不能擅自更改，但广告中涉及两报顺序时，则决不含糊。对客户的广告尚且如此，本报的新



闻报道中自然更加小心，谁疏忽了这一点，准会饱受责难。

汪汉溪把《新闻报》办得销数超过早它二十一年出世的《申报》（《新闻报》创刊于一八九三年，《申报》创刊于一八七二年），“申报纸”三字在一般人口中已成了“报纸”的代名词的时候，真是一件不简单的事。<sup>①</sup>汪汉溪雄心勃勃，硬要把“申新”翻成“新申”，如积薪之后来居上。结果竟如愿以偿。他的经营手法是多方面的，约略说来有下面几点：

（一）**轻政重商** 所谓轻政并不是不谈政治，而是对于政治要多报道少批评，少置可否，甚至不置可否。这也就是汪氏所标榜的“无党无偏”的实质。在民国初年，正当《申报》以长篇论说号召读者的时候，《新闻报》却别出心裁，把第一版电讯、第二版通讯和第三版本埠新闻分成“新闻一”、“新闻二”、“新闻三”。为了配合这种版面，每版有“新评一”、“新评二”、“新评三”的短评，其特点是实事求是，不务高谈，明白易懂。目的是争取一般商人和所谓“小市民阶层”的读者。由于篇幅简短，文字浅显，看起来不吃力，很受读者欢迎。《申报》不甘落后，赶紧如法炮制，每版也都附以短评，不过不叫“新评”，因为“新评”含有《新闻报》的评论之意。后来《时报》的短评叫做“时评”一、二、三，也就是这个意思。汪汉溪不和《申报》争取那仅占少数的知识分子，而避重就轻，出奇制胜，改从争取“小市民阶层”的读者入手，面广人多，果然收效。

---

<sup>①</sup> 当时一般人把“报纸”叫做“申报纸”，据老辈说，清光绪十三年间，即一八八七年，《申报》因登载杨乃武小白菜案，轰动一时，深入城乡，因此人们把报纸称为“申报纸”。

**(二) 注意“卖相”** 汪汉溪时期《新闻报》内部有几句口号：新闻快速，纸张洁白，校对精良，编排醒目。把纸张洁白和新闻快速相提并论，作为办报的最高标准之一，也许有人会觉得不伦不类，可是汪汉溪有他的看法。他说一个人首先要注意“卖相”，纸张洁白，好比一个人穿上漂亮的衣服，令人一见面就产生好感，所谓“三分人才，七分打扮”，它的重要性不次于内容，甚至超过内容。的确，当时的《新闻报》非常注意纸张质量，竭力设法大量趸购，务使报纸的色泽不致常常变动（有些报馆限于财力，用纸往往临时拆购，所以纸色不能一致，时白时黄）。至于校对精良，更是他三令五申的要旨。报端发现错字，校对者不论初校、复校和看大样的人都得受批评，错得过多或者与原稿文字出入过大，有关人员就得卷铺盖。

**(三) 重视本市新闻** 那时上海各报的本市新闻叫做“本埠新闻”，大都因陋就简，仅抄登几段官厅批示以及公函、公告之类的官样文章。汪汉溪为了争取本埠读者，首先扩充新闻来源，诸如会审公堂、救火会、巡捕房、医院，等等，都特约了“报事员”（后来有些比较公开的叫做“访员”）。起初按刊出新闻的多寡计算报酬，后来为了鼓励，改为按月致酬，特别突出或独有的新闻，还付给额外的奖金。有些在工部局或巡捕房略有权势的人，只要肯在重要事件上悄悄地提供线索，汪也可以暗中送钱，彼此严守秘密，有事时派人到他们家里去笔录。象冯炳南之流，就是这样长期拿干薪不出面的“顾问”。

**(四) 增辟经济新闻专栏和国外电讯** 《新闻报》以注重经济新闻见称。汪汉溪除了以商情表的准确来号召外，还于一九

二二年特辟“经济新闻”版，重金聘徐沧水、朱羲农主持其事。徐月薪一百八十元，朱一百元。当时的总编辑李浩然月薪不过二百元，一般主任编辑仅百元左右，可见汪对经济新闻的特别重视。<sup>①</sup>不久，汪又出奇制胜，想出了一个新花样，设立国际电讯收报房，专收外国通讯社的电报，与同行争取时间，实现新闻快速的口号。因为那时外人所设的通讯社，如路透、同盟等在上海的分社，收到电讯后，还须译成汉文，誊写油印，才分送给各报社，时间要延迟到第二天。《新闻报》自己设立收报房，可以直接收听到比较重要的新闻，当晚立即译出，翌晨即可抢先见报，美其名曰“本报国外专电”，读者不解内幕，以为《新闻报》真有魄力，电讯网远及国外，可以算得国内独一无二的大报，销数和声望迅速提高。当时的收报员，是招考进来的张文培和白强钟，张的薪水高达一百八十元，在编辑部里除了总编辑是少有的。以上两事《申报》虽然急起直追，但已落后一步。

此外，顺便提一提汪汉溪的“保密性”。汪每做一件重要事，除非认为必需参加的人，决不让人知道。他不喜欢馆内人员对外活动，认为必须如此才能专心一志，忠于职守。在他任内，因参加政治或社会活动而被辞退或迫令“自行辞退”和设词外调的，有一度被推为主笔的金煦生、孙玉声（笔名海上漱石生，《海上繁华梦》的作者）、张继斋（后改为北京通讯主持人），有曾任主要编辑的杨千里、文公达、余大雄、张丹斧（即张丹

<sup>①</sup> 经济新闻版，并非《新闻报》首创，《商报》约在一九二一年即有商业金融版，占绝大部分篇幅，编者先为以标点旧书出名的陶乐勤，后为冯佛堂。

翁)等人。这些人有的和福开森有渊源，汪汉溪不能不稍留余地，酌予外调，否则就要连根拔了。自从不喜与闻外事的李浩然由日文翻译升为总编辑后，汪干脆就不再设置总主笔或主笔。这在汪自有一番打算，因为从习惯上看来，总主笔在名义上可能与总经理平行，废除总主笔，只用一个总编辑，则报馆的最高当局就只有总经理了。从发展业务来说，他认为这样做是合适的，后来汪伯奇继任，也是如此。

以上所说的汪汉溪想把“申新两报”翻成“新申两报”的大概情形，仅仅是汪汉溪办理《新闻报》的手法的一部分，其他的事情还很多。总的说来，汪汉溪在事业发展上是成功的，无论如何，报纸销数居然超过《申报》。当然，当时大家在口头宣传上各有各的说法，实际销数却严守秘密，连自己报馆里的人也不尽得知，更不用说局外人了。不过眼睛最锐利的，是那些在报纸上登广告的商家，他们能从广告效力来估计各报销数的多寡。《新闻报》那句“广告效力最大”的宣传标语，平心而论，倒并非虚夸。因为它的广告(汪汉溪称“告白”)生意确比《申报》好得多，在收费的折扣上也比《申报》硬一成，至少半成。比如《申报》照刊例实收七折的广告，《新闻报》就得收七点五折或八折。在这方面，《申报》后来用张竹平和汪英宾，运用了许多方法，如发行“星期增刊”，奉送“宣传新闻”(即为广告客户另撰新闻进行宣传)等等，来和《新闻报》竞争，但收效甚微。

所有这些，对于高踞“报界四大金刚”首座的《申报》主人史量才来说，自然如芒刺在背，不能翫置，以致发展到后来他不惜以十倍于票面的巨资来收买《新闻报》的股票。虽然还有许多

别的因素，但是为了想教《申报》崭然出人头地而使《新闻报》沦为附庸，也就是要使这两张报永久被称为“申新两报”而不致被称为“新申两报”，确是主要原因之一。有人说史氏打算把《新闻报》并入《申报》。这话是不合情理的，因为当时《新闻报》的盈利很可观，史量才怎肯放弃这块肥肉。

提到史量才收买《新闻报》股权，其中的关键人物是福开森。要说明这个问题，得从汪汉溪和福开森的关系说起。在一般人看来，他们两人无非是买办和大班、经理和老板的关系，实际上却不如此简单。汪汉溪对于福开森，有俯首帖耳的一面，但也有独行其事的一面。例如袁世凯称帝前后，福开森为了个人利害，主张暂观风声，模棱两可，而汪则审时度势，为报纸的前途计，毅然决定反袁，与福开森的意旨大相牴牾。后来袁世凯倒台，福开森也就认可了。又如金煦生是福开森的学生，与福的关系很深，而汪汉溪一定不要他当主笔，福开森也只好顺水推舟，荐他到湖北做官去。类似这种事情，可以说决非一般老板和经理的关系。《新闻报》当时用美商的名义注册，对外不能不说是福开森独资经营，事实上据和汪氏接近的人说，福开森当时盘进丹福司的《新闻报》，并非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而是约定由福开森出面代为清理债务。这笔清偿债务的钱，福开森始终未曾拿出分文，而是由汪汉溪出马，设法向银钱两业商借的。因此福开森的“独资经营”全仗汪汉溪的汗马功劳，所以福也怕汪翻开这张底牌，有时不得不让他三分。

汪汉溪一死，福开森忧心忡忡，唯恐汪伯奇、汪仲韦兄弟守不住这番事业。想不到汪氏兄弟居然守住了。不过汪伯奇的

为人，小心翼翼，恪遵“诸葛一生唯谨慎”的信条，秉承乃父遗嘱，遵福开森为父执，但又尊重得太过分，遇事必先禀明福开森，候令定夺，丝毫不敢擅作主张。这一来，使福开森不但不觉得舒服反而有些嫌麻烦，觉得远不如过去和汪汉溪那样一搭一挡，有正有反地来得有味。在汪汉溪时代，碰到风头不对的时候，他可以把责任往汪汉溪身上一推，自己闪在一旁装聋作哑，以观事变，美其名曰“信任汉溪”，事后再出来唱几句高调。这是福开森的一贯作风。偏偏这一套在汪伯奇身上施展不开，不禁由不习惯而深深地感到不愉快，这可能是他想把《新闻报》“待价而沽”的动机之一。刚巧碰到史量才这样一个争气不争财、处心积虑要收买《新闻报》的好主顾，事情就终于发生了。

当时《新闻报》号称股份有限公司，名义上是二千股，每股定额十元，合计资本二万元。福开森持有股票将近一千三百股，充其量也不过一万三千元。史量才对症下药，竟肯以超过十倍的高价收买《新闻报》（据说是二十万元，也有人说是四十万元），对此，福开森怎能不动心呢？有人说，福开森在出卖股票之前，讳莫如深，没有向汪氏兄弟透露一点风声，这话也不尽然。据闻福开森曾经有意无意地透露过一些口风，曾对汪伯奇说他年纪老了，愿早日回国休息，还说看现在的时势，办报渐渐味同鸡肋，保不住长此一番风顺，人生适可而止，假使有人肯出相当代价，依他的见解，倒不如出让《新闻报》股权，享享清福。这些话带着试探性，可算是打招呼。汪氏兄弟好象有所了解，却又有点误会，只当老福想把股权一并让给他兄弟俩，当即和他们的谋士号称智囊的冯炳南商量，冯劝他们不要亟亟，先给福

开森阴干一下，表示对这件事不感兴趣，否则难免被这只老狐狸大敲一记竹杠。汪氏兄弟采纳了他这个意见，谁知福开森却没有耐心等待，认为自己已经打过招呼，对汪氏兄弟业已仁至义尽，对方既然默无表示，他就老实不客气，决定悄悄地独自出售。当时在史、福之间起桥梁作用的，就是那个后来跑到《新闻报》馆去接收，枯坐半天曳尾而去的董显光。这位洋派政客所以如此热心，也不是无条件的。史量才和他约定，事成之后，奉赠董事头衔，兼任总主笔，独揽《新闻报》的大权，他自然深中下怀，愿效犬马之劳。这就是史量才收买《新闻报》的来龙去脉。

这场股权斗争，怎样起，怎样落，当时传说纷纭，莫衷一是。因为事定之后，史量才固然不愿重提旧事，汪氏兄弟幸保赵璧，为了维持和史家的关系，也不愿多提。然而史量才花了这么多钱，来势汹汹，结果却豁达大度，愿意让出三百多股股权，连董事长的名位都放弃，退步到只拿红息，不过问内部事情，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一下子就悄悄收兵，未免出人意外。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呢？诚然，那时《新闻报》每天在第一版用大量篇幅登载反对报界托辣斯的宣言和各方面支援的来函、来稿，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并不是主要的原因。史量才对这些方面起初并不买账，态度仍很坚决。据一位接近史氏的《申报》职员说，史氏之所以勒马悬崖，倒并不是由于虞和德、陈德征等人的调停，而是震于陈冷血（《申报》总主笔）的一句话。陈是在史面前说话最有影响的人，那时已不常到报馆视事，但为了这件事突然光临史公馆，对史说：“你这样坚持下去，恐

怕要两败俱伤，危及根本（指《申报》）真个应了‘兔卢相逐，田父收功’的话！”原来，那时候蒋介石正想包办舆论，把上海这两家实力雄厚的大报一古脑儿抓过去，据为己有，今日难得有这个好机会，怎能轻易放过，他已在布置一切，准备立即动手。史量才听后，这才着起慌来，赶紧后队改作前队，计划收兵。证之史氏在这次风波中，始则剑及履及，倏而云淡风轻，前踞后恭，显得兔起鹤落，虎头蛇尾，这一说似乎是比较符合当时情况，比较可靠的。

逆流转舵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议定三个办法：（一）由史量才让出三百股给所谓第三者；（二）保证汪氏兄弟仍旧全权主持《新闻报》事务，史不加干涉；（三）对于《新闻报》原有全部人员，保证一律维持现状，不予调动。第一二两点似乎谈得比较顺利，因为有第三者出来担待，容易妥协。第三点比较难办，因为老板对伙计只有口头保证，一无契约，二无证人，谁能相信，所以还是人心惶惶，劳资之间意见未能一致，整个问题不得解决。史量才唯恐日久生变，不得不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决定用银弹来分化《新闻报》内部，命他手下的两个外勤记者唐世昌、康通一，对其中几位活跃而又动摇的代表进行暗中疏通，各个击破，使当时《新闻报》编辑部“护权运动委员会”（委员有李浩然、倪澜深、蒋剑候、余空我、徐耻痕、陈达哉、严独鹤、杭石君等）因大部分委员缺席而开不成会。加上此时汪氏兄弟业已到馆复职（他们在董显光来馆的次日即离馆），大家好象服下一颗定心丸，一场轩然大波终于平息下去。关于史量才使用“银弹”的事，据说当时史氏暗中以送股的方法去笼络几位上层



分子，经手人事后也并不讳言。这一做法，后来不仅引起了《新闻报》的股权风波，而且还造成了新闻界一部分人贪财牟利的风气。因为连史老板也搞这一套，一些卑鄙无耻的人也就更大胆了，以致后来出现所谓“报界贩子”，专门拉拢一批“下三滥”的记者，伸手向各方面要津贴，败坏新闻界的名声。这不在本文范围之内，不赘述了。

## 记《民权报》、《中华民报》和《民国日报》

李健青

### 一、反袁激烈的《民权报》

《民权报》是辛亥革命后同盟会在上海办的报纸，也是当时反袁世凯最激烈的日报。同盟会在上海办的日报中先于《民权报》的，有于右任主持的《民立报》（由《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演变而来），有李怀霜主持的《天铎报》。后于《民权报》的，有邵元冲主持的《民国新闻》和邓家彦主持的《中华民报》。至于王博谦、章保世的《民强报》，虽挂上“民”字，实与同盟会无关，且报格不高，销路亦窄。此外复有《太平洋报》、《生活日报》，等等，离《民权报》出世时甚远，均不永年；至于后来叶楚傖、邵力子所办的《民国日报》，虽为国民党机关报，但出版时间远在《民权报》之后。与《民权报》同时的，尚有英文《民国西报》，亦为同盟会机关报，主持人为华侨马素。

《民立报》当时主社论者为章士钊（行严）、骚心（于右任别署）、力子（邵仲辉），以写时评为多；徐血儿的论说以尖锐笔锋抨击袁世凯。《天铎报》内容不见充实，几于无声无息。戴天仇（传贤）在《民权报》问世以前，有一短时期曾主《天铎报》笔政，辄与怀霜意见相左，故同盟会再树一帜，创刊《民权报》；《民权

报》开办基金十万元，由黄兴从陆军部拨出，至于当时“民”字号日报以外的上海旧有各日报，如《申报》、《新闻报》、《时报》等等，或拥袁，或模棱两可，独《民权报》乃真正反袁的国民党报纸，故亟为当时同业与各界所注目，而其议论剑拔弩张，单刀直入，仿佛击鼓骂曹，尤堪震惊一时。袁党与向袁者竟谓之谓“疯狗咬人”。

《民权报》有两特点：其一是上海报纸向少社论，仅用短评表示政见；即使有社论，亦属日刊一篇，亦有偶一为之。自《民权报》出世，首创日刊社论三篇，有时且多至四篇；不足，则以议论充之，所谓“论说”，锋芒对袁，如袁梨爽口，一时极受当时进步人士的欢迎。其二是《民权报》小品文字充实，每日用五号字刊足一版，分门别类，与其后十年间市上发行的杂志项目大同小异；特约撰述征收投稿，均尽其能事。其时尚无新文化运动，此项旧式作品在当时的社会上尚有其影响。

《民权报》当初议论宗旨是：极力促袁南下就职，鼓吹政党内阁制，拥护临时约法，反对北洋军阀，等等；对袁个人尚未进行正面的抨击。自宋教仁被刺，《民权报》对袁始作正面的揭露与抨击，由社论而时评而小品文字内的“众生相”、“天花乱坠”各栏，一致作倒袁的宣传。编辑室壁间大张社长周浩所书长篇宣言，其惊句有“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等语。可见其激烈的一斑。

#### 内容和版面

《民权报》社址本在公共租界三洋泾桥北堍（今江西中路），坐东朝西沿马路三层楼房，一九一三年讨袁军事失败后，迁至

三洋泾桥南堍。时洋泾浜尚未填平，《民权报》社址对面的洋泾浜为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分界线，《民权报》以公共租界与北京袁政府关系密切，不如在法租界比较自由，故由北迁南。其时，《民权报》已是一盘残棋，不到半年就自动停刊了。

该报出版于一九一二年春，存在期间不足两年，日出三大张，分为十二版。当时报纸均带营业性质，以广告费收入作为经费的一部分，故广告共五版，几占篇幅之半。兹略述其内容及版面情况如下：

社论。当时称为“论说”，写作者须署名。文用五号字排植，占一版地位，分为“论说一”、“论说二”、“论说三”等三项；有时有“论说四”或“议论”，以所讨论问题的重要程度定排列的先后。末一栏为“小说”。此版材料或多或少，时以小说为伸缩。我（署名定夷）所作的《阴玉怨》、《红粉劫》等小说即刊于此版。

电讯。大部分为京电。如各省发生重大事故时，特约访员亦负发电责任。电报由编者视其重要与否，用二号或三、四号字排刊。电讯之末为路透电、同盟电、译电、快邮代电等，约占一版地位，左角刊登“时评一”。

要闻。大部分为政治新闻，接在电报之后，用五号字排刊。约占一版又半。

地方新闻。接要闻之后合成两版，左角刊登“时评二”。凡编电讯、要闻、本埠新闻的记者，有写“时评”的责任。写“论说”的记者可尽量代写“时评”，亦署名。

本埠新闻。占两版地位，不足时用“专件”、“来件”等充实之。末刊“时评三”。

小品文字（无名称）。占一版地位，分小说、笔记、戏评、游记、谐文、“众生相”、“天花乱坠”，等等，均以五号字排刊，末两种所占版面视此版其他稿件多寡而伸缩。徐枕亚的《玉梨魂》及吴双热的《兰娘哀史》，即刊于此版。

上述内容及版面，由今视之自极古老，但当时已算“丰富多采”。又当时的五号字较今日报纸的五号字为大，是四个五号字合成一个二号字。

#### 编辑部的阵容

《民权报》编辑部前后同人殊不能全数记忆，仅能忆二十余位。兹约略述之如下：

（一）社长周浩，字少衡，贵州贵阳人。

（二）总主笔戴天仇（传贤），字季陶，浙江吴兴人，以生长在四川，亦称四川籍。

（三）论说撰述牛霭生、刘民畏、尹仲材、陈匪石、江季子、何海鸣、戴伯韬、罗端甫、徐天啸、茹春圃。

上述诸人中，最初任论说撰述的，仅戴天仇及牛、刘、尹、陈四人。余皆以后入馆。戴天仇之作固定排为“论说一”。除戴外，他人稿件皆不能直接发交排字房，必经周少衡过目，倘有时因时间关系经过特许者，则属例外。戴名为总主笔，实际上到馆时间不多，并不过问编辑部事务，全由周主之；但编辑上发生错误时，戴必严予指摘纠正。编辑部在三层楼，为两大间及三小间。大间一为编辑室，一为校对、译电及少数同人卧室。周及戴各占一小间。余一小间为会客室。编辑室内供写论说记者的座位仅两三席，故大都在家写成，来馆交卷，看报谈天，必

临时发生问题始在馆讨论写稿。除戴天仇有权改他人文稿外，周少衡亦喜改他人文章，文章作者对之啧有烦言；但周好提携后进。投稿人进身为《民权报》记者的很多，大抵是周为便于指挥的缘故。

刺宋(教仁)案发生后，《民权报》言论如狂狮怒虎，鼓吹以牙还牙，血债血偿，“杀”字不绝于书。戴天仇在论说内一连用“杀！杀！杀！”三字，因而触捕房之忌，指为鼓吹暗杀，捕之入狱，经数日之久始行释放；由是《民权报》言论稍为稳健。当戴天仇被逮时，周少衡诸人营救甚力，以免引渡，转致发生意外。

(四) 翻译本埠《字林西报》、《大陆报》等及日本、南洋等地寄来英日文报纸，无论评论、电讯、新闻均可选译。担任此职者，为陈无我及陈志群。

(五) 电报初由汪洋(字影生，又字子实，“时评”署一“影”字)编辑。汪离社任《中华民报》总编辑后，改由潘无朕编辑(“时评”署一“朕”字)。

(六) 要闻初由刘民畏编辑，李定夷助之；后刘专任论说撰述，旋又改隶《中华民报》，遂归李定夷独任，并写小说，间亦写“论说”及“时评”。

(七) 地方新闻由徐枕亚编辑，吴双热助之。两人皆写小说及小品文字。

(八) 本埠新闻初由高冠吾编辑，高调充驻京发电员后，改由李卓民担任，吴双热助之。

(九) 小品文字初由周少衡兼任编辑，后改蒋箸超担任。

(十) 特约人员，有郑正秋的“戏评”，刘铁冷的“笔记”，李

警众的“杂作”，等等。

(十一) 驻京发电记者初为雷中夏，后为高冠吾。

(十二) 校对小校由校对三人担任。潘无朕、李定夷、徐枕亚，吴双热分任拼版及校看大样，均守候通宵。

#### 编辑部两怪人

《民权报》编辑部同人中有两怪人，均以书生而任军职，又皆沦为政客，而晚节不终。此两人一为高冠吾，一为何海鸣，兹分述于下：

(一) 高冠吾原名高愈，江苏崇明人，江南陆军小学毕业，离校后，即从事文字生涯，旋充《民权报》记者，时年仅二十一岁，为编辑部内最少之青年。高初编本埠新闻，极能迎合周少衡，其书法完全仿周，直可代笔，高体属书家赵之谦一流。任编辑不到半年，报社以驻北京发电记者雷中夏屡屡延误紧要消息，改由高充任。彼时，报纸出版后各报均相交换，首先是核对电讯的有无和迟速，故驻京发电记者责任甚重，苟有延误，即无可掩饰；且《民权报》极端反袁，袁党嫉之如仇，其驻京记者处境危险，采访困难，高勉任艰巨，亦出无奈。比及讨袁军兴，高即狼狈南归。数年后，周少衡在北京得陆长靳云鹏的信任，充陆军部编译局长。靳出资交周办理北京《中报》（社址在前内顺城街）。高一度任编辑。该报日出两张而编辑仅一人，故高郁郁不得志，旋即去职。张怀芝督鲁时，高投其部下，四任县知事，后又投南附桂、附黔，任王天培的副军长。北伐之役，一度任蚌埠警备司令，后被蒋介石撤职并解除其兵柄。高之反蒋自此始。汪伪政权成立，高历任伪军职，师长、军长头衔一大堆，四

任江西、江苏等省长。一九五七年病故于山东。

(二) 何海鸣, 自号衡阳一雁, 别号求幸福斋主人, 湖南衡阳人, 其笔名有时署“一雁”两字。出身不详, 为人城府甚深。辛亥革命后, 与凌大同在汉口办理《大江报》, 对黎元洪口诛笔伐不遗余力, 因此为黎所深恶。后因凌大同被杀, 《大江报》封闭, 何遂孑身逃沪投《民权报》, 数日写一论说, 并不逐天到馆, 殆是借此躲避风雨。是时, 何尚未婚。一日, 忽编束同人喜卮。及期则见新娘乃一旧式妇女, 同人咸出意外。刺宋(教仁)案发生, 何朝夕奔走, 一若大侦探然。洪述祖与应夔丞所通毁宋密电之杜应宅被搜得者, 何实有大力。癸丑(一九一三年)讨袁军兴, 湖口林虎、九江欧阳武、南昌李烈钧首先发难, 安徽柏文蔚继之, 而江苏迟迟不动, 后来留守黄兴竟未败先遁。何以一介书生, 在发难之始, 即赴南京参预黄兴帷幄, 至是竟一跃而代黄兴为代理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其时, 北军声势甚盛, 瓮中捉鳖, 因知难于幸免, 然何海鸣竟披甲执戈, 督战近一星期许, 始脱险来沪。但不复在《民权报》操笔政。国民党对于何极不满意, 因何自宁退出时, 发一长电, 痛诋中山先生与黄兴。论者谓此或何为将来投身北方之预备。何与同盟会关系本来甚浅, 一时的结合不过因同有反袁目标耳。厥后, 何在沪卜居租界, 极为侘傺无聊, 至鬻文自给, 如《琴媪小传》、《求幸福斋笔记》等等写作, 皆由民权出版部(与《民权报》无关, 详后)发行。琴媪者, 乃上海一妓。何海鸣玩而捧之之不足, 复演为小说以张扬之。其后如何, 则不知详。迨政局一再变迁, 安福当国, 不知何和湖南督军张敬尧是何渊源, 竟入京任张敬尧驻京代表, 并



以湘籍资格充任安福国会议员，抗战期间，曾参加汪伪组织。

癸丑讨袁失败后，《民权报》仓皇迁于法租界，度其残喘。环境的艰困迭逼而来，顾犹坚持一息尚存之志，不到山穷水尽不甘偃旗息鼓。所谓艰困，约略言之如下：

(一) 发电执照吊销，有关北京政讯已无专电报告，且亦无人敢担任驻京记者，乃将路透电、同盟电等改头换面充作专电。消息不灵，新闻内容空虚已极。

(二) 邮寄权撤销，无法向外埠递寄，报纸派报社亦不代销，外埠人士更不敢订阅此“乱党”机关报(袁方所称)。销行不能越租界一步。

(三) 重要人物之隶同盟会的，除周少衡外，大半东渡或他往，留者寥寥，虽后时新入馆的尚有管际安及沈肝若，但馆中气氛完全是孤城落日的景象。一人兼任数事而待遇除减低之外尚须拖欠，工作极不安定；于是留者亦纷纷求去。馆方以感情羁縻之，自然不能持久。

(四) 经济上无人援助。本来同盟会对《民权报》无固定津贴，因同盟会本身经费亦是东拉西扯而来，在《民权报》初期，戴天仇曾一度欲赴南洋募款而率不果行；平日为《民权报》张罗者为张人杰、陈其美诸人，张之账房周佩箴固日徘徊于馆中，有时李烈钧及柏文蔚亦助一臂之力。此时则一切来源俱断，又因销路日见偏仄，广告费收入亦锐减，故虽极力支撑，亦属无米难炊。

如是者苟延约五个月，乃自动停刊。总计出版时间首尾不足两年。印报机器及全副铅字虽系自置，但早已陆续抵押于人，

家具亦典尽卖光。阅两载，福州路山东路口有民权出版部出现，此与《民权报》完全无关，而系《民权报》会计陈冷僧约集前时发行部、广告部之马志千、郑耀南诸人所组织，延蒋箸超为编辑，出版杂志，名《民权素》，剪取《民权报》小品文字，利用其名颇能号召一时，大约至四五期后方开始自行征稿，并发刊单行本小说，盖以报纸小品文字含有时间性，不能尽合《民权素》的选材，故后来非征收来稿不可。周少衡时尚在沪，亦坦然听之，惟每出一书，享取阅两三册的权利而已。

## 二、《民权报》的孪生兄弟《中华民报》

《中华民报》创刊于一九一二年夏秋之交，在《民权报》、《民国新闻》出世之后，但相差各不过数月。《中华民报》社址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第二第三两座洋泾桥之间，位于企业大楼西南的一个角落。时洋泾浜尚留一条深沟，未完全填平。

国民党在上海办的报纸，有“竖三民”和“横三民”之称。“竖三民”即《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同盟会会员于右任在一九〇九年春（清宣统元年），创刊《民呼日报》于上海。先是，清廷曾下禁止阅报的上谕，尤其在学校内，查禁更严。《民呼日报》出版后，攻击官场贪污腐败，不遗余力，当道尤忌之，列入悖逆书报之内。但以该报社设在租界，清吏畏洋人如虎，不敢封禁。不过该报亦仅仅能在租界内销行。顾清吏终不甘心，乃以吞没账款案控诉于右任于会审公廨。于被捕并被拘禁四十余日，判决驱逐出租界。《民呼日报》亦因此休刊。是年（一九〇九年）秋间，国民党把“呼”字去了两点，改称《民吁日报》。《民

吁日报》仅刊行四十余天，租界当局知为变相的《民呼日报》，乃予以封禁。隔了年余，到一九一〇年秋末，国民党又创办《民立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虽先后名为三报，事实上是一家日报的两次再版，故称“竖三民”。所谓“横三民”，即《民权报》、《民国新闻》、《中华民报》，是以三家各有主持人，如兄弟的并列，不相统连，故称“横三民”。

#### 《中华民报》的内部组织

经理部：社长兼经理邓家彦，副社长兼副经理龚铁铮。

编辑部：总编辑（编电讯兼写有关电讯的社评）汪洋，论评刘民畏、胡韞玉、邓家彦、李定夷，要闻刘民畏、殷人庵，地方新闻兼写有关地方新闻的社评管际安，本埠新闻兼写有关本埠新闻的社评庄乘黄，翻译外文张涤洲，小说李定夷，特约撰写郑正秋、钱病鹤。

编辑部中，可以说几乎一半是《民权报》的人。汪洋是《民权报》最初编电讯的，刘民畏是《民权报》最初编要闻的，均脱离《民权报》专任《中华民报》的职务。李定夷是《民权报》写社评、编要闻和写小说的，兼任两报。管际安是《民权报》的特约撰写（《民权报》最后数月间，管与沈肝若加入为编辑，时已在《中华民报》结束之后）。郑正秋、钱病鹤在《民权报》，一专任戏评，一专任漫画，有时亦写写小品，均系特约人员，今亦兼任。因此，《民权报》社长周浩和邓家彦之间发生摩擦。周在口头讥讽之不已，还在国民党党部（同盟会上海交通部，国民党报纸诸记者常集合于此）加以攻讦，说：“《民权报》要倒了。我的人都被邓孟硕（邓家彦字）拉走。自己人要来拆台，我还办什么

报？”邓则以为他并不招揽，是他们自己要来相助的。实则周待人吝啬刻薄，不若邓的爽直诚恳，豁达大度，所以有些同事对周貌合神离。但周亦有其长处，奖掖后进，提携不遗余力，如徐天啸、徐枕亚、李定夷、管际安、吴双热、高冠吾、刘铁冷等等，皆是周引进新闻界的。不过周之提携后进，亦有其作用在内。周常说：“新进人物欲望小，驾驭易。”这便是周的用意所在。

由于《中华民报》有许多《民权报》的人参加，所以《中华民报》刊行后，有人说是《民权报》的“支店”，而誉之者则称为“孪生兄弟”。两报同以反袁倒袁为目标，对于袁世凯的一举一动，口诛笔伐，大声疾呼的骂劲，可谓难兄难弟。《民立报》资格较老，以老大哥自居，渔父（宋教仁）、骚心（于右任）、力子（邵仲辉）分任写作。该报以炉火纯青自诩，视《民权报》、《中华民报》的剑拔弩张，满纸火气者，蔑如也。惟徐血儿在《民立报》上写的文章，不惜破口谩骂，但对袁个人则尚留余地。《民立报》社长为于右任，总主笔为章士钊。章学旧律，长于辩难，尝为某一问题，与戴天仇各在社论上反复辩驳甚久。至于其他种种小的环节，《民权报》与《中华民报》相同之处亦多，洵不愧为“孪生兄弟”。

《中华民报》自置印机，日刊三大张，分十二版，其分目和《民权报》相同，社论亦占一版，不足时用议论充实之。社论之末，以李定夷写的长篇小说为伸缩地步，此亦与《民权报》相同。李定夷所写长篇小说《鸳湖潮》、《茜窗泪影》，皆刊于《中华民报》，后来在上海国华书局发刊单行本。此外，《中华民报》

亦有电讯、国际要闻、国内要闻、地方新闻、本埠新闻、文艺副刊等，每张之末，有时评一则，凡此体裁均与《民权报》相同。

### 经费来源

民国初年，国民党报纸虽陆续诞生，而因经费竭蹶，基础均不稳固，视《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而语。同盟会经费尚须经常向南洋华侨劝募，自然无法筹集大宗款项以为办报基金，而报馆本身的收入，如广告费、售报费等，又远远赶不上老牌各报。同一地位和尺寸的广告，收费不及老牌报纸十分之一二。尚须广告捐客费尽唇舌，化九牛二虎之力，方拉得来。至于销报，有时且不能出租界一步，怎能不相形见绌呢？《中华民报》的诞生，后于《民权报》约半年，筹措经费之路更短。担任社长的人，对于经费来源，向来不向同人和盘托出，同人只能从旁窥见一斑。就我个人的推测，其经费的来源，有下列数端：（一）邓家彦和广西国民党巨头马君武交谊至厚。马几于无日不来馆，但在报馆无名义，亦不工作。来则谈天下棋。想来广西方面对该报有一种经常的接济。（二）副社长龚铁铮对于办报似属外行，在馆并不工作。但龚为人决非在报馆挂名的，以此揣知龚以湘人关系，必从湖南方面取得一些接济。（三）黄兴来上海时，曾两次到过该报馆，从中可以了解国民党中枢颇重视此报。（四）邓家彦入狱后，该报办理结束时，陈其美派人送来三千元，以为清偿债务，遣散员工之需。由是联想到平日必有接济。

### 谈邓家彦

社长邓家彦，字孟硕，别署望云，广西人，民元时年约三

十左右。早岁留学美国。孙中山组织同盟会，邓往加盟。中山先生颇倚重之，任为同盟会司法部长，誉为肝胆照人的磊落男子。邓美文学，故自编《中华民报》文艺版。能作擘窠大字，对客挥毫自如，《中华民报》报头及市招皆邓所书。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刺宋（教仁）案发后，上海电报局职员陆蕙生在电报房查得洪述祖自北京致上海应夔丞的电报，中有“毁宋灭邓”字样，乃告密于国民党。同时，何海鸣等在应宅搜得同样之电，遂成为破案的线索。电内的“宋”，自然是宋教仁；“邓”乃指邓家彦。袁党何以把邓家彦与宋并列，殊为一般人所不解。邓在上海，既无特殊活动，其声名又远不如宋教仁。此中自有原因：一九一二年中山先生向南京临时参议院辞临时大总统职，临时参议院乃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此本事前商定，各省均照前约投袁票，只有一票选孙不选袁，此一票即广西参议员邓家彦所投。袁世凯因此恨邓切骨。宋既毁而邓未灭，袁党乃处心积虑，作进一步的灭邓阴谋。时邓方主持《中华民报》，鼓吹反袁倒袁。宋案既起，锄袁更力，其激烈痛骂，不在《民权报》之下。袁党乃控邓于会审公廨，指为扰乱治安的乱党。至此，大家始晓然于“毁宋灭邓”的“邓”字，确系指邓家彦。原告对控案的要求：（一）逮捕；（二）引渡。租界当局果然出票拘捕邓家彦。但邓在租界内并无违法活动，乃判徒刑一年，不予引渡。是时，讨袁已经失败，袁党获胜。以邓究竟不过一文人，无足轻重，况租界当局已经给予面子，遂亦不复争执，此案即告结束。但《中华民报》本来基础不固，其经费全靠主持人的东拼西凑，讨袁失败后，国民党分子流散四方，更是呼吁无门。《中华民报》于

最后押出印机家具，自动宣告停刊，时在一九一三年的冬天。

刺宋(教仁)案发生后约二十年，即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沪宁路上海车站，发生又一次的“刺宋案”，被刺的为南京政府的财政部长宋子文。此案对邓家彦本风马牛不相及，而忽然附会到他身上，对簿法庭，真是莫名其妙的事。事实是这样的：宋子文被刺后，南京方面出巨额悬赏，务求罪人斯得，因之京沪军警和侦缉机构出动大批人员。有人忽忆及“毁宋灭邓”电报，乃牵强附会，指鹿为马，诬告邓家彦。以邓是时间居在上海法租界，乃向第二特区法院控告，把“毁宋灭邓”改为“毁宋冤邓”，诬称邓即邓家彦，是桂系要人，从前系乱党，曾在租界犯案监禁，本案恐与邓大有关系云云，目的无非为贪图赏金。第二特区法院亦见了巨额赏格眼红，就票传邓家彦出庭。邓坦然借律师到庭，说明“毁宋灭邓”的旧案。法官犹是将信将疑，仍欲暂予扣留，以待侦查。后由吴敬恒(稚晖)到院保释，邓始未再度入狱。

#### 谈龚铁铮

副社长龚铁铮，湖南人，同盟会会员。当时年龄不到三十岁，视邓家彦略小。性情激昂，平时在报馆不多发言，亦不工作。自癸丑讨袁失败后，袁世凯对曾经独立举兵的各省，用尽武力，以资镇压。三湘七泽间，为革命人物孕育之乡，尤为袁所嫉视。其时，袁进行洪宪盗国正酣，以四纵鹰犬，清除异己为手段。故派嗜杀成性的海军次长汤芑铭为靖武将军督理湖南军务。汤在湘省杀戮之惨，与后来的督军张敬尧，可称一双杀人魔王。湖南人恨汤入骨，呼为“汤屠户”。人民在暗无天日的

血腥压力之下，惟有以暗杀除暴为应付方法。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龚铁铮以地方人士身份，借故谒汤，效荆轲的秦庭一击。不中，被汤芑铭卫兵乱刀砍死于长沙之靖武将军署的会客所。龚成仁之后，卫兵奉命不准走漏消息，以便大肆搜查，株戮同党。故当时行刺情况，无人能详道之。此举虽未达到除暴目的，但自后汤不但不敢亲自接见地方人士，且对往谒者的检查更加严密。

### 谈汪洋

汪洋，字子实，别署影生，写作或仅用一“影”字，安徽旌德人，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在沈阳办报，鼓吹革命，清吏欲加逮捕，汪闻风逃至上海，匿于租界。民元之春，《民权报》创刊于沪，汪入馆编辑电讯，并写时评，笔者认识汪洋，即以在《民权报》共事故。时汪年不过四十许，已蓄仁丹式的黑须两络，三角式的双睛，炯炯有光。其人办事能力很强，但有政客气味。同事宿于馆内的约五六人，汪亦其中之一，眷口不在上海。高视阔步，与一班少年同人似多格格不入。民元夏秋之间，《中华民报》创立，汪帮助邓家彦筹备一切，驾轻就熟，颇资得力，即脱离《民权报》，转入《中华民报》。邓以总编辑名义予之，实际仍是专编电讯，写社评。后来邓入狱，汪与胡朴安、管际安三人，共同维持，以至办理结束。汪以与段（祺瑞）派要人许世英为同乡，夙有渊源，失业不久，即随福建巡使许世英由沪入闽，一身任实业、教育两科长，为许任巡按使时的亲信。

洪宪盗国，各省将军、巡按使，皆上表劝进，称奏称臣。许世英独徘徊观望，迟疑不决。政事堂右丞杨士琦乃密电许催促



具奏，谓各省奏表已到齐，独福建不至，如再延滞，祸且不测。许乃如法炮制。始之迟疑审顾，实以与段祺瑞关系甚深。段当时反对帝制，许正窥测段的态度，以定进止。迨称臣劝进之奏发出，不但时间太迟，且提醒袁党，引起注意，认为许与段勾结，祸机更急。一日，许接段密电，促速离省，星夜启行弗迟。许乃召集巡按署亲信掾属，开紧急会议。时汪洋以实业科长资格，赴台湾参观某种展览会，未及列席。会后，许立即乘外轮出发，在闽江口遇刘冠雄乘兵舰进口。刘乃奉命入闽扣留许。固未料许已先行，藏匿外轮之内，遂交臂失之。汪洋自台湾归来，福建政局已变，乃径回上海。迨洪宪垮台，中枢改组，许世英出任交通总长，乃委派汪洋为上海电报局长。后来内阁改组，交长易人，汪洋所任的上海电报局长，亦随许下台。不久，汪即去世，约享知命之年。

#### 谈殷人庵

殷人庵，湖南人，在报界资望不高，文化程度平常。殷在《中华民报》地位亦无足称道，仅是刘民畏的一位助手，襄编要闻。《中华民报》停刊后，殷人庵离馆闲居。洪宪既倒，乃投北洋军阀，充当官僚，以维生计。民国十年以后，北洋军阀政府“官灾”日益严重，除财政交通等部及几个收入富裕的衙门外，一切大小机关，都是满坑满谷的“灾官”。后来财交两部亦天天闹部员索薪事。单以交通部论，路政司最优先，航政司最倒霉，就是有收入与无收入的分别。在高“贤人”（当时的财政总长董康，交通总长高恩洪，均为雄踞洛阳的吴佩孚所青睐。京中报纸调侃之，戏称董为“圣人”，高为“贤人”。）任总长时，一天，部

员包围总长室，要求挪拨某一项专款，发放欠薪一次。高初坚决不允。群情汹汹，压倒了总长的威风。高不得已，正欲就部员写就的挪拨该项专款条子签名。突然有人从群众中冲破重围，跃至总长背后，夺去其笔杆，大声说道：“这笔款子是国家的正供，怎能由本部拿来支配发薪，总长签不得名。”群众正在诧异之际，一时视线集中于这位夺笔的人，方将驱而逐之，高恩洪利用这一刹那的时间，乘隙溜了，其围遂解。此跳跃而前的人就是殷人庵。事后，高传见殷，大加夸奖，称殷机警有肝胆，允许遇缺补金事任科长。可是不久直系保、洛分家，高恩洪且不能久保厥位，何论乎依章附木的殷人庵。

#### 谈其他诸人

刘民畏，四川人，同盟会会员。以娶于苏州，遂以苏州为家，后迁上海，生平很少回川。早岁曾游东瀛。上海《民权报》创刊，刘入馆编辑要闻，兼写论评。刘对周浩待人的吝啬刻薄，心常快快。入不敷出，经济常在窘乡，故《中华民报》创刊，即转入该报，与《民权报》脱离关系。在《中华民报》年余，工作平淡，无可称述。《中华民报》结束后，刘一度东渡。洪宪既倒，刘即返沪闲居，创设国民编译社于今淮海中路宝康里口。以基金难措，无从开展，又告失败。刘与胡汉民旧有渊源，后投奔广州军政府。一九二五年，中山先生病逝于北京，胡汉民代理大元帅，刘遂为胡幕红员。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刘任国民政府秘书(简任)兼处长，大约不到两年，病故于任所，国民党政府曾下明令优恤，并予褒扬。

胡韞玉，字仲明，别号朴安，安徽泾县人。为“南社”中坚

分子。胡在《中华民报》写社论、时评，为办理该报结束最后离馆三人中的一人。胡在叶楚傖(小凤)任江苏省政府主席时，始终追随之，任江苏省府委员兼民政厅长多年。下野后，息影上海。到《民国日报》最后阶段，胡任社长，后以病逝世。其弟胡韞琛，字寄尘，同列“南社”，与苏曼殊齐名。当年胡朴安、胡寄尘的文名，有“大小苏(东坡、小由)”之誉。胡寄尘亦去世多年。

管际安，江苏吴县人，交通大学出身。民国初元，在《民权报》任特约撰写。《中华民报》创刊，管入馆编辑地方新闻，兼写时评。以长期住宿馆内，常助邓家彦处理经理部及印刷方面的事务，为该报坐镇的一位柱石，最后为办理清理结束三人中的一人，后来又入《民权报》任编辑，以迄停版。《民国日报》刊行二十余年，管始终其事，但来来去去，亦有多次，管钻研昆曲极精，有很多关于昆曲的写作。其弟久安，亦当年报人之一。

### 三、左支右绌的《民国日报》

上海《民国日报》诞生在上海租界之内，创刊于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三七年抗战停刊，与世人相见者二十年。自创刊至一九二七年，此十年间，为军阀统治时期。该报行销地点，始终不越租界范围，纵使有时打破此关，但时间亦极短。自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该报始得行销内地，至停刊为止，又为十年。但其时作为国民党中央喉舌的，并不是《民国日报》，而是《中央日报》。

《民国日报》日刊两大张，后来改为三大张。当时上海的报纸，如《申报》、《新闻报》，等等，争以张数多相竞争，除平时

刊行四五张不等外，一至星期日，则各种专刊尤多。《民国日报》经济力量薄弱，无法在篇幅多少上与《申报》、《新闻报》等相抗衡。人员薪给，不但赶不上其他报馆，且常常欠薪和零支。

《民国日报》人员之进退，视《申报》、《新闻报》等迥异，往往有进进退退至五六次的。有高就则走，无饭碗则来，在上者以感情请来帮忙，在位者完全是借以度日，以遂其躲避风雨之意，故视进退如极平常之事。例如管际安，在《民国日报》资望极老，而倏来倏去，曾经五六次，无非来是帮忙性质，去是衣食作用之故。下列两表，甲表为创刊初期之阵容，乙表为最后行将休刊之情况，分别志之，以概其余。

甲表：

经理部经理 邵力子；

编辑部总编辑 叶楚伦；

电讯 叶楚伦；

要闻 朱宗良(先)、潘更生(后)；

本埠新闻 邵力子(先)、管际安(后)；

地方新闻 于秋墨；

“觉悟” 邵力子；

“民国闲话” 管际安；

乙表：

社长 胡朴安；

经理 管际安；

电讯 钱沧硕(先)、胡惠生(后)；

国际要闻 袁业裕；

本埠新闻 江红蕉、管久安；

采访 胡中一；

教育 朱翊新；

文艺 鲁思。

“觉悟”和“民国闲话”，一则表示其主张真理，一则对军阀加以讽刺。到国民党定都南京后，自然不再刊行，由是代之以“教育”和“文艺”。昔日讨伐复辟，抨击贿选，鼓吹北伐，等等，《民国日报》也曾崭露头角，后来则尽成过去矣。

## 《商报》琐闻

张秋虫

在三四十年前的上海，有几张“新报”，如《中华新报》、《民国日报》、《新申报》、《神州日报》等等，而《商报》尤为突出，从呱呱堕地之日起，至寿终正寝之时止，始终“叫好不叫座”。

《商报》应交易所的潮流而生，初出版时，声势甚状，崭新的字型、编排，俨如报坛异军突起的“少壮派”。创办者粤人汤节之，是一个很会活动的人，报纸上每天可以看到他的名字。此人作风与马路政客有点相似，与一些交易所经纪人有相当的渊源，雄心勃勃，很想压倒《申报》、《新闻报》和《时事新闻》，一鸣惊人。因此，报纸未出版前，便已先声夺人，同业都侧目而视，一般读者也亟欲先睹为快。

谁知事出意外，好容易盼到了出版之期，偏偏任何一条马路都找不到一个叫卖《商报》的报贩。原来天还没有亮，报纸就印好了，印的份数也很多，并且全部批给了报贩，可就是报纸无法送到读者的手中，真是咄咄怪事！报馆里的人起先还以为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大家忙了几天，准备好好休息一下。不料有许多热心的读者纷纷直接到报馆里来购买、询问，这才如梦初醒，得知大事不妙。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新闻报》和《申报》是资格最老、牌

子最响的两张报纸，尤其是前者，由于它的读者大都是商人，销行最广，势力最大，全国闻名，《商报》也是以商界为主要发行对象，想抢《新闻报》的生意，这一点就触了《新闻报》资方之忌。何况《商报》创刊之先，大吹大擂，锋芒毕露，确使《新闻报》受到威胁，再加上《商报》别出心裁，特辟《商业金融》一栏，声称每天用两个全版地位，专刊经济新闻，商业行情，预料一定能博得商人的热烈欢迎，这是《新闻报》过去从未想到的一着棋子，未免相形见绌。因此，《新闻报》资方由妒生恨，必欲除之而后快。

当时报纸的发行，须假手于报贩。望平街（现在的山东路）上报贩头子有四大金刚蒋顺卿、王春山等，他们有背景，有党徒，稍不如意，就要聚众行凶，谁也不敢得罪他们。每一张新报纸问世，就是他们发财的好机会，批发折扣大得吓人，头三天必须全部奉送，分文不取，算是给他们的买路钱。即使你完全依照他们的条件，他们也还是多方刁难，任意索取。《新闻报》的汪老板和他们是多年的老交，关系密切，既然处心积虑要扼杀这初生的《商报》，就决定来个釜底抽薪，暗下和几个主要的报贩头子谈好叫他们表面上对《商报》表示亲善，愿意积极推销，批出来的《商报》照单全收，但一转手，却原封不动地马上送到废纸店秤斤卖掉，使市面上看不见一张《商报》。报贩头子一来可以讨好大老板，二来可以获得一笔额外的酬金，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单单苦了《商报》，刚刚抛头露面，就被打了一闷棍。

等到《商报》馆查明真相，时已近午。《申报》和《时事新报》

方面得知上项消息，也忿忿不平，一齐自告奋勇，仗义支援。好在有现成的纸型，赶紧重新浇好铅版，三家报馆的轮转机同时付印，才能大批添印出来，并直接雇人四处分送出售。但是，一日之计在于晨，报纸全部印好已在午饭之后，日报差不多变成了晚报，给读者的印象很不好，销行受到影响。不久，交易所相继宣告破产，汤节之又因席上珍一案身入囹圄，《商报》转让给镇海人李征五。此人手腕和气魄都比较差，《商报》愈加一蹶不振。

那时国内新闻来源甚少，除了路透、电通，几家外国人所办的通讯社外，电讯寥寥无几。各报营业竞争，全靠派驻外埠的记者逐日拍发专电支撑门面，每月所耗电费为数很可观。《商报》销数惨跌，广告稀少，经济来源仅仅依靠张宗昌（张系李征五旧部）的津贴和傅筱庵（通商银行）的借垫，时断时续，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往往连买卷筒纸的钱都要临时筹措。穷到这个程度，哪里有许多钱来拍发专电。至于新闻，外埠寄来交换的报纸很多，还可以利用剪刀浆糊，改头换面地抄登几条，无奈专电以迅捷灵通见长，是无从剪抄的。没有办法，于是挖空心思，想出两字诀：一是“化”，化整为零，化少为多，化无 为有，化旧为新。二是“偷”。偷的第一步，是从电报局里打开一条门路，和一个电报生恣季方取得联系，酌给若干津贴，由他将经手译递的各报专电偷抄一份供给《商报》。这样一来，《商报》的专电居然充满篇幅，应有尽有，每月只花数十元的津贴，却可节省数千元的电费。谁知日子一久，《新闻报》方面发觉两张报纸的专电每天都大同小异，觉得事情十分蹊跷，当即向电报



局大办交涉，经查出弊端，宓季方的饭碗马上敲碎。《商报》馆不能不对他负责，只好把他安插在编辑部里翻译电报。潘公展是电讯部的主任编辑，两人比较接近，有时宓季方见潘公展穷得点心钱都没有，便掏腰包买两只大饼给他吃。后来潘公展任社会局长，需要班底，宓季方当然也是夹袋中人物，相随走马上任，先充会计，后升科长，总算因祸得福。由于这一件事，《商报》和《新闻报》的仇恨越结越深。

最后，李征五智穷力竭，支持不住，索兴将《商报》交给乌崖琴、洪雁宾两人，傅筱庵便由债权人成为后台老板。一九二七年被迫停办。上海沦陷时期，伪统税局长邵式军曾办过一张《上海商报》，销数少得可怜，旋即无疾而终。抗战胜利以后，潘公展和严聘声曾合办一张《商报》。但这两张《商报》都与最初的《商报》无关，不过名称相同而已。

# 上海小报史料

平襟亚

## 一、对阿英同志《晚清小报录》的补充

阿英（原名钱杏邨，又署钱谦吾）于一九三九年九月写成《晚清小报录》，后于一九五六年加以修正，在上海《文汇报》上连载十四日。原文收集了二十六种小报的资料，<sup>①</sup>作了客观的叙述和评价，对研究我国报刊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其中有些阙疑部分，现就我所知，补充如下。

（一）关于小报的起源，民初《中华新报》陈伯熙编著的《老上海》（泰东书局出版）第十五节《小报之原始》，曾有下列记载：“上海初未有小报，自申左梦晓生、高窗寒食生，暨现在希社社长高太痴，以及仓山旧主等，评花品叶，鼓吹风雅，始有小报。而最著名者为南海吴趼人、毗陵李伯元所主持之《繁华报》，一时有‘花园春秋’之誉。时下名人如潘老兰、陈巢南等，亦曾办过小报。彼时小报势力甚巨，一字褒贬，有华袞斧钺之

<sup>①</sup> 阿英同志发表的二十六种小报的资料是：(1)演义白话报；(2)趣报；(3)通俗报；(4)世界繁华报；(5)游戏报；(6)笑林报；(7)采风报；(8)寓言报；(9)消闲报；(10)笑报；(11)春江花月报；(12)及时行乐报；(13)支那小报；(14)飞报；(15)娱乐日报；(16)方言报；(17)苏州白话报；(18)捷影报；(19)花天日报；(20)海上文社日报；(21)阳秋报；(22)上海白话报；(23)花世界；(24)鹤立报；(25)蝴蝶杂志；(26)国魂报。原文自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一日起在上海文汇报上连载。

概，非若光复以后上海之小报，价值一落千丈也。”据此，上海小报在发轫创刊的时期，虽然多谈风月，而报格未尝不高。到辛亥前后，因有些人藉端敲诈和刊载淫词秽事，报格愈趋低下，报纸因案被封及主编者被司法机关拘讯者时有所闻，自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〇年，上海小报存在者，已为数不多。

(二)《老上海》一书中的《巡捕房惩罚小报汇志》又云：“小报创始于清光绪丙申(一八九六年)，至光绪末年(一九一一年)已成强弩之末。迨清末民初，小报之被巡捕房封禁或惩罚者不知凡几。”现举其概略于下：

(1)《阳秋报》案。《阳秋报》系山阴人任董叔所办。任为画家任伯年堂弟，曾接办《世界繁华报》，后办《阳秋报》。当时有苏州人张氏兄弟，父亲刚死，先后挟巨资来上海狂嫖滥赌，《阳秋报》给他们分别起了“七里完”和“要紧完”的绰号。吴俗，人死后四十九日称“七里”，这两个绰号都是讽刺他们父死不久，即急于把家产花光。张氏兄弟怀恨在心，托人送款疏通，董叔不理，依然在报上斥骂，他们乃买通包探，而会审公廨起诉，董叔避去，报纸被封，这是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夏间事。一说当日《阳秋报》上所说的张氏兄弟，实指董叔同乡孙直斋兄弟。直斋寄居常熟，为地主兼买办，后在上海汉口路开设惠中旅馆。此事经过，阿英同志未载，特补叙之。

(2)《笑林报》案。《笑林报》于宣统年间由新舞台伶人夏月珊接办，后转让于邑绅沈纓云。不久沈办《民立报》，《笑林报》成为《民立报》的附刊，日出一大张，由刘束轩主编。有次编辑陆某在报上发表淫秽文章，被巡捕房控诉，罚洋三十元，禁

止出版。这也是宣统三年夏秋间事。阿英同志说，《笑林报》创刊于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何时停刊不详，也为补叙。

（3）《采风报》案。宣统年间，《采风报》主人为画家俞达夫，编者为其弟子汤邻石。有天该报从《笑林报》上抄登一篇淫词，被巡捕房传讯，由会审公廨判令停刊，主编押禁一月。这事发生在《笑林报》被禁后一月余。接着，俞达夫主办的另两种小报《花世界》和《花天日报》也自动停刊。阿英同志说，《采风报》创刊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由南海吴珥人主编，想是早期情况。

（4）《国华报》案。该报出版人为吴大焘，主编为徐馨荃，此人平日很少在外交际，但每天撰写一篇《花界新闻》在报上发表，纯系道听途说，或向壁虚造。有天听说，名妓谢某怀孕数月，被鸨母勒逼坠胎身死，他即发表文章予以揭露，为老鸨所控告。经会审公廨查明，谢某坠胎确有其事，但并未致死，结果徐被罚款五十元，报纸幸未停刊。这是宣统三年八月的事。

（5）《新笑林》案。一九一二年，刘束轩创办《新笑林报》，不用铅字用石印，并根据每日各舞台的重要剧目，刊登插画，别开生面，风行一时，每日发行最多时在二千份以上。后巡捕房认为它是已被查禁的《笑林报》的变相复刊，勒令停止出版。

（6）《滑稽魂》案。该报系宁波人华贵所办，自任编辑。出版仅半个月，即因刊登淫词，被巡捕房传讯，自动停刊。

（7）《黄浦潮》案。《黄浦潮》报是钱业职工所办，由徐馨荃主编。当时中华大戏院聘名武生俞振庭来沪演艺，俞好狎妓，徐在报上予以抨击，词涉淫秽，为捕房传讯，勒令停刊。

以上三报，阿英同志均未提及，爰为补叙。

## 二、民初一度风行的“鸿福报”

民国初年，上海小报所存无几，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八年，出现了一种藉报行骗的所谓“鸿福报”。这种报纸既非大报，又非小报，每日出版一大张或半张，七拼八凑，毫无内容，虽声称在上海编辑发行，但本市看不见一张报纸，专向外埠征求预订。其行骗的方法是附一张白纸，称为“鸿福券”，如在火上烘熨，出现一个“福”字，凭券订报一年，随付报费五元，即赠“金表”一只。其实每张券上都暗印“福”字，所谓“金表”系向日本购来的铅质镀黄玩具，价格不满一元。接到券的人不知底蕴，以为得到“鸿福”，纷纷寄款订报，及知上当，远道交涉不便，只得自认晦气。当时用这种方法行骗的有好几家，都大发其财。

始作俑者是苏州人王薇伯，向在日本做滑头生意，娶日本老婆，到上海后，用“鸿福券”出版《商务报》，数月之间订出二千多份，骗得一万余元，即停止出版，逃往日本。接着有《民报》、《民魂》、《民达》、《大华》、《大中华》、《新共和》、《大声》、《民粹》、《舆论》、《大公》、《昌言》、《沪报》、《中外时事》、《中外大事汇报》等十多家，都以“鸿福报”为发财捷径，外地订报者受害不浅。其中《沪报》是郁某所办，在山西路租一客堂间，用“鸿福券”行骗，订出三千多份，骤获万余金，居然自办机器，发行近两年之久，事未败露。《民粹报》系原《商务报》茶役名尧臣者所办（其姓已忘），设于老垃圾桥浜北之小弄堂，

在一九一六年初夏，用“鸿福券”征求订户，得款八千余元逃走。《新共和报》设在劳合路（今六合路），其行骗之术，除赠送“金表”外，还订有入股章程，每股十二元，凡入股者可得“台钟”一座（亦系日货玩具，每只仅值一两元），外地受骗者也不在少数。

当时上海的日报公会接到外地寄来的控诉信日有数起。调查之下，这些“鸿福报”确在出版报纸，且每日邮寄不断，而得款潜逃的人又始终未查获，因此无法处理，只得登报声明，这类报纸未入公会，恕不负责，但请各自谨慎，免受其欺。这类报纸，到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春间，尚存四家——《昌言报》、《公言报》、《中外时事报》和《中外大事汇报》。后因纸老虎被戳穿，订户绝少，终于支持不住，逐渐消灭。

### 三、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的上海小报

一九一八年，除上述四家“鸿福报”外，有小报十几种，其性质不同于以前的小报，出版者大都不是个人，而是依附于某一机构或团体，主要成为这些机构、团体推广业务的宣传品，与以前供文人雅士吟风弄月者不同。其中有：

（1）《大世界报》，附属于大世界游乐场，主编人孙玉声，别署海上漱石生，曾著《海上繁华梦》小说，后为《繁华杂志》社主任，大世界游乐场未开幕前，系《新世界报》总编辑，兼为黄楚九的秘书。后黄楚九脱离新世界，别创大世界，孙即随之主编《大世界报》，并聘天台山农刘青（字照藜）为助理。经常写稿者有朱瘦菊、朱大可、陈秋水、朱染尘、钱香如等，图画主任

为阙十原。日出四开一张，正面全版刊登大世界游乐场当天的各项表演节目，其余版面为文艺小品，包括诗词、杂文、笔记、灯谜、小说、图画等，并附交换券一张，积满三十张可换大世界游券一张。每日报纸除在大世界场内出售外，各报摊上亦代售，每张铜元一枚，日销近三千份。

(2)《新世界报》，附属于新世界游乐场，原由郑正秋任主任，总编辑为奚燕子，号生白，浦东人，工词章，著有《燕子吟》诗钞。经常写稿者有张桐花、周瘦鹃、姚鹓雏、闻野鹤、陈小蝶、戚饭牛、周剑云、汪切肤、范君博、姚民哀等，图画主任为孙雪泥，更有丁悚、杜宇等经常作画。版面与《大世界报》略同，文艺内容以通俗为主，分门别类，有“言论世界”、“粉墨世界”、“小说世界”、“风月世界”、“滑稽世界”、“怪异世界”等栏目，并曾举行过三次“花国选举”，轰动一时。后郑正秋脱离该报，改聘杨尘因为编辑。每日报纸也附交换券，积满二十张可换新世界游券一张。每日也可销三千份左右，售价十文。

(3)《劝业场报》，附属于邑庙后门的劝业场(后改称小世界)，总编辑为别署苦海余生的刘沧遗，经常写稿者有李定夷、蒋著超、刘豁公、胡寄尘、张恨水等。版面风格与《大世界报》、《新世界报》相仿，主要为场内各游艺项目作宣传，交换券积满三十张可换门票一张。因劝业场营业始终不振，日销仅数百份，三个月后停刊。

(4)《新舞台报》，系新舞台的机关报，内容注重剧谈，实际专为新舞台艺人捧场。主编郁慕侠，写作人多为研究戏剧

者，如冯叔鸾（别署马二先生）、冯小隐、刘豁公、周剑云、管义华、詹脉脉、恽秋星、沈木公等。亦有交换券，联号十张，加洋一角可换戏票一张，但星期六、星期日不通用，故销路不佳，每日发行不满一千张，用代戏日，售价十文。

（5）《大舞台报》，刘束轩所办，性质与《新舞台报》同。

（6）《新游戏报》，亦为刘束轩所办，主笔谢慧禅。日出一张，内容大都剪自他报，惟花史与剧谈，每日请人写新稿，大都临时拼凑，每则数十字，稿酬仅小洋一角。

（7）《图画剧报》，以登各戏院戏剧广告为主，由郑正秋创办，后让给詹禹门经营。内容皆剪自他报，销数不满一百份，赖广告收入维持。

（8）《电光日报》，在当时小报中资格最老，发行四年余，经理人吴书箴（别署大慈），先后主编者有沈情虎、顾粉郎，写稿者有天笑生、任董叔等，文字雅驯，颇堪一阅。后因销路不佳，日渐低落，日销只一两百份。

（9）《友声日报》，系寰球学友会所办，投稿者限于会友，以研究古典文学为主，主任倪秩池、张织荪等，皆浙东文坛宿儒。日销一千份左右，每张十文。

（10）《小说日报》，一九一八年出版，日出六开两张，内容以文言小说为主，笔记诗文为辅。编者徐枕亚，作者有徐天啸、吴双热、吴绮缘等，与后来的《小说日报》不同。出版数月即停刊。

（11）《五铜元报》，出版时稍后于《小说日报》，内容及作者大致相同，但编者为吴双热。三天或五天出版六开一张，售



铜元五枚，不久即停刊。

(12)《小日报》，一九一八年出版，最初为韩天受、张丹斧等编辑，日出六开一张，内容以时事小品文、诗文笔记为主，历时半年左右即停刊。一九二三年复刊，日出四开一张，由黄光益先后延沈吉诚、冯梦云等编辑，直至一九四八年停刊，历时二十余年。

(13)《晶报》三日刊，原系《神州日报》的附张，一九一九年三月，由余大雄接办，独立发行，每期六开一张，一开始即以“小报之王”自居，不屑与其他小报为伍，在风格上上承封建文人之风月闲情，下开黄色小报的先河，且出版时间较长，在上海小报史上颇有影响。余大雄系安徽人，日本留学生，专事联络当时较有名的作者，组织稿件，人称“脚编辑”。历届主编有张丹斧、孙东吴、刘襄亭等，都是科举出身的封建文人。创刊时正值五四运动高潮，该报作风保守，对白话文、新体诗多所讽刺，报上除长篇小说偶用白话文外，余皆文言及旧体诗，后各报通用白话，才稍稍改变。经常撰稿者有袁寒云（袁世凯之子）、张丹斧、钱芥尘、孙癯媛、包天笑、毕倚虹、江红蕉、俞逸芬、汤修梅、黄转陶、冯叔鸾、张镠子等。初期刊有李涵秋的《麦克司光录》、袁寒云的《辛丙秘苑》（记洪宪称帝前后的内幕）颇引人注目。其次张丹斧的诗词，毕倚虹的小品文，周越然的短文，冯叔鸾、张镠子、冯小隐等的剧评，也受读者欢迎。因此行销蒸蒸日上，在当时小报中首屈一指。

这一时期，除以上各报外，还有《飞艇报》，由詹禹门主编，日销仅十余份；《鸣报》，黄佑泉主编，日销亦仅一二十份；

《小新闻》，由颜问生经理，聘陈耕渔为编辑，月薪仅两元，销数亦少。

#### 四、一九二〇年至抗战前的上海小报

自《晶报》兴起，风行一时后，争相仿效的小报越来越多，种种名目，不胜枚举。其间有所谓“横板”潮流，如《老门槛》、《美的晶报》、《真快乐》、《新笑林》、《幸福报》等，均以六开报纸横排，还有印刷较为精致的画报，如《三日画报》、《上海画报》、《骆驼画报》、《香海画报》、《图画日报》、《摄影画报》等，大都用道林纸彩色印刷，六开一张，拥有一定读者。其余仿效《晶报》的小报，有：《风人报》三日刊（贡少芹父子主办兼编辑），《光报》三日刊（前期由姚吉光主办，后期由徐善宏、易立人主办），《春华报》三日刊（赵君豪主办，张秋虫编辑），《星报》（广告商胡雄飞主办），《繁华报》（广告商来岚声主办），《新华》报（由上述两报合并出版），《上海报》（巨商匡仲谋主办），《上海晨报》（日出大型对开一张，潘毅华、赵君豪合办，张秋虫编辑，其副刊属小报性质），《新上海报》（广告商钟鼎臣、潘毅华合办，芦溢芳编辑），《响报》（潘毅华办，张秋虫编），《报报》（《时报》记者胡慈珠办），《铃报》（广告商徐善宏办，芦溢芳编），《明镜报》（凤昔醉办，宋痴萍、顾肯夫编），《废话》（湛小岑办，张慧剑编），《森报》（黄春荪办，曹梦鱼编），《真报》（何煮石编），《火报》（前期林步屋办，后期陈蝶衣办），《大日报》（吴农花编），《福报》（吴农花编，胡雄飞出版），《梨园日报》（孙玉声编，梨园公所出版），《平报》（张春帆办，自兼编辑），《上海滩报》

(为昶、黄冠卿办)，《新潮报》(吴农花办)，《罗汉》(张心影办)，《晓报》(刘豁公办，自兼编辑)，《商声报》(董某办，专为推销商品)，《时代日报》(来岚声办)，《星光》(胡雄飞办)，《星报》(苏州星社办)，《洪水》(洪洪水办)，《大上海》(杨赫父办)，《正气报》(郑子褒办)，《吉报》(姚吉光办)，《香槟》(姚吉光办)，《礼拜六》(蔡钧徒办)，《大罗天》(冯梦云办)，《琼报》(刘韵芳办)，《探报》(胡慈珠办)，《翡翠报》(郑子褒办)，《心潮》(周世勋办)。这些小报大都随出随停，此起彼灭，内容人云亦云，无突出之处，销数也极少，远非《晶报》可比。

在此期间，比较正派能与《晶报》抗衡者，有以下一些小报：

(1)《金刚钻》报，系施济群创办，原为三日刊，后改日刊。经常写稿者有朱大可、陆淡厂、郑逸梅、王小逸等。出版至抗战前夕，历十余年，销路与《晶报》相埒。常与《晶报》展开笔战，为读者所注目。

(2)《大晶报》，冯梦云办，自兼编辑，其文笔锋利，喜撰政治论文，在当时小报界有敢说敢言的作风。出版至抗战军兴，自动停刊，历十余年。上海沦陷后，冯因参与《文汇报》抗战版事，被日军逮捕遇害牺牲。

(3)《铁报》，毛子佩办，初期由谢豹编辑，出版时期稍后于《大晶报》。初为三日刊，后改日刊，至抗战前夕停刊。抗战胜利后复刊，直至上海解放。

(4)《福尔摩斯》报，吴微雨、胡雄飞等合办，其特点是专载社会新闻，每日刊登的小品文亦以揭露官僚买办的隐私为

主，报名“福尔摩斯”意即在此。出版至上海沦陷为止。

(5)《社会日报》，日出四开一张，初期由胡雄飞主办，陈灵犀编辑，后胡退出，由陈接办。内容比较严肃，一度连载汪优游著的《上海俗话图解》，别具一格，为读者所欢迎。

(6)《罗宾汉》报，创刊于一九二六年，朱瘦竹编辑，专载上海戏剧界动态、消息，在各小报中别树一帜，一直发行到抗战胜利，为当时爱好戏剧者所欢迎。

(7)《东方日报》，创刊于一九二九年，初由顾尔康、徐善宏合办，唐大郎、徐大风、龚之方等编辑，后由邓荫光接办。当时上海新兴一种回力球赌博，该报特辟专栏，由史悠宗兄弟编辑，专载回力球场消息，预测胜负，引起参加赌博者注意。后史氏兄弟因赌博倾家荡产，报亦停刊。上海沦陷后一度复刊。

(8)《上海日报》，千兰荪办，王雪尘编，经常刊登黄色文字，风格低下。

(9)《明星日报》，陈蝶衣办，出资人是陈公博。创刊于一九三〇年，至抗战前夕停刊。

(10)《开麦拉》报，龚之方办，专刊电影消息，出版历时不久。

(11)《金融日报》，性质不同于一般小报，每日出一小张，专刊金融市场消息，分送各市场和商店，每月收费一元二角，出版历时较久。

(12)《市民日报》，葛福田编，性质也不同于一般小报，名为《市民日报》，其言论却大都为外国人作喉舌，很少见刊

登为上海市民张目或有正义感的文字，出版时间也很短暂。

## 五、抗战时期的上海小报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淞沪战役后，上海小报一度绝迹，成为真空状态。直至国民党军队西撤，上海沦陷，租界成为孤岛后，才陆续又有小报出现。其中有的是旧报复刊，有的是新报创立，有的借小报对敌伪进行冷讥热讽的斗争，有的则甘心投敌、附敌，或散播色情腐化、醉生梦死的情调。

旧报复刊的有以下几种：

(1)《社会日报》，仍由陈灵犀主办，初期仍保持严肃风格，后来公然刊布麻醉性的腐化色情小说，如署名“捉刀人”所写的《鸾和散辑》等；还有宣扬扶乩等迷信神鬼的文字，报格低落，为读者所惋惜，至抗战胜利后停刊。

(2)《东方日报》，主办者仍为邓荫光，编辑有冯若梅、杨复冬等，经常写稿的有唐大郎、徐子风、汪北平、陈亮、徐晚萍、陈德珍等。内容与战前略同，但有一版专载跳舞场消息，由舞女大班陈耀庭编辑。在所刊色情小说中，有周天籁所写的《亭子间嫂嫂》，长篇连载，荒唐不堪。该报至上海解放前始停刊。

(3)《上海日报》，主办及主编人仍为王雪尘，编辑有胡澄清(笔名温那)、王摩尔等，作者有邵西平、曾水手(曾淹)、杨乐郎、潘勤孟、张青子、席曙天等。该报风格低下，王雪尘的《白雪泼墨》以寻衅逞强为能事，自夸“大张挞伐”，因有“王挞伐”的浑名。版面除有四分之一专载京剧界新闻和剧评外，颇

多淫秽文字，是当时典型的黄色小报，一九四三年曾被禁止出版。后改名《繁华报》，至抗战胜利后停刊。

(4)《晶报》，原系余大雄创办的老牌小报，孤岛时期出盘给钱芥尘接办复刊。总编辑为关某，版面与以前不同，兼登日伪“同盟社”的新闻消息，明眼人一望而知其已投向敌伪，因此失去读者，不久即停刊。

他如《罗宾汉》、《戏世界》、《戏报》也先后复刊，内容无大改易，抗战胜利后相继停刊。

抗战时期新出的小报，有以下几种：

(1)《力报》，主办人胡力更，编辑有金小春、余尧坤、顾亚凯等。胡系排字工人出身，后开设印刷所，故在该报排版方面有所革新，通版密排，不夹铅条，并将原来各报通用的五号铅字改用六号，尽量充实内容，增添文字，力求薄利多销，为读者所欢迎。又对经常写稿者创行包月制度，每天派人向作者取稿一篇，月给稿费若干，简而易行，以后他报多仿此法。该报在抗战胜利后停刊。

(2)《新报》，创刊于一九三九年，主办人陈某原为《大晶报》印刷所工人，内容并无特色，不久即停刊。

(3)《国报》，创刊于一九四二年，系敌伪所办，公然刊登敌伪消息，市民很少购阅，不得不街头张贴，数月后即停刊。

(4)《锡报》，系无锡地方报移沪出版，由吴礼巖主办，无甚特色。

(5)《中国影剧画报》，由龚之方、洛小洛等主办，用米

色道林纸印刷，四开一张，专载电影戏剧消息及图片。

(6)《光化日报》，由复兴银行出面主办，实际是汉奸出钱，编辑有唐大郎、龚之方等，内容一般化。

(7)《海报》，附在汉奸周佛海所办的《平报》出版，编辑有汤修梅、周挹农等。该报特点是不公开登载敌伪消息，企图在消闲解闷中，麻痹人们的意识，至抗战胜利后停刊。

(8)《鸣报》，系汪伪《中华日报》所出版的小报，编者杨某。

(9)《小报》，袁殊主办《新中国报》所出版的小报，不久即停刊。

## 六、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小报

抗战胜利，当国民党接收上海时，小报只有《铁报》一家，是毛子佩出面接收《海报》改头换面出版的。那时国民党规定出版报纸，必须申请中宣部批准，发给登记证，实际上是要钳制舆论，因此没有国民党背景的，即使提出申请，也不会批准。

为了应付这种局面，于是小报界中人想出一个办法，不出报纸，改出“方形周刊”，一张新闻纸印八面，折叠成方形，象刊物一样，每周出一期，只须向社会局登记，便可发行。其实内容和小报一样，大量登载内幕新闻、社会新闻和风花雪月的东西，曾经风行一时。先后出版的有《海风》、《海光》、《快活林》、《香海》、《东南风》、《新上海》、《沪光》、《星光》、《大上海》、《万象》、《是非》、《黑白》等，不下百数十种，编者和写作者大都是昔日办小报的人，换汤不换药。

方形周刊流行了一年光景，逐渐消灭。这是因为国民党标榜“言论自由”，拉拢舆论界，对批准办报，稍稍放宽尺度，同时报界中人摸清底细，聘请国民党员或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人为社长或发行人，出面申请登记，给以一定报酬。因此后来有些小报，如《小日报》、《幸报》、《晶报》、《话报》、《东方日报》、《真报》、《诚报》、《世界晨报》、《飞报》、《小报》等，陆续出版，内容一如往昔，无大变更，只是有闲阶级消愁解闷的读物。

当时国民党善后救济总署分配美国剩余物资，主管部门有时分配官价火油，自一九四八年起每季分配官价外汇，各小报也和大报一样，得到小恩小惠，但只是报馆老板独得，写稿者很少沾其余沥。当时上海的小报及其从业人员都不算上海新闻公会会员，但在进行伪国大选举和市参议员选举时，也有些大亨将各小报人员作为新闻界的成员，从而操纵一定数量的选票，随心所欲地加以利用。在反动政府末日将临之际，常有欺骗人民的反共宣传材料，由特务机关分发给各小报负责人，但一般编者很少采用，他们明知这些材料违反人民意志，登载了不受读者欢迎，怕影响销路，特务们不敢强迫登载，只得各听自便。此外，一些贪污不法、搜刮民脂民膏的官僚，惧怕小报揭其隐私，往往借公济私，讨好小报中人，给以小惠，要求不攻击、别谩骂，两者之间形成了“欢喜冤家”的关系，其实就是贿与卖的关系。

## 七、解放后的上海小报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时，有小报《铁报》、《飞报》两家



仍在出版。数周后，经人民纷纷向党报提出意见，两报自动停刊。不久，有《大报》与《亦报》以革新的面貌出现。

《大报》主办人为冯亦代，编辑有陈蝶衣、陈亮、吴崇文等。日出四开一张，第一版全载电讯及本市新闻，第二三版刊登小品文及长篇连载小说，第四版为影剧专刊。小品文作者多数为《铁报》基本撰写人，但态度比较严肃，扫除了过去的黄色气氛。

《亦报》主办人为龚之方，编辑有唐大郎、孙毓刚、胡澄清等。形式、编排及小品文风格与《大报》相仿。所刊长篇连载，有揭露国民党蓝衣社内幕的《四凶传》和张爱玲的小说《十八春》。

这两家小报都是私人经营，有一定规模，内部组织分经理、编辑、采访、图画、发行、广告等部门，各有职工二三十人，每日销数在二万份左右。

小报在上海具有近百年的历史，在社会上有相当数量的读者。解放初期利用这种旧形式，针对原有读者群众，进行宣传，有一定的作用。但所有的编者、作者几乎都是旧人员，思想未经改造，政治认识模糊，而在彼时正当新旧交替之际，百废待举，党和政府对这类私营小报无暇顾及，只有一位党员同志李之华（已去世）对两小报兼负指导之责。随着形势的发展，到一九五一年，两报突出有下列两现象：（一）内容偏重于描述旧社会的坏人坏事，对新社会的好人好事很少重点报导，特别是对工人阶级热火朝天的生产干劲，在作者笔下表达不出来，或表达得不够透彻。（二）两报销路有减无增，三反、五反以

后，销路下降更为显著。一九五二年春间，在党和人民政府关怀下，两报劳资双方研究结果决定将两报合并，藉以充实内容，争取读者，经领导部门批准，将《大报》并入《亦报》。

合并后销数仍不见增加。同时报社人员参加新闻界思想改造运动后，通过学习，初步树立了阶级观点，认识到“大”、“亦”两报基本上仍是资产阶级趣味性的读物，不能适应新社会群众的需要，因此一致向领导部门提出了停刊的要求。经领导上考虑结果，肯定了“大”、“亦”两报在镇反、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同时接受了报社人员的要求，批准自一九五二年十一月起停刊，并对报社人员作了妥善安排，一部分转入《新民晚报》工作，一部分进上海新闻学校学习一段时期，另行分配适当工作。至此上海小报得到了完满的结束，成为历史上的陈迹。

# 上海报纸琐话

丁 悚

## 一、各报的文艺副刊

清季上海刊行的报纸，以我所见，有《申报》、《新闻报》、《同文沪报》、《南方日报》、《中外日报》、《时报》、《时事新报》、《民立报》、《民呼日报》、《民权报》、《民国日报》以及《大共和》、《神州日报》等十余种。申新两报发行较同文、南方等报为早。那时还未有白报纸，所以用油光纸单面印刷。这许多报纸，起初都没有另辟副刊一栏的。偶有诗文、小说等文艺作品，大多附于新闻之后。唯有《同文沪报》另刊副张《消闲录》，专登小品文字及诗词歌赋等作品。专登小说于正张要闻之后，则以《时报》为最先，作品多数是包天笑、陈冷血及周瘦鹃等译著，但还没有另辟专页副刊。

自民初起，各“民”字头报，如《民立报》、《民权报》等才特辟文艺专栏。《申报》辟《自由谈》，由王钝根主编。《新闻报》不甘落后，亦增辟《快活林》，由严独鹤主编。及“九·一八”事变发生，国难方殷，编者觉得不宜再用“快活”两字，影响群众爱国抗敌热情，遂改名《新园林》。《时报》辟《小时报》，似在申新两报之前，报刊之有插画，也较申新两报为早。《小时报》的编

务，系毕倚虹和贺乡垞等主持，小品文字皆极精警，颇受读者欢迎。同时征求外稿，酌酬稿费和书券。《时报》主人狄楚青开设有正书局，与报社比邻，有正书局出版的刊物偏重古今碑帖和写真版印行的古画。《小时报》同时又增《特约马路电》一栏，专写街头巷尾的小新闻，字数不满一百，每条稿酌大约一两角，或酌酬书券。投稿的人很多。后来由曾著《广陵潮》小说成名的李涵秋主编务。李初次从原籍扬州莅临上海，又以年龄关系，平日深居简出，和外间极少接触，甚至对新设置的电梯也不解其为何物，其他情况，隔膜更多。时有一班年少好弄笔墨者，故意恶作剧，匿名杜撰消息一段，大意为：昨夜天蟾舞台名角登台，卖座空前，四层楼包厢全部客满，电梯上下更形忙碌云云。事实上天蟾舞台根本没有四层楼，更无电梯设备。李涵秋竟未觉察，一字不改地照登，明日报出，读者大哗。

《自由谈》取稿内容和《小时报》微有不同，偏重于游戏文章。一班素擅国学的宿儒大写其仿古文章，用以讥讽时局，同时也有短小精悍的作品，轻松流利，受到读者的欢迎。其时写文投稿的散居各地，读者和作者之间，有景仰之心，而无识荆之愿，遂由编者倡议刊登作者照片，间日披露，蔚为一时风尚。

严独鹤所编《快活林》的内容，和《自由谈》极相似。至改名《新园林》后，体裁转变，注重小品文字。他自己每天必写“谈话”一篇，大都是讽刺性作品。行文深入浅出，历数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颇为读者所爱好。另有一事足资记述的，系独鹤主编《快活林》之初，暗中不知不觉得罪了当年所谓洋场才子张丹斧和贡少芹两人。张贡谊属同乡，经常为小型报写稿，诗

赋文章都有一手。张丹斧自恃与《新闻报》经理汪汉溪相熟，认为该报增辟文艺副刊的主编职务非己莫属，时露自荐之意。其时独鹤尚在中华书局任编辑，和报界极少渊源，汪汉溪本来很知道丹斧的才华，可是他的作品趣味偏于低级，不适宜大报风格，所以编辑一席改聘了独鹤。张以这个优越的位置一旦落空，便迁怒于独鹤，不断在他经常写稿的《晶报》上放冷箭。贡少芹则因有一篇长篇小说，投稿《快活林》未用，也怀恨独鹤，由此和张丹斧合作进攻。独鹤初未注意，继见一而再、再而三地有许多莫明所以的文章对他攻击，竟摸不着头脑。后经知道内幕的同好告诉他原委，方始大悟，连呼冤哉枉也不置。

## 二、报刊上的插画

上海报刊上的初期插画，追溯渊源，以一九〇〇年之间的《南方日报》为最早，继其后者，有《时报》、《申报》、《新闻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大共和》、《神州日报》等，也添插画一门。当时锌版还未发明，全都采用木刻，有时穿插在报纸各版，有的编入随报附送的油光纸石印画报中，《时事新报》则另出石印《图画旬报》，另行发售。

当时从事插画工作的画家，有张聿光、徐咏青、沈泊尘、钱病鹤、丁悚、周柏生、马星驰等。张聿光、钱病鹤的作品，多数在“民”字头的报刊上发表，沈泊尘也间为“民”字头报作画，但同时兼为《大共和》、《神州日报》等报工作，后来又先后担任《申报》及《新申报》的插画。徐咏青、周柏生的作品经常在《时报》上发表。马星驰本在《新闻报》编广告版，作画原非专

工，但他的插画浅显易懂，跟严独鹤在《快活林》附刊上每天一篇的“谈话”文字，同样受到读者欢迎，所以他担任插画以来，从未间断。他在插画上的署名单写一个“星”字，上下加以括弧，旁边再加三角点，也与众不同。马死后，我和杨清馨继其后。《申报》创刊《自由谈》时，我曾担任特约员，后来又任《神州日报》画报主编，兼作正张政治插画，在《新闻报》担任插画，直至抗日战争，上海沦为孤岛后停止。

### 三、《申报》停刊讽刺画十余年的原因

清末民初，上海报纸陆续刊登插画，又称讽刺画，实即今之漫画。当时专绘讽刺画的作者寥寥无几，沈泊尘是其中的杰出人才。沈的作品不但寓意深长，且构图缜密，线条挺秀，画题亦佳，所以各报附刊编者都欢迎用他的作品。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竟因他的一幅讽刺画引起轩然大波，导致《申报》停刊政治性漫画十余年。

沈泊尘的这幅引起风波的插画，登在当年《申报》附刊《自由谈》栏内，画题已忘，画面画着一座屠宰场，一德人手执皮鞭，将一群猪仔赶进屠宰场，猪仔指当时的协约国，于是大触英国之怒。那时它们的气焰不可一世，《申报》复处于它们的租界势力范围之内，因此大兴问罪之师，引起国际交涉。该报当局费了极大的努力，经过多方面斡旋，始告平息。《申报》受此打击，一直到抗战前，未曾登载过有关国际性或含政治意义的任何讽刺画。有时偶然刊登插画，只是一些连续性的滑稽画，或是一些无关痛痒的漫画，用来点缀版面。

## 记《译报》、《每日译报》

王季深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上海的大街小巷，突然出现了一份四开小型日报《译报》。这份报纸所有的新闻报导和文章，全部是从各国报刊书籍中翻译过来的。该报精心的编排，短小精悍的文章，很引人注目，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它展开了我国新闻史上别开生面的一页。

当时上海周围的中国军队已经西撤，日军的魔爪逐渐伸向租界，《大公报》、《立报》、《申报》、《时事新报》、《民报》以及《救亡日报》、《抗战三日刊》、《烽火》等都相继停刊，就在这个新闻“真空”状态下，《译报》的出现，象夜空的明星，从浓黑中射出一股耀目的光芒，向人们报导国内外形势，剖析抗战必胜的前途，对鼓舞士气和稳定人心起了不小的作用。

这份报纸的出现，是有它的特定的时代背景的，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发动“芦沟桥事变”，八月十三日又在上海挑衅，国民党军队支持了两个多月，于这年十一月九日向西撤退，日军随即占领上海租界外围地区，租界沦为孤岛，租界当局宣布中立，而日方逐渐渗透，咄咄逼人，形势异常紧张。

日军当局首先要控制舆论机构，租界当局暗示各报不要刺激日方，以免横生枝节。有的报纸为适应环境，向外国政府注

册，挂上了一面“洋旗”，一时称为“洋旗报”。日军当局当然不会视而不见，向工部局提出抗议，指明要取缔“洋旗报”的抗日言论，否则将采取直接行动。

就在这样险恶的情况下，中共地下党在新闻战线上还是坚持斗争，士气昂扬，只是在战法上采取了迂回曲折的方式。地下党文委考虑到，上海租界已沦为“孤岛”，但日军对掌握上海租界大权的英美势力，还不能为所欲为，我方正好利用这个矛盾，开展一种特殊形式的战斗，新闻战线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前沿阵地，于是《译报》应运而生。

### 第一阶段——《译报》

在地下党文委的正确领导下，由夏衍同志出面，召集赵邦铤、林淡秋、王季深、丁君匋（《大公报》广告部主任）、金澍（大时代出版社负责人）等，筹备出版《译报》，将上海各外国报纸和一些外文书刊上的新闻和特稿，译为中文出版，这样就可以回避日军的检查。夏衍经常对我们说，对敌斗争既要坚持原则，又要有极大的灵活性，要善于利用敌人的空隙，闯出一条路子来。当时在《译报》担任译稿的还有朱文兴、江文新、刘保寰、力群、步溪等。编辑部借用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山东路口）《大公报》馆楼上。虽系译报，但编辑在取舍上，显然有政治倾向性。夏衍主持编务，他本人除英语外，更因为是日本留学生，日语的造诣很深，所以他不仅在政策掌握上，就是在外语运用上也是一个能手。

负责同工部局打交道的是赵邦铤。他是英国留学生，能说



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绅士风度”十足，由他对外折冲，特别是同工部局的洋人办交涉，是极其适当的人选。

第一阶段的《译报》只出版了两个星期。当时译稿的来源为《泰晤士报》、《字林西报》、《大陆报》、《大美晚报》、《俄文日报》、《柴拉早报》、《柴拉夜报》(以上三份报均系俄文版)、《斯罗沃报》、《上海日报》、《远东事件》、《密勒氏评论报》、《中国评论周报》、《天下》月刊和日文报纸。由于译稿来源丰富，编排也很新颖，日销万余份。《译报》虽然巧妙地回避了检查，但鼓吹抗战，坚持抗日，当然被日军视为眼中钉。加以没有挂上“洋旗”，因此发行两星期后，就被日军通过租界当局加以查封。《译报》虽被扼杀在摇篮中，但两星期的试刊，已给此后《每日译报》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 第二阶段——《每日译报》

当时英美还没有向日本宣战，华文报纸挂“洋旗”倒不失为权宜之计。《文汇报》、《导报》、《大英夜报》都先后挂上了“洋旗”。《译报》经过赵邦铤的多方联系，终于找到一家在香港注册的大学图书公司的负责人孙特司·斐士和拿门·鲍纳作为《译报》的发行人，由报社各支给他俩三百元的月薪，对外出面，锣鼓又打起来了。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日《译报》就在华格桌路(今宁海西路)锦江餐厅宴请这两位英商大学图书公司的负责人和编辑同人。赵邦铤以主人的身份即席用英语致词，侃侃而谈，颇为得体。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一日《译报》改名为《每日译报》正式发刊。

发刊词(中英合璧)说：“英国作家 Richard Whiteing 说，一张好的新闻报纸，应该使人对于别人所想的和可做的产生好奇的心理。一般地说这就是《每日译报》主要的宗旨。除了提供当天新闻中的一种正确而且及时的精粹外，我们尽先译述各国报纸中的权威作品，尤其是注意中国和远东的事件。我们对于所提供的题材，毫无特殊的偏见，更无偏激的成见。我们尽量地大公无私地选材。在这里我们发表的作者的结论，不一定是我们所同意的，只因为其中有值得考虑的地方而已。在这方面，我们深信《每日译报》能够是那些关心时事和舆论的读者们真正所需要的读物。”

这篇发刊词可能就出自英商大学图书公司负责人之手。他们所说的“好奇”，显然是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至于所谓没有偏见和成见，以至“大公无私”，那可要作具体分析。实际上报纸总是有政治倾向性的，总是有是非之辨爱憎之分的。然而这些所谓没有偏见等办报观点，却变成了当时《每日译报》的保护色。《每日译报》肯定是一份抗日的报纸，尽管它也刊登象 Woodhead 那种人的文章（当时世界称此人顽固如“木头”），但仍冠以主观的、批判的标题，说他是一位“亲日的著作家”。

夏衍同志在《每日译报》发行不久，就离开上海了。一来日军当局已经注意到他，二来《救亡日报》移到广州出版，郭老（沫若）先行一步，频频来电催夏衍去主持笔政。上海地下党委文委决定由梅雨（梅益）继任《每日译报》总编辑。编辑部也从《大公报》馆搬到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一家广告公司的楼上，为了安全，对外保密。梅雨总是坐镇在屋里，白天编写稿件，接待

来访，夜晚则收听广播，紧张忙碌，不辞辛苦。当时梅雨和林淡秋还要抽出时间编辑报告文学集《上海之一日》，同时参加工作的有戴平万、钱坤（即殷扬，杨帆）。这时《每日译报》的编辑阵容又添了一位哲非，此人精通英、日文，与步溪同为“卷筒机”，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又同样是沉默寡言，恬淡自适的实在人。

《每日译报》仍然是一份四开小型报，各版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第一版要闻，主要刊载各外国通讯社如路透、美联、哈瓦斯、海通等电讯和外报的新闻稿，以及就某一专题所写的综合评述，如一九三八年四月八日，就译载了上海英文《大美晚报》的报导：《暴徒丧心病狂，刘湛恩为国殒命》。

第二版的第一条，一般是译评。如一九三八年四月中旬英文《大美晚报》发表评论《悼刘湛恩博士》，先介绍刘氏的生平，他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经常出席国际会议，享有很高声誉。他出于爱国热情和正义感，拒绝担任日军统治下的傀儡政府——南京维新政府的教育部长伪职，终于被日伪所害。该文义正词严地指出：“这样一桩罪行，必然会激起人们更深的憎恨，从而更坚决地拥护刘氏生前所做的一切。”

此外，第二三版还刊登了评论、报导、书评、漫画、插图等，其内容以揭露日军的侵略罪行和日本的外强中干为多。如一个外国记者写了一篇《我看见闸北是怎样燃烧的》战地报导，又如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以《日本国内的反战暗潮》为题，说明日军劳师远征，军费浩大，人民不胜负担之苦。出征的佃农一离开本乡，他们的田地就被地主强占，家里留下孤儿寡妇，求生不得。还有若干文章指出日本经济困难，而且不能支持长期

的侵略战，将会一发而不可收拾。

与日本失道寡助相反，外报还报导了中国游击队之母到汉口受欢迎的盛况，指出华北军民到处打游击战，以至日军不能控制。此外，《每日译报》还译载了国际四位著名人士杜威、爱因斯坦、罗素和罗曼·罗兰发表的联合声明：“因为看到对于东方文化的狂暴的摧残，为了人道，为了和平和民主，我们提议：所有国家的人民，都起来自动地抵制日货，不卖和禁运军火原料给日本，并与日本停止一切有利于日本侵略政策的合作。同时，并尽可能援助中国从事救济与自卫，直到日本从中国撤退所有的军队和放弃其侵略政策为止。”这篇有力的声明，在全世界引起了进步人类的共鸣。《每日译报》还译载了《我们应该抵制日本吗？》、《日本向全世界挑战》、《日本为什么不宣战？》、《疯狂的国家》等文章。Sabajou的讽刺漫画也很尖锐，有一幅题为《恢复繁荣》的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口口声声说要在中国建立“王道乐土”，实际上是制造了残垣断壁，一片荒凉。

第四版副刊编得非常生动活泼。《上海的风暴》是长篇连载，作者A.玛尔洛是法国著名作家，他于一九二五年到广州，目击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在上海的“四·一二”清党大屠杀。他说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在苦难和死亡的威胁下，并没有消沉，而是更激奋地继续战斗。这篇作品堪与苏联的作品《怒吼吧，中国！》媲美。《普希金纪念特辑》中有《马克思与恩格斯论普希金》、《伊里奇所爱的诗人》以及普希金本人的亲笔画。最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作者Liliput O. Uash的《日本人的礼貌》，可说是刺骨的讥讽。此外，还登载了E.斯诺的《小红

鬼》，和其他作家写的《斯大林的生活素描》、《在佛朗哥的地狱七个月》、《莫斯科的夜生活》、《诗人尼克拉索夫》和《土肥原——远东的罗连士》等。

### 第三阶段——与一般日报基本相同的《每日译报》

到了第三阶段，《每日译报》编辑部搬到爱多亚路一六〇号《大陆报》(China Press)楼上，内容不仅是译稿，它几乎跟一般日报没有什么分别，形式上也从四开改为对开。主笔由钱钠水(原名铁如)担任，钱离职后，由恽逸群、孙冶方等轮流执笔撰写评论。经理初为韦慇(捧丹)，副经理孙道胜，后由任矜莘继任。王纪华、程豪等也一度参加经理部工作。《自由谈》由阿英(钱杏邨)担任，长篇连载谷斯范的《新水浒传》，是歌颂中国农民的游击活动的，类似苏联文学中的《铁流》。其他副刊有《语文》，陈望道(雪邨)编，经常执笔的有萨空了(了了)、陈鹤琴、方光焘。《文艺通讯》由锡金、田青负责，《儿童》由钟望阳负责。

就这样勉力苦撑到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九日，在日军当局越来越紧的压迫下，英国大使馆终于屈服，以拒发登记许可证为辞，囑令《每日译报》停刊两星期。《每日译报》据理力争，照常出版，在五月九日国耻纪念日还发表了慷慨激昂的社论。工部局就借口“积极宣传抗日，言论激烈”，下令停刊一月，并与该报英籍发行人串通，使报纸无法复刊，最终与《导报》、《文汇报》、《大英夜报》一起被迫停刊。

编辑《译报周刊》、《公论丛刊》和对“复社”的大力支持。出

于对敌斗争的需要，《每日译报》还编辑了《译报周刊》。该刊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十日创刊，由梅益、王任叔、林淡秋负责。在中共地下党文委的正确领导下，创刊号上就旗帜鲜明地号召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刊物以青年为主要读者对象，创刊号还辟有《给上海青年的一封信》专栏，执笔者有陈鹤琴、韦捧丹、何清儒、张宗麟、孙瑞璜、沈体兰、许广乐、吴大琨和贝叶，都是著名的教育家和文学家。

《译报周刊》主要栏目有《每周瞭望》，类似《世界知识》的《瞭望台》，由梅益、艾纳等人执笔；还有巴人（王任叔）的《生活、思索、学习》，平生的《知识讲座》，卢豫冬（旅岗）的《战争新闻读法》，金仲华、王纪元、郑森禹远从香港寄来的国际时事评论稿，胡仲持（宜用）翻译外论摘要。吴大琨写了书评《莫斯科记》，该书是一个被希特勒纳粹党驱逐出境的犹太作家 Lion Feuchtwanger 的控诉。胡曲园写了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以寄哀思和缅怀。还有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文章，如《在骷髅堆上狂舞的日本》和《跛行的军需景气》。周刊还附设《读者俱乐部》，辟有《问讯处》、《会客室》、《大礼堂》、《书报室》、《洗澡间》、《文艺沙龙》，文字通俗易懂，有很强的针对性。

此外，周刊很注意斗争的策略，机动性强。在当时日伪益趋嚣张的情势下，翻译美国进步作家如史沫特莱和英国作家欧脱莱（《日本的泥足》的作者）等人的新闻报导，分别出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特辑。在访问陈毅将军时，还记下了他的一首洋溢着豪情壮志的诗篇：“故国旌旗到江南，终夜惊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到一九三九年六月二日，《译报周刊》终于在编发了《抗战两周年纪念号》与《世界大战与中国抗战》特辑后，被迫停刊。

《每日译报》还编行了《公论丛刊》十种，如《思想家鲁迅》、《首领论》、《西北特区特写》、《国际妇女动态》、《女战士丁玲》、《华北官僚群像》、《中国的西北角》（范长江采访稿）、《华北前线》（英国记者勃特兰作，林淡秋译）。

《每日译报》还大力支持“复社”。该社由胡愈之、郑振铎和张宗麟主持，出版过《列宁选集》、《鲁迅全集》、斯诺的《西行漫记》等。该社在人力和物力上都有限，能做出这许多工作，而且做得很出色，一方面是由于同人们本身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坚强的革命信念，另一方面也是与各方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

# 回忆《女声》杂志

王伊蔚

三十年代至解放前夕，我一直从事新闻工作，担任过《晨报》妇女栏外勤记者，创办过《女声》，主编过《广东妇女》和《大美周报》妇女栏，历时十五载。其中创办《女声》经过种种艰难曲折，至今犹历历可数。

## 一、《女声》的缘起

一九三二年，我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同学郭箴一在《晨报》编辑妇女栏，邀我担任该栏的外勤记者，采访妇女界知名人士的社会活动。刘王立明是我采访的第一个对象。她是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的夫人，当时主持上海中华妇女节制会工作。这个会是基督教办的民间妇女团体，主要宣传废除不良嗜好，实行禁烟、禁赌、禁嫖，主张节制生育，鼓励妇女发挥自身力量为社会服务。该会办有一份《节制月刊》，经费由教会供给。我撰写的《刘王立明访问记》见报后，刘王立明主动约我会谈。在会谈中，她建议和我合作，创办一个妇女刊物，来宣传自己的主张，公开讨论妇女问题，鼓动广大妇女姐妹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向光明前途迈进。我当即欣然同意，这就是办《女声》的缘起。



## 二、《女声》的诞生

我和刘王立明协商决定，刊物名称为《女声》，意即“妇女大众的呼声”。每半月出版一期，经费一半由刘王立明从《节制月刊》转来，另一半由我兜揽广告和推销刊物来解决。刘王立明任《女声》社长，总管全社业务；我任总编，负责组稿和编印等工作。

当时我精力充沛，除自己积极撰稿外，还到处奔波，向同学和知名爱国人士组稿，并由刘王立明介绍我与何香凝、柳亚子、刘良模、章乃器等联系，得到他们的热情支持，经常为《女声》撰稿。

《女声》是在抗日救亡的爱国浪潮中诞生的，一九三二年十月一日问世。这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件。驻上海的十九路军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奋起抗击。举国上下，群情激愤。在抗战怒潮中，《女声》的不少作者走向街头，走向学校，走向工厂和农村，喊出了千百万妇女的心声。《女声》，在创刊号上态度鲜明地向读者强调：“《女声》的历史使命是鼓动劳动妇女和所有爱国人士投身于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去。”

## 三、《女声》的内容与特点

《女声》是十六开三十二页装的刊物。其内容有短评、论著、问题探讨、劳工妇女情况报道、国内外著名妇女的生活和事业情况介绍，以及文艺、信箱，等等。

当时《女声》社里，除我之外，只雇用一名职员，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刘王立明除在经济上调度开支外，具体事务很少关心，编辑业务由我负责。撰稿人有庐隐、伊凡、黄养愚、杨美贞、金石音、何尊梅、陈碧云、李淑贤、苏梅、樊英、凤兮、郭箴一、李文灿、陈维姜、欧查、彭雪珍、茅宗兰、黄乐华、王淑英等。

为了充实有关妇女运动的理论文章，我曾向沈志远、章乃器、庐隐等征集稿件。沈志远写来了《论两性社交问题》，章乃器写来了《妇女和妇女运动》和《妇女的出路》，庐隐写来了《今后妇女的出路》等。这些文章刊登在论著栏里，使读者提高了对妇女运动的认识。

为了帮助读者经常了解国内政治形势，我除了自己撰写文章外，也向其他作者组织这方面的稿件，如樊英的《废除内战的理论及其实践》，沈志远的《论人与制度》，一飞的《国际形势与中国》等。

《女声》十分注意劳动妇女的生活现状，曾先后征集和发表了《上海纱厂女工的生活状况》、《杨树浦女工的衣食住》、《无锡工厂的女工》、《梧州的劳动妇女》和《台湾女工的生活》等。这些材料，如实地反映了劳动妇女受苦受难的悲惨遭遇。

《女声》还广泛收集和报道天南地北各阶层妇女的活动情况。如《上海职业妇女的生活概况》、《上海女学生与内地女学生》、《长沙妇女的生活》、《北平的女学生》、《广州妇女的职业问题》、《蜀国姑娘》、《江北妇女生活概况》、《合肥乡间妇女》和《马尾的妇女》，等等。也介绍了解放区妇女翻身的情况，如

《中国妇女在解放区》。

对于国外妇女生活和妇女运动，《女声》也经常向读者介绍。许多作者主动送来有关苏联妇女生活的稿件，曾先后刊登了《苏联妇女的政治生活》、《苏联女工的劳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苏联妇女和儿童》、《苏联的家庭》、《苏联的儿童生活》、《苏联的女学生》和《苏联女学生的社交》等文章，有力地驳斥了国内反动派对社会主义苏联的造谣污蔑。与此同时，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妇女生活，也作了适当的报道，如《巴黎女工》、《美国南方的劳动妇女》、《美国女学生的社交》、《法国女子中学的教育》、《日本妇女服务于报界的情况》和《暹罗的妇女》，等等。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许多妇女姐妹沦为娼妓，处境悲惨。《女声》对这些不幸的姐妹寄予深切的同情，为此发表了《北平妓女现象》、《衢州的茶娘》、《关于歌女的一封信》等文章，呼吁各界人士向她们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她们跳出火坑。

对于国内外著名的妇女活动家和她们的事业，《女声》向广大读者热情介绍了宋庆龄、何香凝、邓颖超、丁玲、吴贻芳、史良、袁雪芬等知名女性的社会活动。介绍她们站在时代前列，不怕打击，不怕牺牲，为民族解放、社会进步和妇女的自由解放努力奋斗而作出贡献的光辉事迹，为广大妇女姐妹们树立榜样。

《女声》每期登有小说连载、诗歌和漫画等。小说家伊凡的作品《阿珍》，何香凝、柳亚子、白薇等的诗词，艺术家钱君

画、漫画家叶浅予、木刻家马达等的作品，深受读者欢迎。

《女声》的《读者信箱》，聘请欧阳婉等主持，解答妇女在求学、求业、恋爱、婚姻、家务等方面的具体问题，为她们排忧解难，成为广大妇女的知心朋友。

《女声》每期之首都有时事短评，这是当时妇女刊物所没有的。这些评论短小精悍，发表及时，观点鲜明，可以促进读者关心时事，积极投入当时轰轰烈烈的民族救亡运动。由于《女声》高举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的旗帜，形式新颖，内容丰富，敢于为广大劳动妇女讲话，深为读者所喜爱。每期销售三千多份，远及日本和南洋诸岛。

令人高兴的是，在《女声》问世一年后，妇女界陆续自办了不少妇女刊物。在此以前，只有男子主办的妇女刊物，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金仲华主编的《妇女月刊》。此后，《妇女生活》、《现代妇女》、《上海妇女》等先后问世。

#### 四、坎坷的道路

在创办《女声》过程中，我也遇到不少困难。我除了编辑业务外，还要经常外出联系广告业务，和印刷所打交道，对付国民党的稿件检查，以至亲自到报摊去推销《女声》。有时为了接待来访的读者，常常忙得顾不上吃饭。有次，国民党书报检查官有意刁难《女声》，影响了稿件的排印时间，为了保证刊物能及时出版，我亲自赶到印刷所校对稿件，直至深夜。

编辑生涯有不少辛酸。有的女作家家务缠身，稿件一拖再拖，必须及时催索。有篇连载的稿件，作者住在苏州，为了取

稿付印，我大清早坐火车赶到苏州，下午又急匆匆赶回来编排。有的作者在未交稿前预支了稿费，但很久没能交稿，我得登门催促，经常弄得急急忙忙，甚至造成不愉快的场面。还有些友人介绍来的稿件，因内容不适合，未予登载，不免得罪人。

在《女声》正兴盛时，我与刘王立明之间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终于导致分道扬镳。事情是这样的：刘王立明原是基督教徒，美国妇女节制会委托她在中国办理中华妇女节制会，因此她始终认为《女声》是节制会的宣传工具。为了节制会的宣传目的，她强迫我在每期上都要刊登节制会的活动消息，我没能按期照办。其次，她的思想总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与《女声》的宗旨不完全符合，所以她所提供的稿子，我并不一一刊登。更大的分歧是，我经常号召广大妇女冲出家庭，走向社会，投身于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她却热衷于鼓吹贤妻良母主义，主张每个妇女首先应该努力做个好妻子，好母亲。这与当时社会上“妇女最伟大之点是生男育女”的谬论遥相呼应。这种庸俗的贤妻良母主义是妇女解放的阻力，我表示坚决反对。

起初，刘王立明还尊重我这个总编的意见，作了克制性的让步。但是到了《女声》大踏步前进的时候，她胆怯动摇了。而且《女声》的经费开支日益庞大，也使她感到难以负担。

经过多次商讨，终于同意《女声》社与节制会分手。《女声》独立了。

## 五、《女声》的独立

《女声》要独立，首先遇到的问题经费来源。我明知自己

财力不足，但出于对这个妇女刊物的热爱，只得迎着困难上。一九三四年下半年，我临时召集黄养愚、凌集熙、金光楣、王承馨等人成立了《女声》社改组委员会，积极筹备经费。

我们通过原《女声》的基本作者和友好人士，邀请著名演员郑君里、胡蝶等人义演，举行游艺会卖票募捐。游艺会的规模很大，卖座率很高，很快集中了一笔相当可观的款子。同时我只身到南京和青岛去，得到父亲的好友陈绍宽（曾任国民党政府海军部长）和沈鸿烈（曾任国民党政府青岛市长）的慷慨资助。我的妹妹王露茜也不断从她的私蓄中接济我，加上商业银行的长期广告费，这样，办刊物的经费困难才得以解决。

独立后的《女声》社地址仍设在圆明园路，仍雇用一名职员。这时我和刘王立明虽已分道扬镳，但我仍然敬重她，请她担任名誉社长，我任总经理和编辑部主任，黄养愚任副经理，凌集熙任总务部主任。另外设立编辑委员会，史伊凡、何萼梅、李文灿、金石音、郭箴一、黄养愚、陈凤兮、凌集熙等为委员。

《女声》改组后，于一九三四年九月十日出版了一期改组特大号，向广大读者宣布改组的情况，过去的缺点和今后努力的方向。

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女声》第三卷第一期开始，我们强调，妇女问题是整个社会问题的一环，整个社会问题解决前，妇女问题决不会有彻底解决的办法。当前妇女运动必须与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改造运动结合起来。为此，我们向作者征集，并发表了这方面的言论，如乙飞的《战争与革命》，一辉的《国

际形势与中国》，之津的《妇女解放运动为什么失败》，叔雯的《暴风雨时代的展望与自我的鞭策》，静的《西班牙革命与妇女的解放》，鲁文的《日本对华新政策及其意义》和绶玄的《妇女运动之现阶段的任务》，等等。

我始终不会忘记，当时在上海的知名爱国人士对《女声》的热情支持。如沈志远、薛暮桥、李平心、孙怀仁、刘良模、章乃器、彭子冈、杜君慧、庐隐和苏雪林等，经常为《女声》撰稿。他们学识渊博，视野广阔，立论谨严，文字生动，为《女声》增色不少。

独立后的《女声》面目一新，为各方面进步人士所赞赏，为广大读者所喜爱，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但是由于《女声》热情介绍苏联妇女的生活和妇女运动的状况，积极宣传民族救亡运动和妇女解放的革命理论，并勇于揭露和批判黑暗社会对广大妇女的迫害和摧残，经常正面指责国民党统治当局，这就逐渐引起他们的注意，不断遭到刁难、打击。

## 六、《女声》大开天窗和被迫停刊

一九三五年国民党政府书报检查员对稿件的检查更加严格了，经常长时间扣压稿件，以致我们不能及时排印，直接影响到发行。有时还将我们已经编排好的稿件肆意删削，把原先连贯的逻辑性很强的文章，改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形成大段空白，使《女声》版面不断“开天窗”。但对《女声》深有感情的读者都十分聪明，他们看到“天窗”，仍会从字里行间领会到其中的奥妙。

一九三五年下半年，国民党政府对新闻界的舆论压迫越来越凶，加之《女声》经济十分困难，来稿急剧减少。面临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迫，我们为之战斗了三年多的《女声》半月刊，终于不得不忍痛宣布停刊。

### 七、伪《女声》的出现和《女声》的复刊

四十年代的上半期，上海租界沦入日军魔掌之后，新闻界突然出现了由日本人兜揽的《女声》半月刊，宣传大东亚共荣圈，鼓吹投降路线。那时我从事粉笔生涯，终日忙着改课卷，连看书报的时间都没有，对这个伪《女声》的出现，还是从一位内地朋友来信中得知的。我特地到书报摊上察看，这种伪《女声》的开本大小和编排形式，不仅与我们办的《女声》相同，甚至连封面设计的“女声”两字都与我们的—样。伪《女声》的主编是日本人，编辑人员中不少是中国的文化汉奸，其中有“吴露”这名字，我看了非常气愤。一九四五年八月，伪《女声》随着日本的投降而消声匿迹。它先后发行四年左右，放了不少的毒。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我得到妹妹五百元的资助，邀集了留沪的几位老撰稿人，如黄养愚、凌集熙、曹静渊、袁宝月等，分头接洽印刷所和书店，着手进行复刊工作。在一些朋友和学生的协助下，终于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一日出版了复刊后的《女声》，并改为月刊。

复刊后的《女声》，最初的几期，发表了碧遥的《站在妇女的地位庆祝胜利》，九如的《八年来上海妇女》等文章，肯定了我国妇女在抗日战争中的积极作用。同时又发表了李平心的



《论中国妇女的自觉运动》，韵霓的《胜利后的上海妇女》，林汉达的《中国女子教育的成功》和碧遥的《世界妇女参政运动与现势》等文章，正确地评价了现阶段我国妇女的革命贡献，并指出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后来，《女声》的许多老作者陆续从内地返沪，编辑人员除黄养愚、凌集熙、曹静渊、袁宝月等人外，又增加了陈韵霓、黄碧遥、耿馨之、欧阳婉等，稿件来源充足，篇幅逐渐扩大，栏目也增加不少，如《一月时事》、《科学常识》、《小茶座》、《妇讯集锦》等等，都是过去没有的。

在这期间，《女声》编辑部还召开了几次专题座谈会，如《女子参政问题座谈会》、《女子教育问题座谈会》、《知识妇女出路问题座谈会》、《抗战夫人问题座谈会》等。与会者抨击了国民党当局对妇女求职或参政等方面的歧视和阻挠，呼吁各界妇女自强不息。

《女声》复刊后不久，由于经费困难，曾与出版商康丹合作，我们负责编辑，他们专管发行。后来康丹渐渐想干预《女声》的编辑方针，我们就和他分手了。

《女声》与康丹脱离后，发行工作陷入困境。刚巧刘王立明由重庆回到上海，经过八年抗战的洗礼，她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贤妻良母主义中解脱出来，扎扎实实地投身到妇女运动的斗争实践中来。

刘王立明对《女声》复刊十分赞成。她说：“目前中国的局势较《女声》创办时期更加黑暗，劳动妇女的生活更加惨苦。我们现在更应该加强自己的团结，努力办好《女声》，使《女声》为维

护妇女利益，推动社会进步出力。”她主张我们要以“火的热情，铁的纪律，顽强的战斗精神，继续前进”。从此，我和刘王立明重新合作，又使《女声》声誉日隆。

我和刘王立明重新合作后，在行政上仍按初创办时的分工，由刘王立明任社长，我任总编辑，其余杂务均由节制会职员兼任。编辑方针也有所改进。为了培养广大妇女的写作兴趣，提高写作能力，编辑部决定全部刊用妇女作者的作品。无论是教育界的，文艺界的，医药界的，法律界的，影评界的，书画界的，都广为征集。

这时《女声》的经常撰稿人除了黄碧遥、耿馨之等外，还有教育界的宋梦芹，专门撰写女子教育问题。另外又特约了一些小报记者，如苏青、潘柳黛、张宛青等，分头为本刊向各阶层妇女进行采访，对越剧名演员袁雪芬、名律师史良和医务界的苏祖裴等都作了报道。另外还有《杨美贞女士访问记》和《蔡葵女士一席话》等，为《女声》增添了新的光彩。

我们要求作品内容生动活泼，形式短小精悍。新增加的短评项目，除政治短评外，还对当时发生的各种社会新闻加以评述，使《女声》的读者更为广泛，形成妇女联合的崭新局面。

#### 八、《女声》最后停刊

国民党政府在行将灭亡时，更加疯狂迫害进步人士，严厉禁锢革命言论，日益加强白色恐怖。刘王立明是“民盟”成员，时常抛头露面，在反动派追捕胁迫下，不得不作逃亡之计。她把职务交杨美贞代理，离沪去香港。与此同时，耿馨之撰写的

《史良访问记》已排好版，正待付印，史良本人为躲避迫害而迅速转移时，连夜通知我们，我们只好将稿件和制版一并销毁。

刘王立明临行时，嘱咐我们要尽力把《女声》办下去。但局势越来越紧张，《女声》处境十分艰难。

我们把耿馨之请来担任经理，筹措经费。在她的指导下，我们举办义卖活动和联谊舞会来募捐。虽然当时支持者甚多，不少人捐献国画和古玩，还有作家赠送新出版的小说，可是由于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通货恶性膨胀，人民购买力薄弱，义卖终于失败。处在这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迫下，有些人想打《女声》的主意，把她收买下来，遭到我们坚决拒绝。

面对种种压力，我感到心力交瘁，不得不忍痛将《女声》停刊。在停刊号上，登了一篇《黎明的前夕》的告别词，大意是说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已将到来，鼓励广大妇女同胞看到革命前景，继续奋斗。

《女声》从一九三二年创办到一九四七年最后停刊，历时十五年之久。最使我遗憾的是，和刘王立明再度合作后到最后停刊的《女声》已全部散失，停刊于哪一卷哪一期，至今还无法查明。

今天，《女声》已成为历史陈迹，但作为妇女运动的一滴史料，还是值得把它写出来。

# 旧上海无线广播电台漫话

冯 皓 吴 敏

## 一、概 述

上海是我国第一座无线广播电台的诞生地，也是我国无线电广播事业的发源地。早期在上海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对我国无线电广播事业的开拓，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从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四日上海出现第一座“新新无线电话台”起，到三十年代初，全国民营电台半数以上集中在上海。尤其是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租界成为“孤岛”时期，以及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上海的广播电台有过畸形的繁荣。解放前，全国私营广播电台累计达一百三十二座，上海有九十三家，占百分之七十以上。直到解放前夕，上海还有广播电台三四十家。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肃清了苏州河南北的残敌，军管会广播系统接管专员周新武等同志接管了国民党上海广播电台，并于当天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呼号，发射电波，宣布上海全部解放的捷报，从此在上海建立了人民自己的广播阵地。

上海市军管会接收了国民党官办的电台，建立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并先后颁布了《无线电台登记及管制暂行条例》和《关于上海市私营广播电台暂行管制条例》。经过登记审核，从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日起恢复播音的私营电台有大众、大沪、金都、中华自由、亚美、麟记、大陆、大中华、东方、华美、沪声、合众、九九、民声、建成、元昌、福音、亚洲、新声、大中国、大同、鹤鸣等二十二家，其中有些是两处合用一台或同一波段的，合计共有十四个频道。按照党的方针政策，经过清理、整顿，至一九五二年十月，上海市首先完成了对私营广播电台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统一的公私合营上海联合广播电台。

## 二、中国第一座无线广播电台

一九二二年冬，一个名叫奥斯邦的美国新闻记者得到我旅日华侨张君的帮助，以华人的资本，借外国人的名义，在上海开设了一家无线电公司，组装了一座五十瓦特的广播发射机。为了招徕生意，在广东路大来洋行内开办了上海第一座“无线电话台”，因为当时还没有无线电广播的名称，大家都叫它是“空中传音”。这就是全中国的第一座无线广播电台。

这座电台主要播送新闻和音乐节目。它有三个特点：一是竭力和上海《大陆报》取得联系，以上海中国无线电公司名义与《大陆报》签订合约，推进业务。这样，通过报纸的宣传使电台逐渐为上海市民所熟悉，扩大了宣传效果，而报社提供的消息又为电台充实了内容。由此可见，上海第一座广播电台从开办之日起，就与新闻事业发生了关系，在政治上它既是帝国主义垄断下的新闻宣传工具，又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色彩。二是这座电台每天只播音一小时，选在晚上八点一刻

到九点一刻，因为这时候听众多，影响大。三是奥斯邦通过电台来推销洋商名义开设的无线电公司的商品，而推销商品所赚的钱，又可维持广播电台经费的开支，可谓一举两得。

当时北洋政府公布的《电讯条例》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境内设立无线电台是不允许的，但有关当局对奥斯邦的无线电台却未加禁止。后来这座电台为了维持经营，申请进口耳机等收音机器材，而这些器材被认为是军用品，未获政府允准，而且奥斯邦不是无线电技术行家，以致业务不振，勉强维持三个月后就以倒闭告终。

这座电台在开办后的第四天，全文广播了孙中山先生一月二十六日的《和平统一宣言》。孙中山听了广播，并在第二天对《大陆报》记者发表谈话：“余之宣言亦被之传，余尤欣慰。余切望中国人人能读或听余之宣言，今得广为宣布，被置有无线电话接收器之数百人所听闻，且远达天津及香港，诚为可惊可喜之事。吾人以统一中国为职志者，极欢迎无线电话之大进步。此物不但可于言语上使中国与全世界密切联络，并能联络各省各镇，使益加团结也。”（见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民国日报》）孙中山先生赞赏无线电广播和平统一宣言，为统一团结服务，是耐人寻味的。

奥斯邦失败以后，那时的美商新孚洋行也组装成一座五十瓦特的发电机从事广播，同时经营装配和发售收音机，由美国无线电用品公司向北洋政府请求取消了输入耳机的禁令。这家电台也只经营六个月就停止了播音，但是美国无线电用品公司却大获其利。

### 三、开洛公司广播电台

外国人早期接二连三地在上海办广播电台，奥斯邦之后有新孚洋行，接着美商开洛公司和日本《每日新闻》社又在上海设立广播电台。

美商开洛电话材料公司的经理名叫迪莱，他发觉办广播电台是门好生意，因为那时收音机的机件可以自由进口，又可设厂制造，于是继奥斯邦和新孚洋行之后，开洛公司建造了一座一百瓦特的广播发射机，于一九二四年五月在福开森路（今武康路）办起了波长三百五十六公尺、呼号 KRC 的开洛广播电台。

开洛公司广播电台的规模很大，在经营上比奥斯邦的“空中传音”有所改善。为了扩大影响，发展业务，迪莱曾动足脑筋，先在《申报》和《大美晚报》馆设立播音室，后又在《大陆报》馆、工部局、派利饭店和美国社交会堂分设播音室，利用市内专用电话线使各个播音室和福开森路的发射机直接联系。每日预告节目内容，讲授无线电广播常识，并兼营广告。还组织了一个“中国播音会”，聘请中国人曹仲渊、徐大雅担任广播电台的正副主任，并在中午、晚间听众比较集中的时刻安排特别节目，以招徕听众。开洛电台初办时，播放的节目多为西乐和外国唱片，后来为了争取更多的中国听众，加播中国唱片，还曾敦请正在上海的程砚秋等京剧名演员播音。

旧中国早期的无线电商品都是舶来品，市场为外商所垄断，一般无线电收音机及其备件都是英、法、荷兰货，美国货尤居

首位。日本为了争夺市场，也输入了不少东洋货。其进口总值根据海关册籍，一九三三年为一千九百四十万余两，一九三四年为二千三百三十万两，一九三五年为二千二百五十万余两。随着无线电业务日益发展，他们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通过六百多家中国厂商竞做无线电讯器材、蓄电池等商品，向世界各大商埠输出倾销。开洛公司在我国市场大量推销“亚尔西爱”（RCA）收音机，营业相当发达。开洛电台开办期长达五年之久（一九二九年十月停业），与商品输出相结合，刮去了中国人民无数的金钱。

一九二六年一月，日文报纸《上海每日新闻》社添设了无线电发送部，播放新闻和音乐，呼号KSNS，但不久就停止。

外国人在上海办广播电台，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的产物，也是他们加强侵略的工具。

#### 四、国人自建的电台

上海第一座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新新百货公司“无线电话台”是邝赞先生建造的。它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九日正式播音，比天津无线电广播电台略早四十三天，是我国第一座国人自设的广播电台。呼号XGX，后改XLHA，波长三百七十公尺，输出电力为五十瓦特，有一部分用电瓶交流电作电源。台址原设在新新公司（今南京路第一食品公司）楼上，可以随时转播新新公司屋顶花园的游艺节目，如京剧、苏滩、申曲、滑稽、文明戏、三弦拉线、群芳会唱（由女校书清唱片段京剧），还有口技、宁波滩簧等。据早年曾在新新百货公司当过练习生的李国



柄说，他被派在公司的电器部，曾担任无线电话台的报告员，开始时主要播放唱片和转播游乐场所南方戏曲，以及商情和国乐等节目。在广告方面，主要介绍新新公司经营的各类商品和无线电业务。

新新电话台的播音室设在新新公司新都饭店餐室中间，为了避免挡住视线，在播音室的四周装上玻璃，所以人们又称为“新新玻璃电台”。一九四一年十月一天凌晨，突然遭到火灾。当时《申报》报道，因饭店失火，波及六楼全部，播音室首当其冲，安装之最新设备当即爆裂，据说损失达十万元，幸而机房因设在屋顶，才未殃及。

再说上海最早的一座以经营广告业务为主的天灵电台，它出现在一九三〇年的春天，由张剑秋先生独资创办，设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该台无线电工程师张大炜早在新新电话台建立以前即热衷于无线电科技实验活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出于爱国和维护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天灵电台广播了有关日军侵略我国东三省的新闻，报道了事实真相，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行为，激发了上海市民的义愤，因而引起了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不满，与法租界当局勾结，通过法租界巡捕房，将天灵电台强行封闭。

## 五、亚美公司和亚美电台

早在中国共产党无线电通讯事业创建时期，接受任务到上海学习无线电的同志和上海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一样，时常去经营无线电器材的亚美无线电公司购买零件、发动机和其他应

用材料，以及有关无线电的书刊。从二十年代起，从事无线电技术研究的苏祖国先生，就担任亚美无线电公司编辑部主任兼《中国无线电》杂志的总编辑（解放后苏老是私营亚美广播电台总经理兼工程师，公私合营上海联合广播电台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后，当选为监察人，现是上海电器公司顾问，政协委员，民建工商联机电一局支部负责人）。

一九二二年春，苏祖国和他的大哥苏祖圭在上海南市开设一家小型无线电器材厂，一九二四年秋迁到法租界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八百四十六号，创办了“亚美无线电公司”（英文名Amateurs home，译为业余之家）。苏氏兄弟从小都是无线电业余爱好者，通过万国函授学校自学无线电知识长达四年之久，逐步掌握了无线电技术。

一九二九年亚美公司自建一座五十瓦特的广播机，设立“上海广播电台”，后改为“亚美广播电台”，每天间歇播音四小时，这是上海国人自建的第二座广播电台，也是私营电台中历史最悠久的一座广播电台。该台创立初期仅苏氏兄弟两人。第一个播音员是徐大钧，他原是“开洛”电台的播音员。抗战胜利后，亚美电台人数增加到十多人，至今尚在上海人民电台工作的有文艺编辑、播音员张芝等同志。

亚美电台宣称以提倡无线电学术为宗旨，每天第一次播音从上午九点三刻至下午一点，第二次播音从下午五点至二十点一刻。亚美电台经常编印各电台联合播音时间表，并设立无线电知识问答节目。听众的提问在无线电节目中答复，以后汇印成《无线电问答汇刊》。广播的节目有新闻、国语、文艺、京剧、

歌曲及评弹等，还曾办过体育介绍节目。

当时社会上对亚美电台的评价较高。《申报》的《播音二周刊》一九三七年三月七日报道：“亚美电台在播音方法和办台成效上在当时上海国人自办的广播电台之中是有成就的，办台的历史也最悠久。”

## 六、三十年代至抗日战争胜利上海无线电广播电台

上海无线电广播电台发展到三十年代，人们对这个现代化的宣传工具已经熟悉。“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上海的许多私营电台激于广大市民的爱国热情，都自动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它们除为前方抗日将士征集物资和慰劳品等举行联合广播外，还同亲日的大东、电通、新声三个广播电台和“八·一三”事变时日本在虹口特设的军用广播电台展开针锋相对的宣传战，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电台“陷于中国电波的包围中”。由于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人们普遍关心时事、战事，无线电广播进入了空前兴旺时期。

据统计，一九三二年上海已有广播电台三十余家。据上海国际电信局调查，一九三四年上海共有私营电台五十四家，其中有六家是外国人经营的。经过限制与取缔，到一九三五年留存私营台四十一家。一九三七年又发展到五十四家，在世界大都市中，上海的广播电台之多居于首位（当时美国纽约市广播电台仅二十四座）。

美商美员登广告公司和英国路透社在一九三一年合组了一个比开洛公司规模更大的无线电广播电台，发射机安装在百老

汇瑞丰大厦，全日播音。该台几乎一直是上海较大的一家电台。后来国民党交通部以高价买下，改为交通部上海广播电台。当时官营电台还有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设立的“公营上海第二台”，说是为了宣传市政建设和普及民众教育而设，该台在一九三六年三月八日开始播音。

上海从事广播业务的人员，一九三七年《申报》发表的数字为四百五十七人，其中文化程度属于大学毕业的五十八人，中学毕业的一百二十人，小学毕业的九十九人，未受教育和识字不多的六十一人。电台的类型，可分为商业、宗教和教育三类，多数属于前者，全靠广告收入维持。至于娱乐节目，只是为了迎合小市民趣味，作为吸引听众的一种手段。除少数节目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内容尚健康外，有些节目十分荒唐，污染人们的思想。

创办于一九三四年的，以宗教宣传为特点的电台，原有“佛音”、“福音”两家。后来还有“光明”一家，因系哈同夫人资助，不久改以罗迦陵的法名命名，称为“妙音”。每天自上午八时到下午六时播音，所播佛学节目有四十二章华严经、楞严经、涅槃经、四明宣卷等。福音电台宣扬基督教义，与国民党上层关系密切，并得到外国教会的资助，功率为一千瓦特，是当时民营电台发射功率最大的一家。广播内容有晨祈祷、沪语和英语布道、圣经等，每天播音长达八小时。至于教育性的电台，主要是民营亚美电台，该台与上海民众教育馆合办教育节目，传播文化教育和科技知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上海租

界，并成立广播无线电监督处，勒令全市的私营电台办理登记。这时中国人经营的二十四家广播电台，多数不愿登记，自动停业，其余为敌伪合组的中国广播协会所收买。外国人经营的广播电台计十二家，其中美国五家，意大利两家，英、法、德和瑞士各一家，被分别勒令停业，或改组为日军控制的宣传机构。同时日军强令登记收音机，拆除七灯以上的收音机和六灯以下的短波收音机。

上海的无线电广播电台在三十年代出现兴旺发达的局面，原因之一是，在“一·二八”事变到“八·一三”淞沪战争期间，电台迅速及时地广播十九路军奋勇抗日的消息和日军侵华真相，发挥了广播电台特有的宣传效能，符合当时人民大众一致抗日的要求和关心国家大事的愿望。原因之二是，上海是国际商埠，又是我国经济中心，工商业的发展通过电台广告作媒介，要比报刊效果更大，而电台广告取费又比报纸低，许多商号趋向用无线电广播做商品广告。原因之三是，听众对广播电台的兴趣比早期有显著的提高，收音机与日俱增，几乎已成为上海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据一九四〇年统计，全上海的收音机达十八万台以上，矿石机更为普及。

抗战胜利后，上海的广播电台在三十年代空前兴旺的基础上，随着市场的畸形繁荣，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最多时约有八九十家之多。有国民党党政军特控制的公营电台，又有许多商业性的私营电台，习惯上有所谓“老民营”和“新民营”之分。“老民营”系指在抗战前即已设立，在抗战期间因上海沦陷不愿向日伪登记而停播，在抗战胜利后复业的。“新民营”系指

抗战胜利后经国民党电信局批准设立的。以一般情况而言，“新民营”广播电台的设立，大都通过国民党当权人物的关系，以后才逐渐参加民营电台商业同业公会。那时上海的广播事业在表面上看来似乎很发达，但实际上很多是投机性、营利性的，量多而质不高，其简陋的程度，使人难以相信，电波混杂，周波混乱，更是令人难以忍受。

当时国民党电信当局对于未核准的电台，分三次进行取缔，留存的除了国民党公营的上海电台、胜利电台、中和电台、上海分台和上海英文电台外，经电信局核准的民营电台有建成、中国文化、新沪、大同、民声、九九、亚洲、合作、合众、福音、元昌、鹤鸣、东方华美、亚美麟记、大中华大陆、中华自由和金都等十八家。

### 七、一座由大学生自己建立的电台

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东吴大学理学院陈古海等同学发起组织“东吴电讯学会”，设想办一座自己的无线电广播电台。由赵铮、缪德培、赵文清等设计安装，试装成功的发射机功率为二百五十瓦特，后来提高到五百瓦特，频率为1140千赫，邻近“苏联呼声”电台。地下党组织十分关心该台，派陈古海（原名钟信耀）的哥哥钟沛璋同志领导电台工作，定名为“中联”，意思是要联合一切进步力量。英文名称“China United Broadcastation”，呼号 XGCA。电台设在新大沽路四一一弄四号小钟家。为了取得合法地位，由中国新闻专科学校校长陈高佣出面登记，得到电信局和淞沪警备司令部核准。

一九四六年三月初，这个广播电台正式开幕。事前在《申报》、《新闻报》上刊登注目的广告，敬请梅兰芳先生揭幕，言慧珠、吴素秋、童芷苓剪彩。开幕当天组织的特别节目有袁雪芬、丁是娥、筱文艳、刘天韵、姚慕双、孙筱楼等人的演唱，上海戏剧、曲艺界的许多名演员都应邀参加了即兴表演。还请了有经验的播音员朱美玲、哈蓓蓓等客串，点播的电话应接不暇，广播界不少同行为了表示友好，避免相互干扰，主动停播一天。

中联广播电台平时安排的曲艺节目，除和一般电台相似外，还特别组织了少年儿童（组织青少年学生参加）、文学（诗歌朗诵、活报剧）、学术（邀请进步作家播讲）和新闻节目（根据进步报刊编播）。中联电台的进步倾向十分明显，但注意方式方法，避免不必要的暴露。当时有的报纸评论中联电台的节目具有高雅不俗，文艺性强，丰富多采等特色。该台的进步倾向受到反动派注意，一九四六年七月国民党政府电信局和淞沪警备司令部借口“整顿广播电台”，查封取缔了这座电台。

## 谈解放前上海的话剧

高黎痕

在上海，话剧有通俗话剧和话剧之分。通俗话剧，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在上海初次与观众相见，时称“新剧”，以示有别于旧戏，如新民新剧社、民鸣新剧社、新剧同志会等。一九二八年曾改称“白话新剧”，一九三八年又称“高尚话剧”（如陈秋凤、刘一新在绿宝剧场，李君磐、张啸天在中央书场）。一九五〇年改称“通俗话剧”，但是一般人都称“文明戏”。

话剧起于一九二二年，当时上海一些爱好戏剧的人组织了上海戏剧协社，以后又有南国社和辛酉剧社，因为有别于新剧，他们统称剧社而没有专定剧种名称。在文字宣传方面则称“爱美剧”，或“素人演剧”，意思是非职业性的。也有称新剧或新话剧，而称原来的新剧为文明戏。如一九三〇年艺术剧社的刊物《艺术》发表郑伯奇写的《戏剧运动的进路》便是如此。到了一九三〇年以后才定名为话剧。田汉在一九五六年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成立时说：“大概在二十年前，我们某一次演出之后，就在大西洋菜馆楼上开会，想为话剧取一个名字……后来还是洪深先生提出，我们是靠语言来表演的，所以就称‘话剧’。”

总之，新剧、白话新剧、高尚话剧、文明戏，就是通俗话剧；爱美剧、素人演剧、标准话剧、新话剧，就是话剧。



通俗话剧与话剧有什么不同呢？主要是：（一）没有完整的剧本，只用一张幕表；（二）幕数多，有多至十数幕者；（三）没有导演制度；（四）在上海附近地区用本地方言演出；（五）布景一半是象征，一半是写实；（六）不注重灯光及音响效果（以上种种春柳社除外）。

同是话剧，为什么有许多不同呢？这与它们诞生的时期不同有关。通俗话剧诞生在清朝末年，在那个时候它完全是新生的戏剧，没有音乐歌唱，全靠语言表演，因此就要让观众看得懂，听得懂。要观众看得懂，就必须把整个故事有头有尾清清楚楚地表演出来，幕数就不能不多。要观众听得懂，就不能不用本地方言，而且演员大多是本地人。那时每天要换一个新戏，又没有编戏的人才，就是有完整的剧本，演员也没有时间来读熟它，因此不得不用幕表。话剧是在五四运动后出现的，这时自编剧本和翻译剧本渐渐多起来，剧社也建立了导演制度，所以比之通俗话剧质量较高，经过一段时间，逐渐为观众所接受，成为一个新兴的剧种。

下面我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并参照有关文献记载，分启蒙时期（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二一年）、话剧运动时期（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九年）、党的领导时期（一九三〇年起）三个时期来叙述解放前上海的话剧的一些情况，供史家研究。

### 一、启蒙时期

话剧在上海的诞生，起初是受了教会学堂在圣诞节演出一些宣传宗教如《浪子回头》之类的戏的影响，以后，教会学堂的

学生自己编演讽刺戏，如一八九九年圣约翰书院的学生曾演出《官场丑史》。慢慢地中国学校如南洋公学、私立中学的学生，也演起来了，社会上也有人开始组织剧团演出。一九〇五年汪优游等组织文友会，演出《捉拿安得海》。一九〇六年朱双云、汪优游、王幻身、翟保年等组织开明演剧会，提出六大改良：（一）政治改良；（二）军事改良；（三）僧道改良；（四）社会改良；（五）家庭改良；（六）教育改良；同时演出了《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可见新剧从一开始就同社会政治密切相关。

上海的话剧究竟始于何年？欧阳予倩认为应该从一九〇七年开始。他说：“上海有话剧应该从哪一年算起，我认为从一九〇七年算起比较适当。一九〇七年以前只有在学校或私人集会的一些非正式业余演出，还不具备话剧的形式，自从一九〇七年王钟声在上海组织春阳社演出了《黑奴吁天录》，这个戏第一次用分幕的方法编戏，用布景，在剧场里作大规模的演出，尽管演出并不十分成功，而且还有很多缺点，还是应当把这次的演出作为话剧在中国的开场。”一九五七年中国戏剧家协会的会员阳翰笙、欧阳予倩、田汉、夏衍建议剧协主席团举办“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就是以一九〇七年作为话剧在中国开始的一年。

上海新剧一开始就形成了三个不同的派别，王钟声、刘艺舟是一派，春柳社是一派，任天知的进化团又是一派。

#### 王钟声与刘艺舟

王钟声，名熙普，浙江人。据说他在德国学习法律，曾在广西桂林法政学校当过教员。一九〇七年到上海，认识上海绅

士马相伯、沈仲礼，得到他们的帮助，组织春阳社，在圆明园路兰心戏院演出《黑奴吁天录》。一九〇八年正月在张园为办音乐学校筹款，演戏一星期。同年，与任天知联合演出《迦茵小传》，并在辛家花园演出《张文祥刺马》。一九一〇年陆镜若暑假由日本回上海，与钟声合组文艺新剧场，演出《爱海波》和《猛回头》等。辛亥革命光复上海时，钟声参加攻打制造局之役；上海督都府成立，为督都府参谋。旋赴天津谋起义，未成，为直督陈夔龙所谋杀。

刘艺舟，原名璧，湖北鄂城县人。早年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任京师大学教授及保定法政学校总教习。后因安徽熊成基事被捕，京师大学师生力保获释，乃再至日本。一九〇八年回北京，适王钟声在京演剧，刘遂加入，更名木铎，同演出于天乐、丹桂、文明等戏园。武昌起义，刘在大连集合一千多山东难民，借往山东屯田之名，出奇兵袭取登州，与本地人连成基会合，克复黄县及威海、文登等县。一九一二年至沪，在南市新舞台与夏月珊、潘月樵等演《隔帘花影》（波兰志士哥修士孤的故事）、《吴禄贞》、《黑奴吁天录》等戏。以后组织励群新剧社，到处演出，声讨袁世凯背叛民国。袁世凯死，黎元洪继为总统，刘曾一度为将军府将军。后因不满军阀专横，政治混乱，在汉口办《公理报》，在北京办《同舟报》，皆被军阀封闭。晚年专事演戏，郁郁不得意，六十一岁病死汉口。

王钟声、刘艺舟演戏的目的是从爱国思想出发，鼓吹革命，所以在戏里时有长篇演说。他们常与京戏合作，也唱几句摇板，因此自成一派，演的戏大都富于革命性。其剧目有《黑奴吁天

录》、《迦茵小传》、《猛回头》、《爱海波》、《秋瑾》、《徐锡麟》、《革命的家庭》、《爱国血》、《石达开》、《岳飞》、《蔡锷》、《血蓑衣》等。

### 春柳社

一九〇七年春，留日学生李息霜(叔同，弘一法师)、曾孝谷、唐肯、孙宗文等在东京组织春柳社，演出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的第三幕，相当成功。接着演出《黑奴吁天录》。同时扩大春柳社，欧阳予倩、吴我尊、谢抗白、李涛痕、李喃喃等，都是这时参加的。陆镜若是在这次演出之后加入的。他专心研究戏剧，除自己广泛阅读剧本及理论书籍外，还到日人藤泽浅二郎办的俳优学校学习，所以对表演及排演艺术较有根底。一九〇八年冬，欧阳予倩、陆镜若、吴我尊、谢抗白等在东京用辛酉社名义演出了法国萨都的作品《热血》。一九一二年陆镜若在上海成立新剧同志会，最初参加的有马绛士、罗漫士、吴惠仁、蒋镜澄、姚镜明、陆露沙等，其后参加的有欧阳予倩、胡恨生、董天涯、董天民、郑鹧鸪、冯叔鸾、管小髭、张冥飞、宋痴荇等。因为有许多新社员参加，所以不用春柳社名义。一九一四年四月在上海谋得利剧场演出时称春柳剧场。一九一五年上半年演出几个月，因营业不振而停演。同年八月，陆镜若在杭得病返沪，九月逝世，春柳社因无人主持而解散。

起初，春柳社所演的戏都有剧本，以后为了适应当时每天换一个戏而不能不用幕表时，他们编演的戏仍然是情节集中，幕数少，主要对话有固定的台词，而且要经过详细的排练，不象其他剧社用流水账似的幕表。现在看起来，当时春柳社演出

的风格和现在的话剧非常相同，幕数少，完全用普通话演出，注重排练、布景、灯光及音响效果。有人说春柳社是现在话剧的先行者，这话是有一定根据的。

春柳社一共有八十多个剧目，社员自己写的剧本有《家庭恩怨记》、《浮云》、《芳草怨》、《陈七奶奶》、《文明人》、《亡国大夫》、《运动力》、《神圣之爱》、《怨偶》、《新剧遗传》、《中山狼》、《田小辫子》等；翻译的剧本有《热血》、《茶花女》、《鸣不平》等；根据外国剧本改编的有《猛回头》、《社会钟》、《不如归》、《新不如旧》、《真假娘舅》、《老婆热》、《异姓兄弟》、《血蓑衣》等；根据外国小说改编的有《迦茵小传》、《兰因絮果》、《夺嫡奇冤》、《黑奴吁天录》、《鸳盟离合记》、《火里情人》、《蛇女士》、《爱欲海》、《爱晚亭》等；根据中国古今小说《聊斋》、《水浒》、《红楼梦》等改编的有《王熙凤大闹宁国府》、《鸳鸯剑》等。春柳社的戏单也与其他剧社不同，除有总说明外，每幕都有情节说明及出场人物表。

#### 进化团

进化团的组织人任天知，有人说是春柳社社员。他虽然到过日本，并且入了日本籍，取名藤堂调梅，但在东京并未加入春柳社。他的演出风格与春柳社完全不同，可能是受了日本志士剧(壮士芝居)的影响，也继承了上海过去新剧的一些作风和经验。

进化团是第一个职业剧团，成立于一九一〇年。该团在革命宣传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对当时的戏剧运动也起了推动的作用。在南京演出后，南京就成立了晨钟社；在芜湖演出后，芜

湖成立了迪智群剧团。它集中了上海附近地区爱好戏剧又有舞台经验的演员；在编剧方面吸取了外国戏剧分幕的形式及中国传统的编戏方法，故事有头有尾。多用明场，少用暗场，并有幕外戏。以前上海搞业余新剧的也大致如此，不过进化团加以发展，而且固定下来，以后其他剧团都这样做，形成了“幕表戏”这一流派。

一九〇八年，天知曾在上海与王钟声合演《迦茵小传》，以后又到日本想约春柳社回国组成职业剧团，因春柳社同人都在求学时期，未曾应允。一九一〇年他在上海组织进化团，登报征求演员，一时爱好新剧的人纷纷参加，如汪优游、陈无我、范天声、秦哈哈、陈大悲、王幻身、张冶儿、陈天晓、陈镜花等，就是那时加入的。成立后到南京升平园上演《血蓑衣》、《东亚风云》、《茶花女》等剧。一九一一年四月到芜湖演出。同年六月又到汉口演出。一九一二年春在上海新新舞台演出。进化团在新新舞台演了一个月，新新舞台老板见进化团不能卖座就撕毁了合同。以后到宁波演了两个月，终以团员纷纷离团，无形解体。

进化团所演剧目有《血蓑衣》、《东亚风云》、《尚武鉴》、《新茶花》、《安重根刺伊藤》、《恨海》、《血泪碑》、《共和万岁》、《黄鹤楼》、《新加官》等。

#### 开明社

继进化团而起的职业剧团——开明社，成立于一九一二年，主持人朱旭东。主要演员有史海嘯、朱小隐、苏寄生（少卿）、周石吟、朱孤雁、孙琴心等。北大教授刘半农，还有李君盘、

任天知都曾和朱旭东合作演出过。是年八月在中华大戏院演出《情痴》，仅演了三天就演不下去了，只好远走四川。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回到上海，第二年正月演于吉祥街歌舞台。同年五月停演，往日本、南洋一带演出了将近三年。一九一七年回国后解散。

开明社保留的剧目有《情痴》、《复活》、《茶花女》等。

#### 郑正秋与新民社

一九一三年秋，郑正秋组织新民社，租南京路谋得利剧场演出新剧，从此新剧在上海才立住脚跟。以后上海的新剧能蓬勃发展，应归功于新民社。郑正秋爱好京戏，常在《民立报》上发表剧评，并自办《图画剧报》。

一九一三年亚细亚影片公司美国人伊什尔想把新舞台的《黑籍冤魂》拍成电影，通过买办经营三、张石川托郑正秋向夏月珊接洽，因夏索价甚昂，未能成功。张等与伊什尔商量拍滑稽短片，召集了新剧演员十余人，拍了几个短片，后因胶片缺乏，暂时停顿。这班演员由郑正秋供养，因此租兰心戏院演了两天戏。由于生意很好，就在谋得利剧场长期演出。一九一四年正月迁到石路天仙戏园演出。这时又加入了汪优游、李悲世、王无恐、凌怜影等演员。后因天仙改建舞台，去汉口演了一个时期。八月回到天仙，因有民鸣社的竞争，营业大不如前。十二月与民鸣社合并，一部分演员并入民鸣社，一部分演员仍以新民社名义到汉口演出。一九一五年十月因生意不好，在汉口解散，新民社从此不复存在。

郑正秋于一九一六年在上海办大中华新剧社。一九一八年又组织药风社演于亦舞台。一九一九年加入笑舞台和平社新剧

部，期间曾到汉口老圃新剧团演出。一九二三年邵醉翁、张石川办笑舞台和平社时，郑正秋为后台主任，一九二六年正月，他进明星影片公司专任导演，从此不再演戏。

新民社的剧目有《恶家庭》、《永浣车》、《义丐武士》、《家庭恩怨记》、《劫余灰》、《婚变》（又名《新青年》）、《血手印》、《徐锡麟与秋瑾》、《石家庄》、《桃源痛》、《蔡得》、《中山伦敦被难记》、《窃国贼》、《女学生的觉悟》等。

#### 民鸣社

继新民社而起的是经营三、张石川创立的民鸣社，一九一三年冬在三洋泾吉祥街歌舞台演出，一九一四年春搬到大新街中华大戏院演出。演员如陈大悲、陆子美、顾无为、查无影、邹剑魂、钟笑吾等，皆一时之选，故营业甚好，连演三十二本《西太后》，获利达十万元之多。一九一四年冬，新民社与民鸣社合并，演员阵容更加完整。一九一五年创作演出《尧舜》、《闵子骞》、《东郭齐人》三部历史剧，戏中的服装、布景、道具都经过一番考证，力求符合历史真实，但演出不为群众所欢迎。是年夏，顾无为同经营三发生意见，称病请假。民鸣社请任天知代无为，但天知老景颓唐，毫无生气，营业大受影响。不久内部改组，经营三退出民鸣社，无为重新登台。无为因演《皇帝梦》讽刺袁世凯，北京统率办事处严令上海护军使拘捕无为，治以“藉剧煽惑，谋为不轨”之罪，经人多方营救，乃判徒刑三年，发往绍兴原籍执行。此十月间事。不久因房东要加租金，民鸣社不允，遂停演。一九一六年浙督朱瑞反对袁世凯称帝，宣告独立，无为因得出狱。张石川就原址复兴民鸣社。十月以



营业不佳又告停演。一九一九年春，张石川又在笑舞台复开民鸣社。是年秋上海连续发生了几件惊人的社会新闻，民鸣社利用这些题材，先后编演了《蒋老五殉情记》、《凌连生杀娘》、《阎瑞生谋害莲英》，营业大盛。一九二二年五月宣告解散，从此民鸣社不复存在。

民鸣社的剧目有《尧舜》、《闵子骞》、《东郭齐人》、《西太后》、《离恨天》、《胡宝玉》、《可怜姨太太》、《三雌老虎》、《江城》、《蒋老五殉情记》、《阎瑞生谋害莲英》、《凌连生杀娘》等。

#### 启民社

一九一三年秋，商务印书馆职员张屏汉、赵筱依、罗玉亭、黄警寰等发起组织启民社，以后周剑之、凤昔醉、高黎痕等参加，请孙玉声任社长。十二月在共和中舞台演出凤昔醉编的《情海波》，筹款作社内的基金。一九一四年春，在贵州路时疫医院旧址改建小剧场，正式演出。这时又有吴寄尘、龚哨恨、葛剑胆等加入。这个剧社的社员大多有职业。社员们都抱有改良社会风气的意愿。社章宣言：“以启发人心，改良社会，实行社会教育为宗旨，故定名为启民社。”他们与其他剧社不大往来，自编剧本进行演出。终以地点偏僻，剧场狭小，不能与新民社、民鸣社竞争，不及一年即行解散。

启民社的剧目有《启民钟》、《爱之害》、《女丈夫》、《侠儿女》、《薄幸郎》、《恶嫂嫂》、《花小挑》、《阿珍》、《月帘花影》、《鸳盟离合记》、《征鸿泪》、《桃花扇》、《双金锭》等。

#### 文明社

林盈鸣主持的移风社，原在城内福佑路小剧场演出。后来

内部改组，加入殷怡怡等，改名文明社，但不久即解散。

#### 新剧公会

民鸣社编剧许啸天和一个非职业的剧人王汉祥发起组织新剧公会，推非新剧界人士汪洋为社长。汪为《中华民报》总编辑，与各剧社都有联系，因此大家请他主持公会。一九一四年三月新剧公会成立。四月间在民鸣社举行一次会演，为公会筹款。演了《遗嘱》、《女律师》、《恨海》三个戏。不久，这个公会因各剧社意见不和，无形解体。

#### 男女合演的民兴社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间，上海有第一女子新剧社、爱华女子新剧社和坤范女子新剧社。她们都没有自己的剧场，第一女子新剧社每星期一至星期五曾在民鸣社专演日戏，以后到游戏场演出。因为有了女子新剧演员，一九一四年苏石痴拉拢张梯云出资，在吉祥街歌舞台成立男女合演的民兴社。这个社有两点不同于其他剧团：（一）男女合演，但对男女扮演的角色并不严格限制，例如女演员钱天吾、朱天红常扮演男角，男演员王凌波、王幻身常扮女角。（二）每出戏里都有一些滑稽成分。以后游戏场所盛行的滑稽戏、独脚戏都受到它的影响。民兴社因以低级趣味迎合堕落腐化的社会心理，所以在上海只存在了两年。

#### 笑舞台

笑舞台在广西路汕头路口，是唯一的专演新剧的剧场，一九一五年春建成，初名沐尘舞台。园主周渭石自办新剧社，演出新剧，不到两月即失败。三月间，顾无为租下，林如心、肖

天競、李痴佛等演女子新剧，改名小舞台。演到夏天，营业不好，停办，周渭石自组剧团演了一个时期。一九一六年三月汪优游、朱双云、邹剑魂等组大成社，与周渭石前后台合作，改名笑舞台。一九一七年春因营业不佳解约。解约后，周又自干，旋又停演。一九一八年周又约朱双云合作，仅三个月即停演。一九一九年张石川以民鸣社名义演于笑舞台，一九二二年五月停演。是年秋，几个白相人接办笑舞台，一九二三年二月停演。不久张石川、邹醉翁合组和平社，郑正秋主持后台。一九二五年冬邹与张分手，张独办至一九二六年三月。一九二八年秋，陈无我、胡恨生、罗笑倩等合组新生命剧社，是年冬停演，笑舞台改造成市房，从此上海新剧都寄生在游戏场而无独立的新剧场了。

一九一五年前后是新剧的兴盛时期。但就在此时已播下衰败的种子。因为投机分子看到新剧是赚钱的生意，纷纷插手进来，把新剧引入歧途。剧人在群众心目中的地位降低。从此新剧日趋没落，以至奄奄一息。

## 二、话剧运动时期

### 上海戏剧协社

五四运动时期，少年宣讲团的化装演讲取以前的新剧而代之。他们利用新剧的形式来宣传爱国思想及新文化内容，一些戏剧爱好者进一步把爱国思想与舞台艺术结合起来，为话剧的创立作出了贡献。

他们组成了戏剧协社，并得到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等的

帮助，以南市陆家浜中华职业学校的职工教育馆作为排戏及演出的场所。最初的社员有应云卫、谷剑尘、汪优游、欧阳予倩、徐卓呆(半梅)、王怡庵、陈宪谟等，还有钱剑秋、王毓清两个女社员，最后参加的有洪深、顾仲彝、沈浩等。该社自洪深加入后，建立了健全的导演制度，实行男女合演，成为一个生气蓬勃的组织。洪深在《我的打鼓时期已经过了吗？》(载《良友画报》)一文中，曾提到戏剧协社。他说：“戏剧协社在某一个时期，非常之有生气，是中国第一个讲组织讲纪律讲方法的，没有会长副会长等名目，而有一个理事会，每一个理事有一定职务和责任，社内的事情(尤其是财政等)完全公开，无论何人不许例外优待等等。”这样的组织奠定了话剧运动的基础。

戏剧协社于一九二二年冬正式成立。初期演出的大都是爱国剧目，如《孤军》、《血花》等多幕戏，没有女演员，仍以男演员扮女角，应云卫、陈宪谟、欧阳予倩起初都扮过女角。一九二三年夏，演出《孤军》、《血花》、《英雄与美人》等剧目。九月，洪深等加入以后，直到一九三三年十月间，由洪深导演，先后演出了欧阳予倩编的《泼妇》、《终身大事》、《回家以后》，汪优游编的《好儿子》和他译的《血钟》，洪深译的《少奶奶》、《傀儡家庭》、《黑蝙蝠》，徐卓呆的《月下》，以及《威尼斯商人》和《怒吼吧中国》等剧目。一九三三年十月以后，戏剧协社无形解散。

#### 南国社

南国社原是田汉个人办的文艺社，曾出过《南国》半月刊、《南国特刊》，并成立南国电影剧社和南国艺术学院。艺术学院停办后，才正式成立南国剧社。

田汉开始搞话剧是在一九二七年的秋天。那时他主持上海艺术大学的文学戏剧系，把艺大一个大课室当作小型剧场，演出菊池宽的《父归》及田汉自编的《到何处去》、《公园之夜》、《画家与其妹》等剧目。是年冬举行一次“鱼龙会”，一连七天，演出了《生之意志》、《苏州夜话》、《江村小景》、《烧夜鸭子》、《名优之死》、《潘金莲》等剧目。《潘金莲》是欧阳予倩改编并主演的，欧阳饰潘金莲，周信芳饰武松，高百岁饰西门庆，周五宝饰王婆，唐槐秋饰何九叔，唐叔明饰郓哥。一九二七年田汉又得欧阳予倩、徐悲鸿的帮助，成立了南国艺术学院，次年夏停办。

学院停办后，一些学生就组成了南国剧社。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在九亩地梨园公所楼上举行第一次公演，演出了《湖上悲剧》、《生之意志》、《最后的假面具》、《名优之死》、《古潭的声音》、《苏州夜话》等剧目。二十二日起又演了两天，演出《父归》、《未完成的杰作》、《生之意志》、《名优之死》、《湖上悲剧》等剧目，洪深、万籟天、艾霞都参加了演出。一九二九年八月三日在宁波同乡会举行第二次公演，除了一些旧剧目外，还演出了王尔德的《莎乐美》，由金焰、俞珊、郑君里等主演，成绩甚好。一九三〇年夏，在中央大戏院演出了《卡门》，由金焰、俞珊、宗由等主演，由于该剧揭露黑暗政治，第三天被禁演。同年八月加入左翼剧团联盟。不久，南国象艺术剧社一样被查封而告终结。

#### 辛酉剧社

一九二九年一月，朱穰丞组织成立辛酉剧社，在中央大会堂演出《狗的跳舞》，演员有袁牧之、罗鸣凤等。一九三〇年

春，又在中央大会堂演出《狗的跳舞》及《桃花源》。不久又演出契诃夫的《文舅舅》（即《万尼亚舅舅》）。是年八月，加入左翼剧团联盟。不久，由于朱穰丞去苏联，辛酉剧社即告解散。

#### 复旦剧社

一九二九年洪深组织成立复旦剧社，在新中央演出罗当斯的《西哈诺》，演员有洪深、马彦祥、吴铁翼、包时等。五月，又在复旦大学内演出《同胞姐妹》、《寄生草》、《女店主》等。八月，演出《街头人》、《同胞姐妹》、《可怜的斐迦》。冬天到杭州演出《寄生草》。

### 三、党的领导时期

#### 艺术剧社

一九二九年在上海成立的艺术剧社，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一个剧团。社长郑伯奇。它不仅是党直接领导下的一个剧团，而且是进步戏剧工作者的统一战线的组织。从一九三〇年一月六日起，在虞洽卿路（现为西藏路）宁波同乡会演出德国米尔顿的《炭坑夫》、美国辛克莱的《梁上君子》、法国罗曼罗兰的《爱与死的角逐》。当时之所以选演翻译剧本，一是因为当时没有适当的自己创作的剧本；二是因为在租界上演外国剧本比较保险。三天的戏票是经过党领导的赤色工会向学生和工人推销的，观众大多是知识分子及进步工人。同时与剧社有联系的外国记者如美国的史沫特莱，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尾崎秀实，和曾参加过广州暴动的日本记者山上都撰文在外文报上作了宣传。上海戏剧界的田汉、洪深、应云卫、朱穰丞以及其他许多戏剧界

的知名人士都去看戏，从此与艺术剧社发生了联系，为后来左翼剧团联盟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一九三〇年四月间举行第二次公演，演出了改编德国雷马克的小说《西线无战事》的剧本，和冯乃超创作的《阿珍》。演出地点在北四川路横浜桥日本人开的上海艺馆。这一次大规模的演出取得很大的成功，同时由沈端先(夏衍)编的《艺术》和《沙苍》出了两期专刊，加强宣传。还借中华艺术大学办了一个戏剧讲习班，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引起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注意。四月二十八日上海特别市公安局出动了大批武装警察包围了剧社的办事处，封闭剧社，并捕去社员五人。艺术剧社被封后，即发出告上海民众书，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发出告国人书，左翼作家联盟也发表反对查封艺术剧社的宣言，提出抗议。

艺术剧社自一九二九年秋成立到一九三〇年五月被封，虽然存在不到一年，但在党的领导下，使话剧运动走向新的方向。

从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到左翼戏剧家联盟(剧联)

及上海学生剧团联合会(学联)

一九三〇年三月，艺术剧社、摩登社倡议，得到各剧社的响应，组织成立了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当时选出艺术剧社、摩登社、剧艺社、南国社、辛酉社的代表为执行委员，青鸟社、戏剧协社、紫歌演剧队的代表为监察委员。不久，这个组织即改组为左翼剧团联盟，成员是艺术剧社、南国、辛酉、大夏、摩登、戏剧协社、光明七个剧团。后来艺术剧社和南国社相继被封，朱穰丞出国，辛酉社随之解散，光明社因洪深引起反动政府注意，不能活动，因此左翼剧团联盟工作无法进行，于一九

三一年一月宣告解散，改为以个人相结合的左翼戏剧家联盟（以下简称剧联）。在剧联领导下，先后组织了许多剧社，并深入学校进行演出，兴起了话剧运动的新高潮。

一九三一年一月大道剧社成立，社员有一百人以上，骨干有刘保罗、郑君里、周伯勳、李尚贤、胡萍、鲁史、侯桐、赵铭彝、谢兆华、郑雄、俞瑜等。第一次在持志大学演出了《梁上君子》。持志学生自己演出了《垃圾桶》。二月下旬至三月七日，在大夏大学联合大夏剧社公演三次。大道剧社演出根据苏联小说《第四十一》改编的《马迪迦》，以及《洪水》、《街头人》、《生与死》、《生的意志》等剧目。大夏剧社演出《死罪》、《月亮上升》、《暴风雨的黄昏》、《廉耻》等剧目。五月十六七日，在暨南大学联合暨南剧社公演，大道剧社演出都德的《阿莱城姑娘》、欧阳予倩的《车夫之家》及杨骚的《YELLOW》等剧目。暨南剧社演出《最先与最后》、《婴儿杀戮》、《最后五分钟》等剧目。六月二日复旦大学的时代剧社第一次公演，演出《生的意志》、《雪的皇冠》，大道剧社演出《YELLOW》等剧目。同月，持志大学举行游艺会，大道剧社参加演出，演出《生的意志》。六月十四日，劳动大学附中的新筑剧社演出《阿莱城姑娘》。六月下旬，中国公学由顾仲彝领导的中公剧社演出《阿莱城姑娘》。六月三十日劳动大学的那波剧社第一次公演，演出犹太阿胥的《夜》、秋田雨崔的《首陀人的喷泉》、奥尼尔的《战线内》、显尼志劳的《最后的假面》等剧目。这次演出后，那波的领导人邹惟、向培良等人于立达学园组织了立达剧社，演出《雪的皇冠》。

在学校戏剧运动蓬勃开展的情况下，暨南剧社发起，各学



校剧团参加，成立了上海学生剧团联合会，组成了学校戏剧运动的统一战线。“九·一八”的炮声，震动了上海的剧团，大道剧社在暨南大学联合暨南剧社公演《乱钟》及田汉编的《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锦州失陷后，上海学生剧团联合会联合大道剧社、曙星剧社等成立一个上海剧团联合会，并举行示威游行，队伍通过南京路时，剧团联合会的旗帜飘扬在帝国主义的租界上，给了群众很大鼓舞。为了筹款援助东北义勇军，上海剧团联合会在市商会召开了一次反日演剧联合大会，大道剧社演出《乱钟》，暨南剧社演出《血花》，曙星剧社演出《活路》、《工场夜景》，暨大教育学院学生演出《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在“一·二八”开战的那一夜，暨南剧社正在演出《白茶》、《活路》、《乱钟》等剧，当他们刚刚演完，炮声随即传来，同学们马上集合开会。在会上，大家都坚决表示一定要投身于抗日斗争。

“一·二八”事变以后，上海的剧团沉寂了一段时间，一九三二年“九·一八”周年纪念时，各剧团又活跃起来。为了纪念这个悲痛的日子，上海剧联组织了许多演剧队，出发到马桥、闵行、大场、北桥等近郊去公演，使戏剧走向农村。他们编了《义勇军》、《民众之力》、《活动新闻》等戏，用本地方言演出，收到很好的效果。演到最激烈时，台上台下口号声连成一片。这时有许多小团体及戏剧爱好者组成一个春秋剧社。

一九三三年，上海剧坛又添加了不少新团体，有骆驼演剧队、三三剧社、光光剧社、曦升剧社和左明、陈凝秋、赵丹等组织的新地剧社等。在此期间，“戏剧走向农村”的口号叫得很响。春秋剧社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中旬前往大场演出，骆驼、大

同、春秋联合到嘉定演出，三三与光光到苏州去演出。一九三四年一月上旬，漕河泾农学园主持举行农友联合会，演出田汉的《梅雨》，适夷的《活路》，潘一尘的《巧姑娘的命运》及《江村小景》等剧目。

一九三四年二月，无名剧人协会成立，并演出了《月亮上升》、《流浪者》、《梁上君子》、《同住三人家》、《梅雨》、《银色》、《叛徒》、《捕鲸》等剧目。六月中旬，上海各大学戏剧团体联合会成立，并在湖社公演，参加的有法政学院、暨南大学、上海商学院、光华大学、持志大学等。是年，中国旅行剧团成立，由唐槐秋、戴涯主持，团员有唐若青（槐秋女）、吴静（槐秋妻）、赵曼娜、冷波、舒绣文、张惠灵等。该团成立后即赴南京演出。

一九三五年一月三十一日至二月二日，上海舞台协会由应云卫、袁牧之等主持，在金城大戏院演出《水银灯下》、《回春之曲》，参加演出的有玉莹、赵丹、王人美、金焰、丁子明、魏鹤龄、洪迥、郑君里、胡萍等，这是话剧演员与电影演员第一次携手合作，成绩很好。

一九三五年六月，万籟天、金山、赵丹、徐韬等组织业余剧人协会，魏鹤龄、吴涓、蓝苹等参加，于六月二十八日起在金城大戏院演出《娜拉》，连演三天，不久又在湖社演出，成绩很好。南市开明中学、华东女中、中国女中、大公职中等学校联合组成一个现剧社，于六月下旬在开明中学演出鹿鸣的《圣诞之夜》。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四日，业余剧人协会在卡尔登举行第三次公演，演出欧阳予倩导演的《欲魔》，章泯导演的《大雷雨》，

沈西苓和宋之的导演的《醉生梦死》，应云卫任舞台监督，演员有赵丹、郑君里、顾而已、左明、魏鹤龄、王为一、英茵、吴湄、陆露明、李林等。三四月间，业余、四十年代、中旅、光明、新南等五个团体在卡尔登举行一次春季联合公演，演出《大雷雨》、《春风秋雨》、《生死恋》、《求婚》、《结婚》等剧目。这次公演后，业余剧人协会改为职业剧团，易名业余实验剧团，由张善琨投资主办，应云卫任剧团主任，委员有赵丹、章泯、郑君里、贺孟斧，演员有顾而已、王为一、俞佩珊、英茵、吕班、严恭、徐渠、章曼萍、范莱等。

话剧运动蓬勃发展，使反动统治阶级深感震惊，他们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和破坏。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一日，星期实验小剧场在新光大戏院准备演出《走私》、《秋阳》及《都会一角》三个戏，事先均经上海市社会局检查通过，但在开幕之前，工部局突然下令停演，理由是台词中有“东北是我们的领土”字句。剧场在武力逼迫下只好停演，全体演员含泪向观众道歉，全场观众极为愤慨，高呼着口号要他们照常演出，但事实已不可能，他们就喊着“东北是我们的领土”的口号退出戏院。随后，蚂蚁剧社原定二十三日在湖社演出《走私》、《号角》、《毒药》三剧，但又被禁演。事件发生后，全国文化界和戏剧界联合起来，向工部局提出抗议。为了纪念此事，陈白尘写了《演不出的戏》，严恭写了《开演之前》，鹿鸣写了《后台》等几个剧本。一九三七年六月八日，各大中学校发起举办“上海市学生联合赈灾游艺会”，参加的共有十二个团体，预定在亚蒙大戏院公演，剧目有《都会的一角》、《一袋米》、《警号》、《在关内过年》、《汉奸

的子孙》、《醉生梦死》等，事先都曾送社会局检查通过，但临时突然遭到法捕房禁止，只好停演。同时上海大学剧人联合会、一九三七剧社、四十年代等剧团都在排演《黑地狱》，后接到禁演令，又只好停演。

一九三七年八月八日，上海全体戏剧工作者通力合作，在南市蓬莱大戏院演出《保卫芦沟桥》，接连演了七天，每场观众看毕都高呼口号，怀着满腔的悲愤走出剧场。

“七·七”芦沟桥事变后，话剧运动走上了救亡的道路。一部分剧人组成了救亡演剧队，离开上海到各地演出，一部分剧人留在上海同敌人作顽强的斗争。

#### 工人戏剧运动

蓝衫剧社是当时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剧联所掌握的工人戏剧运动的秘密组织。“九·一八”事变后，在沪东、沪西曾多次演出，剧本是根据当时真实的事情编成的。吴淞铁路机器厂附设的职工子弟学校也是蓝衫社活动的据点之一，金山曾在那里主持了一个时期，演出了《谁是朋友》、《一致》及新编时事剧《锅炉爆炸》。因这个戏演得过于激烈，并唱国际歌，致使学校参加剧社领导的三位教员被捕。在蓝衫剧社指导下，有美美、南美、三友、浦青、铁工等工人组合。一九三三年一月二日山海关失陷时，人民群众非常激愤。浦青就演出了《小小猎夫》、《放下你的鞭子》等剧。这时蓝衫剧社着重在沪东和沪西的工人区举办捐助东北义勇军的游艺会。九日上午十时左右，沪东办事处突然被伪公安局包围，捕去三友剧社、绸业工人剧团等社员二十余人。这样，剧联组织的不少蓝衫剧社，虽然还保存了几

个，但已不能自由活动了。

### 抗战期间的上海话剧

全民抗战兴起以后，留在上海的剧人坚守岗位，同敌人作不屈不挠的顽强斗争。各个业余剧团最初曾沉寂了一个时期，到一九三八年秋，又渐渐活跃起来。一九三九年八月上海剧艺社由业余转为职业剧团以后，职业剧团相继而起，经常有五六个职业剧团同时演出，最多时有十家同时演出，这是因为：（一）自从一九三〇年话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提出了面向大众的方针，话剧向工厂、学校、社会三方面发展，几年来培养了许多人材，他们在各个业余剧团中起了骨干作用。（二）太平洋战争开始，日军进占租界，人们直接受到敌伪的压迫，心情压抑，话剧有时能说出人们心中想说的话，特别是当时演出的剧本多富有民族意识，得到人民的热爱。如《文天祥》，在兰心戏院日夜连演了五个多月。（三）美国影片绝迹上海，让出了许多戏院。抗战期间，上海虽然经历了两个时期，即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一年的孤岛时期及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秋胜利以前日伪占领时期，但话剧运动始终在发展。

#### （一）上海剧艺社

上海剧艺社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剧社。剧艺社得到法文协会支持，由中法联谊会戏剧组主办，所以能在法工部局大礼堂演出。剧艺社在法工部局大礼堂演出几场后，即在新光戏院上演星期早场。经过一个时期，于一九三九年八月六日在璇宫剧场（浦东大楼璇宫舞场改建）正式改成职业剧团，演到十二月五日，迁到辣斐剧场（辣斐花园舞场改建），于十二月二十一

日开演，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军进占租界，剧艺社才被迫解散。

剧艺社先后演出的剧目有《明末遗恨》、《祖国》、《李秀成殉国》、《梁红玉》、《大明英烈传》、《正气歌》等。编导有于伶、洪深、夏衍、吴永刚、吴祖光、阳翰笙、佐临、吴仞之、朱端钧等，演员有舒适、徐立、李健吾、乔奇、刘琼、章杰等。

### **(二) 中国旅行剧团**

当剧艺社迁到辣斐剧场演出时，中国旅行剧团适从外埠来到上海，即在璇宫剧场上演。到一九四一年三月，因璇宫剧场出售于天风公司，中旅内部发生纠纷，暂时停演。四月间在兰心戏院上演一个短时期，即到卡尔登与天蟾上演日场，直到八月才在天宫剧场日夜演出。与天宫订立的合同期满后，又在皇后戏院演了三个月，以后就在新建的丽华戏院演出。在丽华演出时期，中旅发展到在丽华、美华、绿宝三个剧场同时演出，这是中旅发展的顶峰。唐槐秋本来是个不善经营的人，事务方面要依靠别人，一下子发展到三个剧场，经营不得法，元气大伤，美华、丽华先后停演，最后剩下一个绿宝也不能维持，只好解散。后来唐若青试图重振中旅，也未成功。

中旅自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四年上演的剧目，有《复活》、《风云儿女》、《雷雨》、《阿Q正传》、《李香君》、《花木兰》、《日出》等。编导有吴永刚、焦菊影、费穆、卜万苍等，演员有唐若青、王献斋、罗兰、白穆、黄河、孙景璐、静波、石挥等。

### **(三) 其他剧团**

这个时期，上海话剧极盛一时，剧团多达三十多个，但时

起时伏，演出剧场不固定，演出时间久暂亦不同。现在只能综合写出一个概况。

自一九三九年到抗战胜利，先后演出的剧团，有中法剧社、影联社、上海艺术剧团、天风剧社、综艺剧团、联华剧团、艺联剧社、艺光剧团、诚社、华菁剧团、力行剧团、苦干剧团、潮锋剧团、中电剧团、上海实验剧社、华艺剧团、光明剧团、子女剧团、新华剧团、艺风剧团等。演出剧目有《北京人》、《阿Q正传》、《雷雨》、《上海屋檐下》、《蜕变》、《希特勒之死》、《文天祥》、《云南起义》、《塞上风云》、《春天里的秋天》、《大义灭亲》等。编导有许幸之、吴仞之、佐临、费穆、洪漠、姚克、张骏祥、洪深、梅阡、唐槐秋等。演员有上官云珠、黄宗英、江泓、仇铨、白虹、孙景璐、张伐、韩非、穆宏、丁兰、于飞、乔奇、舒适、白杨等。

在这许多剧团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苦干剧团，它的前身是剧艺社的一部分骨干分子组成的上海职业剧团。他们艰苦朴素的作风，严肃的演出态度与剧艺社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说抗战初期剧艺社是话剧的主流，那么抗战后期的话剧主流无疑是苦干剧团。它坚持在巴黎戏院演了一个较长时期，一九四五年一月改在辣斐大戏院上演。到了五月抗日战争临近胜利前夕，敌伪突然向话剧界发动进攻，苦干剧团只好以歇夏为名，暂时停演。抗战胜利之后，在反动政府统治之下更不易发展，只演了三四个月，就宣布解散了。

（黄鉴铜 整理）

# 上海职业话剧的起源

林道源

## 一、职业话剧的诞生

中国之有话剧，肇始于一九〇二年，创办者为上海圣约翰书院几个学生，编排了两出有短短台词的话剧。此风一开，于是徐汇公学、南洋公学、私立中学、南洋中学等校，纷纷继起。但这一时期的话剧，只限于在学校内活动，未扩及社会。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私立中学学生汪仲贤（后名汪优游），在校外组织了一个文友会，假昼锦牌坊陈宅大厅举行了一次公演，此后话剧团体陆续产生。不过这时剧团的演出，仍然是课余或业余消遣活动，并非职业性质。至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任天知创立进化团，始有职业话剧团体。

话剧之所以踏进职业之门，以及迅速遍于各地，其原因有以下几方面：（一）当时一般爱好戏剧的学生走出学校之后，找不到出路，非常苦闷，王钟声、任天知遂利用之以营利，且借此作为政治活动。（二）一般顽固家庭以娼优皂卒不齿于士类，发觉他们的子弟参加某一剧团，演过某一次戏，尤其是演过旦角，便以为有辱门庭，万难容忍，将他们逐出家门，这些被家庭遗弃的子弟没有生存的办法，遂利用演剧经验，以演话剧作为职业。（三）有些游手好闲者，看到当时话剧不一定要剧本，只



凭一点小聪明，便可以上台演戏，不但生活得以解决，且能获得意外的际遇，一举两得，遂摇身一变而为新剧家（话剧名称直至五四运动以后方才确定，在此以前，一般人都称之为“新剧”或“文明戏”）。（四）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以后，剧团中盛行一种“投师拜门”的习惯，不论何人，只要拿得出数十元的拜师费敬以及宴客费用，就有人介绍去拜当时的著名剧人为师，取得上台实习的机会。实习了两三个月，便能挣包银，扮旦角的大约每月可得十六元至二十元，扮丑角的每月可得十二元至十六元。再经过两三个月，看熟了几出戏，听熟了几段固定的台词，便可以跑小码头，充正场角色或自办团体。实习时期只能扮旦角或丑角，不扮老生和小生。因当时之所谓老生，至少限度要能读一两种报纸，稍微明白一些时事，否则到台上，就没有长篇大套借题发挥的言论可发，没有言论发挥，便不成其为老生。小生一门是个不易讨好的角色，而且也要识字，方能吐词隽雅，因此练习生不能胜任。

话剧之所以职业化，而且能普及开来，不外乎上列的四个因素。后来，初期话剧之所以失败和为人所鄙弃，虽然与时代有关，但上列三四两项演员中人品太杂，糟粕泛滥，实为主要原因。

## 二、职业话剧团——进化团

中国第一个职业话剧团体，要算任天知主办的进化团。天知的家世，言人人殊，或说他是台湾人，或说他是满洲人，而他自己却说是西太后的私生子。据个中人观察，他大概是北方

人，曾经到过日本，也许入过日本籍，故他有时也名藤堂调梅。他在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与王钟声合创通鉴学校于上海。通鉴学校是个研究戏剧的专门学校，曾经在上海、苏州、杭州等地公演过几次。在上海演的是《迦茵小传》和《张文祥刺马》，地点在宝善街春仙茶园。因当时话剧不为社会所重视，不到半年，通鉴学校即告解散。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任天知在报上刊登征求演员的广告，一些爱好戏剧者纷纷应征，进化团于是成立。成立之后，本拟在大舞台上演，因恐不能号召，即迁至南京，在升平戏园上演《血蓑衣》、《东亚风云》、《新茶花》诸剧，营业甚盛，天知得意之至，就在戏园门口高树旗杆，上悬一白地红字的《天知派新剧》的大旗，因此“天知派”三字流传于当时。

在南京上演三个月，进化团于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四月到芜湖，演出于中江大舞台，历时一月。芜湖警察厅厅长丁幼兰，以进化团所演之剧，台词中时有革命宣传词句，下令禁止，天知乃挽驻宁日本领事出而交涉，警厅深恐牵动外交，遂撤销禁令，让他们继续上演。

是年六月，天知率团员从芜湖到汉口，原定在棉花街荣华戏园上演，湖广总督瑞澂说天知“鼓吹革命，摇惑人心”，请示清廷，奉谕拿办。荣华戏园园主李荣斋得此消息，立即告知天知。天知迅速安排团员分头避匿，自己则坐观其变，并电请驻汉日领营救。不料当天晚上，就有部队开来包围戏园，天知越墙逃遁。

当时上海商人经润三、黄楚九等正在创设新新舞台，看到

南市新舞台夏氏兄弟和潘月樵等排演的《黑籍冤魂》、《新茶花》、《拿破仑》等新剧盛极一时，遂决意加演进化团的天知派新剧与之抗衡，而进化团恰于此时由汉归来，乃由沈李舟介绍，与任天知签订合同，其条件为每场京戏演出后加演新剧一出，每月由新新舞台给任天知个人包银一千元，全团包银三千元，合共四千元。因新新舞台工程未竣，进化团暂留沪等候。

任天知以前对团务事必躬亲，自签订合同以后，态度突变，完全假手于人，自己则终日流连于妓院，征歌选色，纸醉金迷，不久又染上鸦片烟瘾。团员向他谏劝，他充耳不闻，驯至不与团员会面。

一九一二年新新舞台工程完竣，定期开幕。进化团预备排练节目，团员多数主张以《血蓑衣》作为首场演出，独有团员汪君良主张以《尚武鉴》（即日本小说《鬼士官》）为打炮戏，因所用的服装为完全新制的和服，借此可以一新观众的耳目。任天知自己原来扮演《血蓑衣》的辛玉洁，非常繁重，为自身省力计，就接受汪的主张，决定演《尚武鉴》。有人力争，天知不为动，于是顾无为、汪优游等团员相约作消极的抵制，拒绝扮演剧中重要角色，仅各扮一滑稽士兵以塞责。当时上海租界工部局规定，凡各戏园夜戏不得超过晚间十二时。《尚武鉴》一剧需演三小时，开幕的那一晚，时钟已指十点半，而最后一出京戏——潘桂芳的《打棍出箱》尚未登场，经新新舞台经理孙玉声再三催促，《打棍出箱》才于十一时二十五分演毕，因此一出《尚武鉴》只有半小时可演，由于时间限制，不得不将剧情斩头去尾，使观众看得莫明其妙（《尚武鉴》共分十二幕，是夜仅演第三幕及

第五幕的上半截)，又因汪优游等不扮重要角色，以致演出缺乏精彩，更因日本装束，平时没有训练，所以上得台去手足无措，变成了猢猻把戏，尤其是扮女角的化了装，象是无锡大阿福。有此种种种原因，这次演出不但不受观众欢迎，而且除了天知本人以及几个滑稽角色外，其余的都被喝了倒彩。演到第五幕上半截，因法定时间已到，不待台词念完，突然闭下幕来，引起观众的极大不满，纷纷将桔皮香蕉等掷到台上，秩序大乱，昔日曾获盛誉的进化团，至此遭到失败。

演旧戏，本来有一定的时刻，但其中尽有伸缩的余地。即以《打棍出箱》为例，全剧分问樵、闹府、打棍、出箱四节，若仅演闹府，则半小时便可毕事，倘从问樵演到出箱，就非一小时半以上不可。孙玉声对于旧戏是有相当经验的。据说戏目排定之后，孙玉声曾经考核过，以时间来推算，进化团的《尚武鉴》是足够演全的。却不料开锣戏《黄金台》，临时带演了《盘关》，武戏《泗洲城》临时多翻了两场斤斗，多加了两场档子，每演一个节目，差不多均超过应有的时间一刻钟或十分钟，因此进化团的新剧局促不堪，便没有时间毕演了。据说这是新舞台潘月樵捣的鬼，他怕进化团演出成功，影响新舞台的营业，事先嘱咐新新舞台后台经理潘桂芳这样安排的（桂芳系月樵族侄，由月樵介绍参加新新舞台）。

剧终之后，进化团团员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在会上，顾无为坚决主张与新新舞台脱离关系，到宁波去另谋出路。汪优游主张据理力争，不可采取断然处置。而此时的任天知为烟色所累，深恐事情决裂，没有一千元的月包银可拿，所以极力主张

容忍。于是顾无为等大为不满，自动离团，一时从之而去者，有陈无我等十余人。第二日，三方会商的结果，决定新剧上演时间以一小时为限，倘新剧的登场人物过多，团员不够分配时，得商请京剧演员参加。于是新旧剧的一场冲突，暂告段落。

当时的话剧都是多幕的，绝对没有一出独幕剧，因此每一出戏所需时间，总在两小时半和三小时之间。现在既受时间的限制，又加入京戏演员，削足适履，百无一是。而任天知不自振奋，只是将原有的戏分为两天或三天去演，不努力另排短剧，以适应时间的限制。因此所演各剧毫无精彩，数日之后，观众一见话剧登场，即纷纷离座而去。这样地敷衍了一个月，新舞台便和进化团解除了契约。

在未解约以前，进化团内部发生过风波。团员黄喃喃，又名二喃，曾留学日本，原为春柳社社员，与同盟会有相当关系，因此与孙中山先生很接近。当进化团开幕之初，孙中山先生曾在台幕上题有《是亦学校也》五字，因此进化团身价十倍。上演没有几天，黄喃喃和任天知发生意见，自请脱离关系。离团之日，黄喃喃欲把孙中山先生的题字拆去，说这是孙中山先生送给他私人的。任天知不许拆，黄喃喃便向公廨起诉。没等到宣判，进化团已离上海，此事遂不了了之。

解约以后，进化团就去宁波，上演于甬江大舞台，营业非常兴盛。但不到两个月，因各地职业剧团风起云涌，挖角之风大盛，同时团员之间彼此摩擦日趋尖锐，于是开山鼻祖的职业话剧团——进化团，四分五裂，团员各自纷飞，散至各地，以

致进化团的名称亦不能保存。是年八月间，进化团的布景工人秦涌春，在芜湖重整旗鼓，拥天知为团长，派人分赴各地，将进化团的老团员汪优游、范天声、陈天晓辈，尽行邀来，在中江大舞台演出，进化团因得复兴。但终因市面萧条，不能持久，三星期后即转至扬州，上演于大同戏院。因扬州人没有见过话剧，故座客常满。可惜不到半年，又因主要演员之间发生意见，团员又纷纷离团。进化团之复兴，终如昙花一现，至此寿终正寝。

### 三、独树一帜的开明社

职业话剧团体——开明社成立于一九一二年，仅后于进化团三年。社长朱旭东，河北人，长于音乐歌舞。开明社初期上演的戏剧不同于其他职业话剧团，有两个特点。一是剧本完全取材于西洋小说，所演的戏都是西洋服装。二是每出戏里总有几支歌曲，几节舞蹈，类似西洋的歌舞剧。北大名教授语言学家刘半农，以及在电影界专演老人的李君磐，都曾参加过开明社。一九一二年三月，开明社在上海大舞台举行首次演出，不过这次演出是为了响应当时的所谓国民捐，演剧输捐的。直到是年八月，始在中华大戏院营业（三马路大新街惠中旅社旧址），但只演了三天。其失败的原因和进化团一样，也是因为附在京剧之后，彼此磨擦造成的。

开明社第一天在中华大戏院上演的是歌剧《情痴》，共分四幕，仅演了两幕，便因时间限制突然中止，有头无尾，观众极不满意，又因剧中偏重歌曲，所唱的都是西洋调子，不为观众

所接受。因此演了三天，院主便不容继续演下去。朱旭东知道在上海不能立足，而长江上下游码头，又看厌了进化团一派的话剧，这独树一帜的歌舞剧也决不能生存，乃率其社员远走四川，在成都演出，营业很好。

一九一三年十二月间，开明社从成都回沪，于次年甲寅正月，上演于上海法租界歌舞台，不久任天知也加入。此时开明社的作风，已经有所转变，不是单纯的演唱欧化的歌舞剧，也不是上演天知派的话剧，而是兼取诸家之长，意图创新。

此时上海一隅，职业话剧团约有六家。爱好艺术的观众，群集于春柳剧场；爱看布景和热闹的，都到民鸣社去；嫌春柳社的戏太冷，而又嫌民鸣社的戏太闹的，则集中于新民社。因此开明社的营业自始至终，都没有兴旺过。到了是年五月间，再也不能维持，就此宣告停业。停业之后，朱旭东率领二十多个基本演员，仍以开明社名义，历演于南洋群岛达三年。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开明社自南洋归来，团体宣告解散。到了一九一九年，开明社的基本社员史海啸、周石吟等，在北京成立了益世社，集合开明社老社员，在新世界上演，朱旭东虽非社长，然仍以顾问名义，在暗中主持社务。开明社在此时期，虽名义不复存在，但它的精神仍继续存在。直到一九二三年，在北京话剧被禁，史海啸一怒而改业，益世社的名称消失，开明社的实质也从之而亡。

清政府及北洋军阀政府都仇视话剧，一直想把它扼杀。这是因为：清政府认为话剧宣传革命，危害其统治；北洋军阀政府认为话剧进行赤化宣传，而话剧暴露社会黑暗，描绘官场腐

败，更为封建势力所不容。少数演员偶然发生桃色事件，一般不满话剧的人便以此加以攻击。因此各地话剧被禁，势不能免。

一九一三年以后的开明社，虽不常演歌舞剧，但它的基本社员不但能歌善舞，而且每个人都有一些音乐才能，所以益世社解体以后，各地舞场的乐队中，都有一些开明社的老社员在内。

开明社在职业话剧团中是个老不得志，埋头苦干的团体，但它的组织比较严格，基本社员除演剧外，每日还有几项必修的科目，如练习乐器，练习歌舞，以及朗读剧本等。现在一般戏剧界中人，往往以为初期话剧只有幕表，没有剧本，其实不然，开明社的《情痴》、《茶花女》、《复活》等剧，均有剧本，而且含义颇深。

（黄鉴铜 整理）



# 上海电影事业话旧

高黎痕

## 一、最早的中国影片和上海最早的影片公司

一九〇九年美国影人宾杰门、布拉斯基投资，在上海开设亚细亚影片公司，由于业务不易开展，不久转让给伊什尔接办。一九一三年间，伊什尔看到城内新舞台上演的改良文明京剧《黑籍冤魂》情节好、观众多，想把它拍成影片，找买办经营三商量，请经与新舞台接洽。

《黑籍冤魂》由夏月润、夏月珊主演，清末在英租界丹桂茶园上演时轰动一时，因为当时全国上下掀起禁吸鸦片烟运动，该剧劝人戒烟，得到观众赞赏，因而久演不衰。经营三原来开设民鸣新剧社戏院。他接受伊什尔的请托后，找经理张石川设法。张知道新民新剧社主任郑正秋和夏月润友好，便请郑与夏接洽，但因代价谈不拢，未能成功。通过这次联系，后来伊什尔与张石川、郑正秋合作，郑编张导，拍了好几部滑稽片，演员都是新剧（上海最早的话剧）演员，其中有钱化佛、张利声、郭咏馥、胡恨生等。

张石川本来不会导演，但他懂英文，能领会伊什尔在现场指点，又看过许多外国影片，并常看新剧表演，而他所导演的影片的演员又是新剧演员，所以能够应付导演工作。可是伊什

尔胶片不多，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胶片来源断绝，用完后无以为继，加上亚细亚影片公司所拍的片子不卖座，不久停业。当时张石川、郑正秋拍摄的影片，可算是最早的中国影片，所以他们成为摄制中国影片的创始人。

一九一七年，商务印书馆开始兼拍电影，后来董事中有人认为电影是游艺事业，不同于教育文化事业，因之停拍。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二年间，但杜宇、朱瘦菊设立上海影片公司，张石川、郑正秋设立明星影片公司，以上这三家是上海最早的影片公司。此外还有张謇创办的中国电影公司，但设厂于南通，上海仅有办事处，未能发展。

到了二十年代，上海影片公司逐渐增多，有黎民伟的民新公司(后与华北影片公司合作改为联华公司)；有任矜苹退出明星公司后开设的新人公司；还有朱瘦菊、陆洁的大中华百合公司，汪照昌的神州公司，陈铿然、徐琴芳的友联公司，李泽源的长城公司，张蕙冲的蕙冲公司，张惠民的华利公司，任彭年、邬丽珠的东方公司，邵醉翁的天一公司，严春堂的艺术公司，徐半梅、汪优游的开心公司，杨小仲、程小青的昌明公司，张伟涛的大陆公司，顾无为的大中国公司(后改大华)，洪仲豪、钱似莺的金龙公司等。此外还有些小公司。到了三十年代，除明星、联华、艺华、大中国等外，其他不少公司都先后停业。

明星影片公司创办人张石川和郑正秋，以前都是从事新剧活动的。张石川一度从事交易所投机，失败后，把剩余资金数千元，投资开设明星影片公司。明星公司刚成立时，情况很困

难。一九二三年拍摄《孤儿救祖记》后，情况有了转变，此后自建摄影棚，业务飞速发展。在摄影技术上，张伟涛、董克毅向亚细亚影片公司的摄影师英国人郭述亚学习，掌握了摄影技术。演员也是自己培养出来的，如《孤儿救祖记》中的演员郑鹤鹑、郑小秋是郑正秋家里人，王献斋原来是个眼科医生，业余时间来拍戏，王汉伦也是有职业的，他们通过实践，演技逐渐成熟。

一九二五年夏，原与张石川、郑正秋合办专演新戏的笑舞台的邵醉翁，接受了光华影片公司的全部设备和在北四川路东横浜路的露天摄影场，成立了天一影片公司。公司内除了邵氏兄弟外，只有五个职员，其中魏鹏飞、高黎痕两人是兼演员的，另有一个女演员吴素馨，一个布景师董天民。以上三个演员原来都是笑舞台的新剧演员。以后拍戏时需要各类演员，也请笑舞台的演员充任，拍一天戏，送几元车马费。天一影片公司拍摄的第一部影片《立地成佛》，宣传佛教，受到南洋片商的欢迎，卖了好价钱，因此，这年冬天公司迁到东西华德路陈家花园，但仍旧在露天拍戏。后来同华侨青年公司合作，改名为天一青年影片公司，得到了一批灯光设备，又迁到甘斯东路，盖起了摄影棚，才奠定了基础。天一成立时，资金不到一万元。二十年代成立的许多电影公司，也同天一、明星一样，资本都是很少的。有的既没有拍片设备和场地，也没有基本演员，一切都要借重他人，所以除了几家较有基础的公司外，其余的都因资金周转不灵和其他原因相继歇业。

## 二、编写电影剧本的缘起

上海早期拍摄电影，本来并没有完整的剧本，只有一个详细的故事，由导演分场、分镜头。因为早期电影是无声的，所有对话也是由导演现编的。等到拍摄完毕后，再由导演或编剧根据场记的记录，编好对白，写成字幕。剧中人讲话，演员开口说一两句话，就接上字幕，所以拍戏时多说也没有用处。不过演员讲话的语气和表情，必须符合剧中人当时的情感。

拍电影先编剧本，大约是从二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原因是由于南京国民党中央宣部设立了电影检查委员会，对影片实行检查，通过检查，领到了放映证，影片才能放映，有时被刁难不予通过，影片公司就要受到很大损失。因之影片公司申请设立剧本审查机构，剧本先通过审查，再行拍片，如此即使发生问题，也只有部分修改，不致于全部报废。由是国民党中央宣部又设立剧本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剧本。当时送审的也不是文学剧本，大致是幕表形式，内容为主旨、详细故事、分场；分场中再分本场详细情节、重要对话。

到了三十年代初期，上海左联决定派人参加影片公司工作，于是田汉加入艺华，沈西苓、王莹、高季琳(柯灵)加入天一拍《女性的呐喊》。拍到一半，天一当局觉得与他们气味不同，就把片子停拍，他们三人转到明星公司。当时明星公司编剧委员会是由郑正秋、洪深、姚苏凤等负责组成，夏衍(黄子布)、阿英(张凤梧)、郑伯奇(郑君平)都是明星公司编剧委员会的委员。南京方面对左联作家参加电影界非常注意，明星公司对此

也十分警惕，所以夏衍等从未参加过公司的会议，剧本讨论会及编导联席会议，多半在姚苏凤家里举行，有时在沪西外国人开设的一家俱乐部(栗娃丽达)开会。这时候，明星公司才有完整的剧本，但这种剧本不多，大部分还是老办法，采用幕表式剧本。

### 三、上海最早的有声影片

上海早期的有声影片，可分为三个阶段：(一)腊盘配音，(二)外国录音机片上发音，(三)中国自制录音机片上发音。

上海最早的一部腊盘配音片，是由明星公司和法商百代唱片公司合作摄制的《歌女红牡丹》，用的是一个临时组织的民众电影公司的名义。腊盘配音本来是外国有声片初期采用的方法，当时已经落后，但是由于中国资本家不重视电影事业，各电影公司资金短缺，无力购置摄制有声片的先进设备，所以只好试用腊盘配音。而腊盘配音也有技术上的困难，如唱片运转速度与影片的摄映运转速度不一样，普通唱片面积太小不合影片需要等。当时上海只有百代唱片公司有条件可以解决这些困难，因之明星影片公司总经理张石川利用与百代公司买办张长福堂房叔侄的关系，取得合作，并得到百代巴黎总公司同意，订立了双方合作拍摄十二部有声影片的合同。一九三〇年秋开始摄制《歌女红牡丹》，完成后于一九三一年初，在新光电影院上演，营业甚佳。第一部片子拍成功了，获得了一些经验，就继续拍制《如此天堂》，上下集，共有二十九本，同年九月也在新光电影院上演。明星公司虽然拍制了上述两部腊盘配音

片，但演员觉得天热配音室密不通风，拍完影片又要配音，付出的劳动和时间增多，要求加付酬金。明星公司原来采用固定工资和酬金相结合的制度，如果加付酬金，那末开支太大，所以不同意演员提出来的要求，演员就宣布以后按照合同办事，只拍戏，不配音。同时，这种腊盘配音片在电影院放映时也经常出问题，影片脱胶断片，放映员手忙脚乱，时常引起观众不满，所以明星公司拍了两片后就不再续拍，后派洪深到美国去采购拍摄有声片的机器设备。

在明星公司拍摄腊盘配音片的同时，友联影片公司主人陈铿然和摄影师刘亮蝉，会同广泰机器厂主人张阿六，设计了一种牙齿盘，可使普通七十八转的唱片与影片放映机相适合。他们用这种设备，拍了一部腊盘配音的《虞美人》，方法是先录音，后拍戏（明星公司的方法刚好相反，先拍戏，后录音）。中国腊盘配音片，一共只拍过上述三片。

上海最早的一部片上发音的国产有声影片，是由华光片上有声电影公司拍摄的《雨过天青》。这家公司是由大中国影片公司职演员陈秋风、夏赤凤，暨南影片公司的黄槐生和片商谢世煌等组织起来的。成立时由黄槐生借债五万元作为拍片资金，开拍时通过上海同朋社（几个日本人组成的专门代人摄影、洗印的组织）日本摄影师川谷正平的介绍和日本东京发声映画社合作摄制。这时日本有声片也正处于萌芽时代。这家映画社是一个日本财阀创办的，向美国购置了全套有声片设备，但技术上还有问题，屡次试拍，声音时高时低，因之停拍，在停顿中，只有摄影师小谷仍在埋头研究。一九三一年三月，陈秋风

等到日本，小谷把自己新买的话筒拿来试用，效果比较理想，因之同小谷订立了二八拆账的合作合同，规定由发声映画社负责录音、摄影以及底片，并提供摄影场，由华光公司负责演员及其他一切费用。片成之后，适值中日邦交日趋恶化，双方商定取消原合同，由华光公司一次付给映画社摄制费七千元，了清手续。

上海最早用外国录音机摄制的片上发音的影片，乃是天一影片公司的《歌场春色》。摄制这部片子的有声机、灯光以及其他设备，都是向美国人许果租用的。许果对中国和南洋群岛一带游艺界都很熟悉，所有美国到东方来的歌舞团、马戏团都找他当经理人。天一公司的邵仁枚在新加坡设有戏院和游艺场，和许果认识，因之邵叫许果购置了全套拍摄有声片的设备租给天一公司，连同摄影师凯恩、录音师白立登和轧林等薪水在内，每月给许果一万元。《歌场春色》于一九三一年夏末秋初开拍，同年十月在光陆电影院（现曙光电影院）和南京大戏院（现上海音乐厅）放映。一九三二年，天一公司将全部设备都买了下来，并将美籍技术人员辞退，代之以本国人员。

明星公司于一九三一年夏，派洪深到美国买回了全套有声片拍摄机器及全部设备，同年十一月开拍片上发音的《旧时京华》。当时有家法商投资的汇众银公司，总经理是美国人，他兜上门自愿为明星代办汇款手续，并表示贷款如不够，可代做押汇。洪深买的是两部“米曲罗”摄影机，是由无声机改装的，拍片时声音很大，只好另外做了个能隔音的轿子式的大柜子，把摄影机放在柜子里，拍摄时抬来抬去，很不方便。另外还买

了一部录音机和几十只照明灯。

明星公司向美国购买了机器设备，并由美国人纳逊代请了摄影师贾克、司密斯，副摄影师威廉姆生，录音师爱圣柏，洗印技师伦特，连同纳逊共五人。纳逊是四个人的经纪人，他来上海不久就先回去了。明星同他们订合同时，说明要他们教会明星的摄影和录音人员，并派摄影师董克毅跟随司密斯学习打灯光，另派赵茂生、何兆璋、何兆璜等向录音师爱圣柏学习录音。爱圣柏十分狡猾，不肯好好地教。每次拍戏时，他把录音室关起来，接好线路，装好机器，才叫何兆璋等进去，拍完戏，又全部拆散，何等只好暗地里随时留意，自己摸索。到了“一·二八”事变之后，明星公司先辞退了司密斯、威廉姆生和伦特，后辞退了爱圣柏。辞退他们的原因一是外国技师是拿周薪的，而且薪金又是以美金计算。“九·一八”后，国民党政府货币贬值，美金不断上涨，明星公司经济困难，无力负担。二是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工作不负责任。例如司密斯拍戏时不准时到场，时常要派人到跳舞场、夜总会去找他。找来时又醉眼朦胧，不能工作。伦特也是一样。爱圣柏虽然好一点，但他蛮不讲理，叫人受不了。

这些美国人在技术上保密，不肯把技术教给中国人，有的还刁难捣乱。例如伦特是接片子的，他存心捣乱，不把片子接好。明星公司接片间工作人员只好摸索着自己解决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但是到了声带与画面合成工作时，画面与声音总是不能符合。接片子的黄生甫（现名黄汉），经过反复研究，找出了“十九格半”的声画合成秘诀，终于解决了问题。爱圣柏也心怀



鬼胎，每晚回家时，总把录音机主要部件拆下来带回家去，如果你辞退他，他就抓住这些部件，使你机器不能录音。明星公司察知了他的这个坏主意，在辞退他的那天，照常通知他来拍戏，等他把机器都装好了，拍过试验镜头，就叫他到办公室去，当场结清薪水，予以辞退，使他无技可施。

明星公司把美国技术人员全部辞退后，开拍《自由之花》，由赵茂生、何兆璋录音。美国技师问题虽然解决了，但又发生了汇众银公司的债务问题，汇众控告明星欠债，要扣押明星公司的全部机器。当时明星公司请了伍守恭律师出庭，后经调解，双方协议解决，止利分期还本。由此可见明星公司经历的许多艰难困苦，其他公司也有类似情况。

上海最早用国产录音机摄制的片上发音影片，是大东金狮影片公司的《春风杨柳》。在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间，上海有很多人研究自制录音机，大东金狮公司用竺清贤试制成功的“清贤式录音机”，摄制了《春风杨柳》，于一九三二年在北京影戏院上映。另有颜鹤鸣与苏祖国合制成功的“颜苏通”录音机，拍摄过《欲潮》。一九三四年间，电通影片公司用司徒逸民、马德建和龚毓珂三人合制成功的“三友式录音机”，摄制了《桃李劫》。以后，新华影片公司用的是“中华通”录音机，这是中华无线电公司经理陶逊伯和工程师金祥益合作制造成功的。还有邝赞和孙镜海也试制成功了录音机，他们都向香港发展，香港许多小电影公司采用了他们的产品。当时这些录音机的器材虽然都是外国货，但没有完整的图纸，大家东拼西凑，暗中摸索，试制成功，这种刻苦钻研的精神是值得称许的。

#### 四、上海最早的彩色影片

中国影片公司最初用灰白色制片，后来逐步用颜色制片。所谓颜色片，是单纯的一种颜色，有桔黄、粉红、蓝、绿等色，由导演选用。一般黄色多用桔黄，华丽房屋用粉红，郊外树木花草用绿色，夜景用蓝色。也可以套染一种颜色，如房间夜景粉红套染蓝色。但无论是单一颜色或套染另一种颜色，人物、衣服仍然是黑白色，与彩色片大不相同。慧冲公司的《水上英雄》，其中有几百尺彩色片，由人工着色，既费事费钱，又费时间，而成绩并不佳。明星公司曾与美国密面地公司接洽，用美国寄来的红绿两色原色彩片作试验。这种片子开拍时用两张底片合起来拍，副片两面都是药面（一般片子是一面药面），印时两张底片夹一张副片。其时中国还没有洗片机，洗片时要把片子浇在一块板上，并上滚筒。这种方法不能洗晒两面都是药面的片子，后来想出办法，用油木条挖一条槽，慢慢地拖着洗，并请百代公司暗房的一个白俄班道夫帮忙。《啼笑姻缘》中原定每一部有一本彩色片，约八九百尺，成本很贵，约每尺一元。当时，一个拷贝约九千尺左右，原来只要三百元上下，如果全部为彩色，一个拷贝就要九千多元，很不合算，所以《啼笑姻缘》的第一次拷贝有彩色片，以后就不用了。明星公司如此，其他公司更无人尝试。

以上所讲的彩色影片只是影片中部分有彩色。到了一九四八年，华艺影片公司才拍摄了第一部大型彩色戏曲长片《生死恨》。此片由梅兰芳和姜妙香主演，费穆导演，黄绍芬为摄影

指导，李生伟摄影。胶片是美国货，拍好后寄往美国印洗，但效果不够理想。接着费穆又导演了由李玉茹主演的第二部彩色舞台短片《小放牛》。此后彩色片就逐渐多起来了。

### **五、上海最早的中国录音师**

拍摄有声电影需要录音师，上海明星、天一两公司开始时都雇用美国人，但约定要他们教会中国录音人员。当时学习录音的人员，天一公司是邵醉翁的长子邵淮锷，明星公司是张石川的亲戚何兆璜、何兆璋、何懋刚、赵茂生，他们都是上海中学的学生，稍懂英语，很快学会了录音技术，并能独立拍戏。此后辞退了美国人，就由他们负责录音工作。

### **六、上海最早的摄影机和胶片**

上海最早的摄影机是手摇式的，摄影师要练好一手硬功夫，摇动时做到匀、稳、准，每次摇动，指针都要稳定在十六度上，不能左右晃动。摄影机是长方形的，只有一个镜头的地位，当时镜头只有三点五和四点五两种，可以掉换使用。这种摄影机是法国制造，由上海百代公司经理，胶片是二百尺一盒，四百尺一盒，后来才有一千尺一盒的。

### **七、上海最早的动画片**

大约在一九二九年前后，明星影片公司有个卡通（动画）部，由万籁鸣、万古蟾、万超尘、万涤寰四兄弟和二十多个学生组成摄制组，拍了一些动画短片。以后万氏兄弟又在别家公

司拍过一部长片《铁扇公主》。万氏兄弟是中国动画片的创始人，《铁扇公主》是上海最早的动画故事长片。

（姜 豪 整理）

# 旧上海电影业概貌

姜 豪 张 翼 姜星谷

## 一、上海电影事业的起源

上海是中国电影事业的发祥地，先有电影放映，后有电影摄制。上海第一次放映电影是在一八九六年八月十一日，地点在徐园内的“又一村”，此后连放数年。当时名为“西洋影戏”，内容都是西方国家的名胜古迹和舞蹈杂耍，后来出现了故事片。电影在那时是新鲜事物，颇能吸引观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上映的片子有法、美、德、英等国的出品，其中尤以法国百代公司和高蒙公司的片子居多。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影片开始称霸世界，上海的电影市场几被好莱坞影片独占，第一流电影院如卡尔登、大光明、南京、大华、国泰、兰心、大上海、美琪等，几乎都是放映好莱坞原版片的。

上海电影摄制事业，创始于意侨劳罗。他在中国从事电影放映业务发财后，于一九〇八年三月拍了第一部短片《上海第一辆电车行驶》。接着美侨宾杰门、布拉斯基于次年投资成立亚细亚影戏公司，在上海摄制了《西太后》和《不幸儿》两部短片。时当辛亥革命前夕，群众对这类影片不感兴趣，布拉斯基营业失败，乃于一九一二年把亚细亚公司名义及器材全部转让给另外两个美国人伊什尔和萨弗。一年以后，他们聘请美化洋行广

告部买办张石川为顾问，而张石川对电影摄制也无经验，就找戏剧界朋友郑正秋和另外两个朋友杜俊初和经营三合作，创办新民公司，承包亚细亚公司的编剧、导演、演员和拍摄等全部业务。第一部出品是《难夫难妻》，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郑正秋联合导演。

郑正秋完成《难夫难妻》后，脱离亚细亚公司，另组大中华新剧社，从事新剧工作。张石川继续在亚细亚公司拍了《活无常》、《二百五白相城隍庙》、《老少易妻》等十多部短片，内容低级趣味，滑稽胡闹。

亚细亚公司的胶片用德国货，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货源断绝，就此结束业务。此后美国胶片于一九一六年运来推销，张石川乃与新剧家管海峰合作，在徐家汇创办幻仙影片公司。当时新舞台上演的文明戏《黑籍冤魂》卖座持久不衰，他们就请原来的编剧许复民加以改编，拍成电影，张石川导演兼主要角色，著名京剧演员夏月珊、七盏灯、潘月樵主演，民鸣社的演员张利声、徐寒梅、查天影、洪警铃等参加演出。

一九一二年三月，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就任临时大总统，继之破坏民国，自行称帝，上海爆发了围攻高昌庙制造局和吴淞炮台湾的军事行动。当时倾向革命的戏剧工作者夏月润、夏月珊、潘月樵、洪警铃等都参加了战斗，并利用亚细亚公司，拍摄了《上海战争》新闻短片，记录了当时的战斗情况，于同年九月在新新舞台与《难夫难妻》同时放映，宣扬了上海人民革命斗争的英勇事迹。

## 二、商务印书馆兼营电影事业

上海商务印书馆由夏粹芳、张元济等在一八九七年创办，原为出版企业，其内部有个照相部，只是为了配合出版业务制版的需要。一九一七年开始，照相部兼拍电影。起因是当时有个美国商人带了资金和摄影器材来中国，准备创办电影摄制公司，但因人地生疏无法进行，刚好商务印书馆的交际科长谢秉来认识此人，于是商务印书馆就把这个美国人的摄影机、放映机、胶片和其他设备收买下来，所费不到三千元。初期拍过《盛杏蓀大出丧》、《美国红十字会上海大游行》、《商务印书馆放工》等新闻纪录片。一九一八年成立活动影戏部，聘请基督教会报刊编辑陈春生为主任，并调了印刷厂装订工任彭年为助手，调了照相部技工廖恩寿为摄影师，拍摄了一些风景、时事、教育等纪录片，如《南京名胜》、《普陀名胜》、《上海龙华》、《欧洲祝胜游行》、《女子体育观》、《盲童教育》、《养真幼稚园》等。一九二〇年，拍了梅兰芳导演兼主演的《春香闹学》和《天女散花》等京剧片。还拍过欧阳予倩编导、荀慧生主演的《桃花扇》等较好的短片。其后也拍了一些落后的文明戏和宣扬西方资产阶级意识的影片，如《憨大捉贼》、《呆婿祝寿》和《清虚梦》等。但从技术上讲，后者比前者有些进步，开始用特技，如人能走入墙壁和水缸破而复原等。

一九一九年，商务影戏部曾协助美国环球电影公司来华拍外景，并借给他们设备，后环球公司离沪时，把他们带来的大小数十盏炭精灯以及其他设备，全部转让给商务印书馆。于

是，活动影戏部改名为商务印书馆影片部。一九二〇年派人赴美采购了一批摄影器材，并自建玻璃棚，日夜可以拍片。商务除了自己拍片外，还出租场地和设备，代人拍片洗印；并购置外国短片出租，如《救主降生》、《埃及古迹》等。商务印书馆影片部资金雄厚，设备较为齐全，拍了不少影片，由于电影业务与出版业务性质不同，一九二六年影片部改组为国光影片公司，拍了《上海花》、《歌场奇缘》等几部片子，到一九二七年结束。

### 三、影片公司的纷纷成立

明星影片公司业务发展后，刺激了不少交易所投机失败者和其他投机商人，他们也纷纷开设电影制片公司。一九二五年前后，仅上海一地，就有一百四十家左右。其中大多数徒有虚名，自己并无设备，拍片时样样都要依靠他人。有的一部片子都没有拍过就消失了，有的甚至假借招收演员，骗取报名费和保证金。其中真正拍过片子的只有四十家左右。

继明星公司之后，天一公司也是较大的一家。该公司创立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创办人邵醉翁原在天津、宁波等地经商，失败后改业文明戏，成立和平剧社，看到电影业发展起来，又拿他的文明戏班底作为基础，改业电影。第一部影片是《立地成佛》，由高黎痕编剧，邵醉翁导演，吴素馨、高黎痕、傅秋声主演。第二部片子是《女侠李飞飞》。一九二六年间大小公司竞相拍摄社会片、伦理片和言情片时，天一公司却别出心裁地大拍古典、民间故事片，如《唐伯虎笑点秋香》、《梁祝哀史》、



《义妖白蛇传》、《珍珠塔》、《孟姜女》、《孙行者大战金钱豹》等，主演者有胡蝶、吴素馨、陈玉梅等。由于民间故事家喻户晓，影片卖座甚好，大小公司又一窝蜂地竞相拍古装片，邵醉翁更以元元公司和天生公司名义，独资拍摄了《宏碧缘》四集、《狸猫换太子》上下集、《西游记十殿阎王》、《五鼠闹东京》等片。

一九二四年冯镇欧设立了大中华影片公司，拍了由陆洁编剧，顾肯夫、陈青荫导演，王元龙、张织云、徐素娥主演的《人心》。还有由陆洁编剧，徐欣夫、陆洁导演，张织云、王元龙、黎明辉、胡蝶、汤杰主演的《战功》。此后因资金不足，与百合影片公司合并。百合影片公司是一九二四年由颜料商人吴性裁投资与上海影戏研究会负责人朱瘦菊合作开设的，拍过《采茶女》、《苦学生》、《前情》等片。一九二五年六月，百合影片公司与大中华影片公司合并，改组成为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

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成立后，由于人员思想不一，作风各异，其出品的风格也有不同。如一九二五年由王元龙编剧，陆洁导演，黎明辉、王元龙、邬丽珠、汤杰主演的《小厂主》，倾向欧化，由王元龙编剧，陆洁导演，黎明辉、王元龙、韩云珍、王次龙合演的《透明的上海》，则渲染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生活方式和男女之间的恋爱纠缠，由王悲儿编剧，朱瘦菊导演，王彩云、邢哈哈、王悲儿主演的《呆中福》，则充满了小市民的庸俗趣味；还有以揭发社会黑暗为名的《风雨之夜》，夹杂着不少色情表演，对社会产生恶劣影响。

史东山于一九二五年间，从上海影戏公司转入大中华百合公司。他参加过美术活动，倾向唯美主义。一九三一年“九·一

八”事变以后，他思想逐步转变，并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斗争。他在大中华百合公司的作品，有《同居之爱》、《王氏四侠》等片。

一九三〇年初，大中华百合公司和华北影片公司、新民影片公司、上海影戏公司合并，成立了联华影业公司。当年拍成《故都春梦》，由朱石麟、罗明佑编剧，孙瑜导演，林楚楚、阮玲玉、王瑞麟、刘继群、骆慧珠合演。接着拍《野草闲花》，由孙瑜编导，阮玲玉、金焰、刘继群主演。孙瑜曾留学美国，攻读电影戏剧，返国后即从事电影工作。联华公司还拍了其他一些片子，演员除上述诸人外，还有陈燕燕、王人美、汤天绣、章志直、郑君里、韩兰根等。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后，孙瑜受左翼运动影响，在党的电影工作者帮助下，创作了几部反映现实斗争的影片。如由他编导的《共赴国难》，是一部抗日故事片，由陈楚楚、王次龙、高占非、王人美、郑君里、金焰、周文珠等合演。

联华早期的片子，其内容有进步的，也有落后的。但它有个特点：从业人员中，大学生、留学生、话剧人员较多，不同于以前影片公司中以文明戏演员和鸳鸯蝴蝶派人物居多，所以当时联华公司被称为新派，而“明星”和“天一”则称为旧派。

此外，一九二四年成立的影片公司，还有长城画片公司，是留美华侨青年，为了抵制美国辱华影片而回国在上海创办的；民新影片公司，是从香港迁沪，由黎民伟主持的；以及爱美电影社，联合影片公司。一九二五年成立的，有神州影片公司，是留法归来的汪煦昌等合资经营的，拍过《不堪回首》、《花好月

圆》等片，编剧为陈醉云，导演为裘芑香，主要演员有李萍倩、万籟天、丁子明、严工上、黎明辉、赵静霞等。同年成立的，还有顾无为主办的大中国影片公司，陈铿然主办的友联影片公司和郎华影片公司、太平洋影片公司。一九二六年成立的，有张惠民主办的华剧影片公司，张炳生主办的快活林影片公司。一九二七年成立的，有黄槐生主办的暨南影片公司，汪福庆主办的大东影片公司、沪江影片公司、天生影片公司、元元影片公司。一九二八年成立的，有任彭年主办的月明影片公司和金龙影片公司。一九二九年成立的，有任锡藩主办的锡藩影片公司，杨小仲、洪警铃、陈翼青合办的昌明影片公司，以及大东金狮影片公司和孤星影片公司等。

#### 四、左翼电影的高潮

一九三三年二月九日，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在上海成立，选出了执行委员三十一人，其中有夏衍、田汉、洪深、郑正秋、袁耳、蔡楚生、史东山、孙瑜、金焰、张石川、唐槐秋、胡蝶、应云卫、沈西苓、程步高、周剑云、黎民伟、卜万苍、李萍倩、查瑞龙、姚苏凤等，他们都是在上海工作的。

一九三三年是左翼电影蓬勃发展的高潮时期，联华、明星、艺华、天一等影片公司拍了大量左翼和受左翼影响的优秀影片，如联华的《共赴国难》、《三个摩登女性》、《城市之夜》、《都会的早晨》；明星的《狂流》、《春蚕》、《上海二十四小时》；艺华的《民族生存》、《中国海的怒潮》、《肉搏》；天一的《挣扎》等。

从一九三二年下半年起，又陆续出现强华、快活林、快乐、

亨生等二十多家中小型影片公司。在左联电影运动的影响下，大多数的影片都能接触当时的实际生活。如月明公司拍摄的《恶邻》（由朱法西编剧，任彭年导演，邬丽珠、何非光、吴玲、张雨亭主演），是一部寓言式的抗日影片。拍成后上映，由于日寇无理抗议，被迫停映。一九三五年该公司又拍了《昏狂》（由李法西和任彭年编导，金山、邬丽珠、何非光主演），内容类似《恶邻》，也是宣传抗日的。

由于左翼电影运动取得显著成就，国民党反动派采取一系列的压制措施，加紧电影检查，甚至施加暴力。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上午，暴徒三十多人捣毁了艺华影片公司，同时查封了几家小公司。但进步影片还是不断出现。如蔡楚生导演，王人美、韩兰根、罗朋主演的《渔光曲》，阮玲玉主演的《新女性》，孙瑜编导，黎莉莉、金焰、张翼主演的《大路》等优秀影片，上映后受到广大观众的赞扬。艺华公司被捣毁后，到一九三四年六月恢复拍片，先后拍了由史东山编导，黎明辉、胡萍、黄耐霜、王乃东主演的《女人》，以及《人间仙子》、《黄金时代》等片。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七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下，欧阳予倩、蔡楚生、周剑云、孙瑜、费穆、李萍倩、孙师毅等发起，成立了上海电影界救国会。同年十一月，四十年代剧社演出，参加者有王莹、王献斋、尤光照、白璐、金山、梅熹、张翼、刘琼等。这次演出很成功，在文艺界和群众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提出了“国防电影”的口号，其产品有一九三六年联华公司的《狼山喋血记》（由沈浮、费穆编导，黎莉莉、张

翼、尚冠武、刘琼、白璐合演)。

一九三六年七月，明星公司进行了一次革新改组，扩大为两个厂。一厂以张石川、程步高、李萍倩等老人马为骨干，二厂由袁牧之、应云卫、陈波儿、贺绿汀、沈西苓、赵丹、白杨、吴茵等人组成，集中了进步力量，拍出了一些优秀的进步片子，如《生死同心》、《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一厂情况虽较复杂，但改组后也有进步。到一九三七年初，由于国民党当局采取种种手段，企图扼杀进步电影事业，二厂被并入一厂，但进步力量已有基础，所以还能继续保持斗争阵地。

张善琨主持的新华影业公司，开始时以进步姿态出现，取得了爱国力量的支持，一九三五年初，拍了汪仲贤编剧，杨小仲导演，共舞台全体演员参加演出的《红羊豪侠传》，上映时颇受欢迎。接着拍了由欧阳予倩编导，金焰、顾梦鹤、胡萍主演的《新桃花扇》，使新华公司名利双收，于是邀请更多的进步人士，准备大干，先由史东山编导《长恨歌》和《狂欢之夜》(王人美、梅熹、金山、周璇、胡萍等分别主演)；接着由吴永刚导演《壮志凌云》(金焰、王人美主演)，具有宣传巩固国防的意义；其后又拍了《夜半歌声》和《青年进行曲》。但上海成为孤岛后，张善琨附逆，成为电影界的汉奸，大拍腐朽落后影片，仅一九三八年就拍了十八部之多。

## 五、沦陷后的上海电影业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于七月二十八日成立。“八·一三”抗战开始，该会积极开展各种

救亡活动。上海沦陷后，电影界一批爱国人士奔赴内地，先到汉口，后转重庆，许多人参加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所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工作。当时周恩来同志任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同志任三厅厅长，所以“中制”拍了不少抗日新闻片和较好的故事片。当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办有中央电影制片厂(简称“中电”)，情况就不同，它是配合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工作的。

上海沦陷后，新华公司张善琨利用新片稀少的机会，拍了大量色情片、恐怖片，赚了不少钱，于是不少人跟着投机。同时日军当局也进行收买，企图控制孤岛影业，因此文艺工作者巴人、白羽、惺公、钟望阳、于伶等五十一人联合发表《告上海电影界书》，提出恳切忠告。

一九三九年二月，张善琨以华成影片公司名义，请欧阳予倩编剧，卜万苍导演，从香港请来女演员陈云裳与梅熹合作主演古装片《木兰从军》，内容具有借古喻今，鼓舞人心的意义，获得孤岛人民的赞同，所以很卖座，于是古装片又风行一时。同时日军当局办了“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控制孤岛各公司出品在沦陷区和伪满的发行权。当时古装片达到了高潮，张善琨的“新华”、“华成”、“华新”三公司拍有《玉蜻蜓》、《碧玉簪》、《珍珠塔》、《隋宫春色》等；艺华拍有《碧云宫》、《阎惜姣》、《三笑》等；国华拍有《董小宛》、《乱世英雄》、《风流天子》、《西厢记》等，甚至不同的公司还拍了同名的片子。还有一家新成立的民华公司，拍了由费穆导演，唐槐秋、张翼、慕容婉儿主演的《孔夫子》。

一九四〇年六月，原明星公司老板之一的周剑云与南洋影商合资创设金星影片公司，摄制了《李香君》、《花溅泪》、《乱世风光》等片，编导有周贻白、于伶、张石川、郑小秋、柯灵、吴仞之、吴村等，演员有顾兰君、白云、龚稼农、尤光照、胡枫、沈敏、舒适、慕容婉儿、吕玉坤、于素莲、张伐等。胡枫原在百乐门舞厅伴舞，在《花溅泪》中一举成名后，专业电影。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凶焰四射，上海更是暗无天日。一九四二年四月，原有“新华”、“艺华”、“国华”、“金星”等十二家影片公司被合并为伪“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即“中联”），由张善琨主持，从此上海电影事业全被日伪霸占。当“中联”成立时，爱国电影工作者柯灵、费穆等拒绝与敌伪合作，退出了影坛。更有许多爱国影人，历经艰险，投奔到大后方去。“中联”自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一年中，粗制滥造了五十部左右的色情、恐怖和滑稽片，如《恨不相逢未嫁时》、《芳华虚度》、《水性杨花》、《寒山夜雨》、《难兄难弟》等，还篡改巴金原作拍摄的《春》、《秋》等。

一九四三年五月，日伪把“中联”与上海影院公司合并，成立伪“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影”），进一步把制片、发行和放映三者一体化地控制起来。从此时起至日本投降止，“华影”共拍过约八十部影片，内容都是黄色反动的。其中《春江遗恨》是与“日本映画制作株式会社”合拍的，《万紫千红》是与日本“东宝歌舞团”合拍的。《春江遗恨》一片露骨地宣传了“大东亚共荣圈”的军国主义侵略谬论。

卖身投靠充当敌伪影片公司负责人的张善琨，原是上海南

洋大学学生，求学时夜间时常出来看戏(当时学生都住读)，为共舞台的京剧女角女叫天(童月娟)捧场，因此和她结合。其时共舞台老板黄楚九是女叫天的干爹，由于这个裙带关系，张善琨停学当上了共舞台的经理，此后更投靠了敌伪。但他在敌伪影片公司实际上是个傀儡，幕后操纵“华影”的是日本人七尾。此人原是一家日本电影放映机工厂的工程师，跟随日本侵略军来沪，在“华影”以顾问名义控制一切。

## 六、抗战胜利后的上海电影业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所属的中央电影制片厂(中电)接收“华影”，在上海设立了“中电”一厂和二厂，拍摄了《天字第一号》、《黑夜到天明》、《忠义之家》等吹捧国民党特务和宣扬色情、恐怖的影片。原属政治部后来改为国防部所属的“中制”，除了接收南京的敌伪产业外，也接收了上海“华影”的一小部分产业。

一九四八年，进步的电影工作者利用国民党所办和控制的影片厂，拍摄了一些进步的影片。如由“中电”二厂摄制，陈鲤庭编导，赵丹、秦怡主演的《遥远的爱》，徐昌霖编剧，汤晓丹导演，蓝马、路明、上官云珠主演的《天堂春梦》，“中电”一厂和二厂摄制的，由张骏祥编导，白杨、阳华主演的《还乡日记》，陈白尘原著，陈鲤庭编导，赵丹、黄宗英、张翼、顾而已主演的《幸福狂想曲》等。但这些影片，在放映之前已被检查裁剪过。



在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电在一九四七年四月，伪装为民营企业。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上半年之间，“中电”一厂和二厂又有一部分人员摄制了具有现实意义而尚有不足之处的影片，如由潘子农编导，黄宗英、张伐主演的《街头巷尾》；包蕾编剧，陈鲤庭导演，路明、严俊、项坤、汪漪主演的《三人行》；包蕾编剧，岳枫导演，卫禹平、罗兰、张鸿眉主演的《青山翠谷》等。

一九四六年前后，阳翰笙、蔡楚生、史东山等回到上海，会同郑君里、孟君谋等组织联华影艺社，租借前联华徐家汇厂址拍片，先后完成了史东山编导，白杨、陶金主演的《八千里路云和月》；蔡楚生、程君里编导，白杨、陶金、舒绣文、上官云珠主演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同时，文华、昆仑也都租用徐家汇摄影场拍片。一九四七年六月，联华公司与昆仑公司合并，用昆仑影片公司名义，陆续拍了由阳翰笙编剧，沈浮导演，蓝马、上官云珠主演的《万家灯火》，欧阳予倩编剧，王为一、徐韬导演，王人美、赵丹主演的《关不住的春光》，田汉、陈鲤庭编剧，陈鲤庭、赵明导演，赵丹、黄宗英、上官云珠、张翼主演的《丽人行》，沈浮编导，蓝马、上官云珠主演的《希望在人间》等优秀的进步影片。

苦干剧团是个进步组织，抗战期间坚持在上海恶劣环境中苦斗，抗战胜利后被迫解散，编导和演员黄佐临、桑弧、柯灵、张伐、丹尼、史原、韩非、韦伟、汪漪等参加了吴性裁创办的文华电影公司，拍过由桑弧编剧，黄佐临导演，李丽华、石挥主演的《假凤虚凰》；柯灵编剧，黄佐临导演，张伐、童芷苓、周

璇、石挥主演的《夜店》，曹禺编剧，李丽华、石挥、韩非主演的《艳阳天》和《小城之春》、《太太万岁》、《母亲》、《哀乐中年》等片，其中内容有进步的或较进步的。《假凤虚凰》原本是一部较好的讽刺喜剧片，揭露旧社会尔虞我诈的卑劣行为，但其中有三号理发师和七号理发师顶替冒充总经理和秘书的情节，引起理发师的抗议，而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一九四八年，艺华公司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大型彩色戏曲片《生死恨》（由费穆导演，黄绍芬指导摄影，李生伟摄影，梅兰芳、姜妙香主演）。接着又拍了由费穆导演，李玉茹主演的彩色舞台短片《小放牛》。同年十一月，又有清华公司拍了黄宗江编剧，丁力导演，蓝马、孙道临、石挥、吴茵、石羽、韦伟合演的《大团圆》；徐昌霖根据陈白尘的舞台剧《魔窟》改编导演，由蓝马、上官云珠、石羽主演的《群魔》。

一九四六年七月，国华公司改名为国泰影业公司，柳中浩、柳中亮分任总副经理。至一九四八年初，柳氏两兄弟分家经营。柳中浩仍主持国泰公司，柳中亮则另立大同影片公司。国泰公司既聘请田汉、于伶、应云卫、洪深等参加编导工作，又聘请国民党文化官僚张道藩、潘公展为正副董事长，并邀请屠光启、方沛霖参加制片。该公司面目模糊，只以营利为目的，既拍了由于伶编剧，应云卫导演，秦怡主演的《无名氏》和田汉编剧，应云卫导演，周璇、冯喆主演的《忆江南》等趋向进步的影片，又摄制了《粉红色炸弹》、《月里风高》、《假面女郎》等落后影片。至于大同公司出品的内容，大多数是特务间谍、凶杀恐怖、黄色爱情等等，如《蝴蝶梦》、《乱世的女性》等。但也拍了一些较

好的影片，如欧阳予倩编剧，洪深、郑正秋导演，舒适、舒绣文主演的《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吴纫之编剧，郑小秋导演，林默予、朱琳、高博主演的《几番风雨》，有的揭露当时上层社会的腐朽生活，有的批判社会上的畸形现象和资产阶级的各种丑态。可是从这两个公司负责人要弄的两面手法来说，电影中所批判的正好就是他们自己的丑恶行为，这种要弄两面手法的人，在当时电影界中，也不是个别的。

其他小公司的出品有四十部左右，内容大都不健康，甚至对社会有害。其中有家东亚影片公司是当时京剧名票友江一秋办的，其妻焦鸿英也是名票，拍了一部《美艳亲王》，由焦鸿英当主角，马徐维邦导演。

韩兰根是滑稽名演员，在新华从事演出和剧务工作多年，富有拍片经验，因之在一九四八年自办华光影片公司，首先拍了由他自导自演的《从军梦》（由张君勉编剧，华香琳担任主要女角。华香琳原来是汉口的京剧名票友，来沪后拍过好几部影片）。这家公司以后又拍过《海上英雄》、《年年如意》等片。

在小公司中，一九四七年成立的启明影业公司，虽然只拍了两部影片，但由于进步人士的帮助，内容都比较好。其中一部是故事片《鸡鸣早看天》，由洪深编剧，应云卫导演，董克毅摄影，袁雪芬、黄宗英、高博、汪漪、罗兰、张伐等合演。另一部是戏曲片《祥林嫂》，由南薇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并由南薇兼任导演，由袁雪芬、范瑞娟、徐天红、张桂凤、吴小楼、项彩莲等合演。

电影演员严俊、陈娟娟等于一九四八年间成立群星影片公

司，拍摄了《珠光宝气》，由包蕾编剧，唐绍华导演，陈娟娟、严俊、黄河、韩非、白光、王丹凤、项堃、陈天国、衣雪艳等合演。当时陈娟娟除以拍片报酬作为公司股金外，还拿出一笔美金作为资本，从而完成了这部片子的拍摄工作。

此外，外地公司与上海有密切关系的，有西北电影公司。抗战胜利后，张治中主持西北军政工作，为了促进民族团结，加强边疆和内地的联系，曾经组织新疆歌舞团来沪访问演出，轰动一时。又以上海作为西北影片公司活动的基地，一九四八年间，曾以台湾为背景，拍摄了《花莲港》，讲的是一个汉族青年与台湾高山族姑娘的恋爱故事。此片由唐绍华编剧，何非光导演。何非光原来是上海的老演员，抗战期间在重庆“中制”当导演，抗战胜利后主要在香港当导演，一度回上海为西北公司拍片。一九四八年五月，西北公司又拍摄了《天山之歌》。

# 爱国影剧家郑正秋

高黎痕

我早年从事影剧工作，与郑正秋熟识。现回忆他生平若干事，供研究我国影剧史的同志参考。

## 一、叛弃旧家庭，投身于戏剧界

郑正秋原名伯棠，别号药风，广东潮阳县人。生于一八八八年，歿于一九三五年，享年四十七岁。家世业商，清末，他父亲在上海西棋盘街开设郑洽记土行，贩卖鸦片。他对家庭不满意，不愿继承家业，因之另外选择了自己喜欢走的道路。

郑正秋青年时代就爱好剧艺，结识了进步艺人夏月珊、夏月润兄弟。此后以“正秋”笔名，在当时同盟会所办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等报发表以评京戏为主的“丽丽所谈戏”，一度担任《民言》戏剧报编辑，并在《民权报》、《中华民报》上开辟专栏，发表戏剧评论文章，还自办《图画时报》，力主改良旧戏，提倡新戏，认为戏剧是改革社会风气、教育大众的最好工具。

他为了研究新剧，集合同好，于一九一二年创立了“药风新剧社”。不久，就以“新民新剧社”的名义，正式演出于石路天仙茶园。从此他就以演戏为职业，并登报声明与家庭脱离关

系，把家产全部给他兄弟。在声明中他公开说：“我不当小开，要做戏子。”这两句话，表明他背弃旧家庭充当戏剧艺人的意志。在当时，当“戏子”不是高贵的职业，而且一般演员只想把戏演好，能场场满座，就可以名利双收，飞黄腾达。但他的做“戏子”不是为了名利，而是有他更高的意境，那就是扬善揭恶的爱国热情。

郑正秋在戏剧工作中是一个多面手，他不单能演，而且能编能导。由于他出身于一个旧家庭，对于旧家庭的黑暗体会特别深，所以他编演了不少揭露旧家庭黑暗的戏剧。他认为家庭是组成社会的细胞，各种不良家庭的存在，就会产生各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所以，为了要改造社会，首先要改造家庭。他编演过一出连台戏（连续剧），叫做《恶家庭》，一连演了好几本。剧情讲的是姑嫂不和，婆媳不睦，而结果吃苦头的总是媳妇。又编演过《尖嘴姑娘》和《恶婆婆》等，都是为受欺凌的妇女鸣不平的。

## 二、反对二十一条，编演《黄老大说梦》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想做皇帝，妄图得到日本的支持，不惜签订二十一条亡国条约，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激起了全国性的爱国运动。当时郑正秋正在汉口英租界汉口大舞台演戏，立即编了一个人表演的独幕剧《黄老大说梦》。他亲自扮演黄老大（影射中华民族），说唱了自己过去的光荣历史后，接着讲：“但是现在我衰老了一些，周围的强盗都来欺侮了，尤其东边的强盗极其凶恶，拿起大刀在我身上整整割了二十一条，条条都是

要我的老命的，我不能任人宰割，我恨死这些强盗，我一定要报仇，一定要赶走这些强盗。”他边唱边演，激起了观众的义愤，整个场子沸腾起来了。第二天，汉口的报纸都用大篇幅加以报导，普遍给予赞赏。

不久再度上演时，袁世凯的走狗汉口当局照会英国领事，要求英租界巡捕房禁演此剧。这天开幕前，戏院已经满座，一个捕头带了几个巡捕，到后台通知郑正秋不准演出《黄老大说梦》。他听到后，就走到前台，当众宣布说：“现在巡捕房来人通知我，不准演出《黄老大说梦》。但是我一定要演出，就是死在台上也要演，听凭捕房如何处理我好了。”他讲过后，全场观众都怒吼起来，积极支持他演出。他在全场观众的热烈鼓励下，演得特别精彩，群众的情绪也更激动，有的鼓掌叫好，有的高声怒吼，有的痛哭失声。捕头和巡捕觉得众怒难犯，只好悄悄地溜走。戏刚演完，观众深恐郑正秋被捕，一大批人自动集合到后台门口，前前后后地护卫他，一直把他送回家。第二天，各报评论都热烈赞扬他，同时武汉总商会也发表声明说：“如有人逮捕郑正秋，商店立即举行罢市，以示抗议。”当时卖国政府和帝国主义巡捕房慑于舆论威力，对郑奈何不得，因之未遭迫害。

第二天夜场，郑正秋又编演了一则哑剧《不可说》，只表演动作，不讲话，仍是抗日内容，只是把抗日词句写在纸条上，一条一条的展示给观众看。这样更得到观众的支持，条条博得雷鸣般的掌声，敬佩他不畏强暴的勇敢精神。在武汉各界抗议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大游行中，郑正秋率领剧团的全体人员去

参加，他仍扮演黄老大，头上顶着一座大山，跟着广大队伍一起游行。他身体本来瘦弱，这一天他精神振奋，始终坚持，边走边演，走完了全程，沿途群众随着他的表演怒呼反袁反日口号。

郑正秋多才多艺，进步戏剧家洪深对他有过正确的评价，说他在编、导、演方面有三种特长：（一）对于社会生活有丰富的体验，形形色式的情况，看得多，看得透，能透彻领会，分清是非。（二）能掌握观众心理，懂得讲什么话可以使观众同情，用什么表情能使观众感动，什么是观众所欢迎的，什么是观众所厌恶的。因此他所编导的戏剧能触动观众的心灵，讲出观众心里的话，指引观众向前看。（三）他有识别演员的能力，知己知彼，用人得当。谁适宜于当主角，谁适宜于当配角，谁有多少才能，能演多少戏，他都心中有数，因之量才录用，使得各尽所长。

### 三、创建国产电影事业，艰苦经营明星影片公司

上海电影事业始创于意大利影片商人劳罗。一九一七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始兼营电影业（一九二六年改组为国光影片公司）。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二年间，但杜宇、朱瘦菊等创设上海影片公司，张石川、郑正秋等创设明星影片公司，此后本国影片公司好似雨后春笋，先后增至几十家。

明星影片公司创办人是张石川、周剑云、郑正秋、任矜苹等，成立时张任总经理，周任经理，郑任协理。郑主张拍故事片，张主张拍滑稽片，因之先由郑编剧、张导演，拍摄了《卓



别林游华记》等三部滑稽片，但观众寥寥可数。后来又编了一部《张欣生》凶杀案件片，由于表演过火，当局不许上演。至此张的主张一再受挫，不得不依从郑的主张，改拍故事片。

明星影片公司拍摄故事片，首先由郑正秋编了一部家庭伦理片《孤儿救祖记》，由张石川导演，王汉伦、杨耐梅、郑正秋、王献斋联合主演。但其时明星公司的经济已经十分困难，以前还有能力租借别人的场地拍戏，而此时无力租借，只好在郑住所马霍路崇仁里后面的一块空地上拍戏。所用布景道具，全部堆放在郑家(单幢石库门房子)楼下，这样因陋就简，非常艰苦地拍完片子。

片子拍好了，上演又成了问题。当时在热闹地区的电影院，只有爱普庐、卡尔登、恩派亚等几家，都是外国人开设的，同外国影片公司订有合同，专门放映外国影片。同时他们看不起中国片子，为了本身利益，怕担风险，也不愿意放映中国片。只有虹口虬江路北四川路口的上海影戏院，是广东人曾焕堂开设的，郑正秋同曾焕堂都是广东潮阳人，由于同乡情谊，先借该院试映，试片后认为情节很动人，于是就在该院正式上映，结果大受观众欢迎，舆论界也加以赞赏，天天满座。运到外埠放映，也是满座，尤其在南洋一带，受到华侨热情欢迎。于是南洋片商来沪与明星公司签订购片合同，从此该公司就兴旺发达起来。

《孤儿救祖记》不但救活了明星影片公司，而且为它开辟了南洋新市场，为此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明星公司经济上宽裕了，就在白尔部路租地建起了摄影棚，购置了灯光设备。一九

二六年扩充为三个导演组，分别由张石川、郑正秋、卜万苍担任导演。一九二八年，明星公司迁到杜美路，建筑了两个摄影棚。一九三四年又在枫林桥买地建厂，成为当时上海规模最大、名声最响的影片公司。所有这些成就，大部分是出于郑正秋的努力。

总结郑正秋的一生，从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二年间，以从事新剧为主，此后转而从事电影事业，集中精力于明星影片公司的经营，直至一九三五年逝世。从一九二二年开拍《孤儿救祖记》起，到一九三四年的《再生花》止，他在明星公司先后编写了四十五个剧本，其中自编自导的影片有二十部。他积累了十多年编、导、演的实践经验，深知观众心理，所以他所编、导、演的影片，都能深入人心。尤其是一九三三年他编、导的《姊妹花》，连演两个月，场场客满，创造了当时中外影片卖座最高的记录。郑正秋待人和蔼可亲，从不疾言厉色，特别是他具有一股爱国热忱，凡遇危害国家的大事，必挺身而出，忘我奔走，毫无顾虑，不愧是一个被人称道的爱国影剧家。

#### **四、教子有方，小秋继承父业**

郑正秋有三子一女，子小秋、二秋、三秋，女又秋。三秋早死，二秋是电影摄影师，在“四人帮”横行时被迫害而死。小秋幼承庭训，热爱电影，十一岁时就参加拍摄《孤儿救祖记》，此后一直在明星影片公司及其他公司工作。

郑小秋一直在电影界工作，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在演员中资格最老，拍片最多，从事电影事业最长。一九二一年至一

九二二年间，上海只有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上海影片公司和明星影片公司三家，商务电影部拍摄《呆婿祝寿》，演员是丁元一、包桂荣、洪警铃等；上海影片公司拍摄《海誓》，演员是殷明珠、陈宝琦、贺蓉珠等；明星影片公司拍摄《孤儿救祖记》，演员是郑鹧鸪、王汉伦、郑小秋、王献斋等。这些人现在大多不在人世了，和他们在同一时期拍片的人，只有郑小秋了。小秋从一九二二年拍《孤儿救祖记》起，至一九三四年拍《再生花》止，总共主演了七十五部片子。

郑小秋为人忠厚，生活简朴，很象他父亲。明星影片公司在“八·一三”抗日战争中枫林桥摄影棚被烧毁以前，由张石川、周剑云把公司的摄影器材和胶片等抢运出来，各取一半，另立公司。按理明星公司的财产应有郑正秋的一份，正秋虽死，应归小秋继承，但张、周两人不分给小秋，小秋也不以为意。当明星公司最发达时期，公司三巨头除郑以外，其他两人都有私人小包车，独郑正秋没有自备汽车，每次到公司都打电话给公司刷务组，由公司派车接送。周剑云几次劝他买车，他都不买，可见他生活的朴素。小秋既继承了他父亲毕生为中国电影事业献身的精神，也继承了他父亲生活上朴素的美德。

（姜 豪、王 端、姚吉光 整理）

## 上海昆曲集社源流简史

平襟亚

昆曲是我国古老的剧种之一。回顾清末到解放前夕的四十年间，昆剧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有鸿福班、宝和班和全福班，他们依靠流浪江湖，鬻艺支持生活；中期是传字辈的艺人，尚未脱离裸母；后期，经过传字辈艺人共同努力，保持了这个剧种。在这三个时期中，以中期最为艰苦，且岌岌可危。以上海而言，幸赖几个昆曲社相继提倡，负担起这个重任，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或多或少付出过相当的代价。现今昆曲界后辈，对上海昆曲集社的组织历史已很少了解，以下一段史料是前辈昆曲家嘉兴庄一笏所口述，特此录之。

上海有昆曲社的组织，远在道光初年(约一八三〇年)，但年远时迁，文献很少著录，只知道最早的“赓扬集”，大约成立于道光初年。它的主体为松江、苏州局首，社员有张云卿、王柳桥及金蓉江父子等，但未可确认为上海集社之始创。

上海曲集之滥觞，在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年)间，也只知有局首姜三爷(集名已逸)，社友有张子祥、顾霭堂、童笏卿、何桂生(即高昌寒食生)等辈，可说是真正上海昆曲社的开始，假定名之为“姜局”。

此后有“怡怡集”，成立于咸丰初年(约一八五一年)，社友

有王拙如、姚澹人、舒春圃、邓顺之、韩莘卿等。在同治年间(约一八六二年),上海有“聚芳”、“集贤”两局,里面都是一些纨绔子弟。他们竞尚豪奢,和真心研究昆曲艺术的曲社不同。及至光绪初年(约一八八〇年),成立了“钧和集”,社址在城内南市,社友有陈柳溪、钟子能、童怀之、李星圃等。以上集社坚持到光绪中叶,零落殆尽。

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继起的有“清扬社”,在邑庙飞丹阁(九曲桥荷心亭对面),社友有徐小仓、沈兰叙、郭少泉、周少屏等,都是上海当时的知名之士。同时有“箫红”、“二弥”、“拍红”、“旷音”、“咏和”、“挹清”、“瓣和”、“鸣盛”等许多曲社相继成立。其他如“霓尚曲社”,在云南路,“吉云曲社”,在城内棉业公所吉云堂,“振声曲社”,在台湾路,“钧升曲社”,在日升茶楼。还有“嚶求”、“倚云”、“赓和”、“粟卢”(以俞粟卢为名,俞粟卢系俞振飞之父)、“青社”、“夏声”、“风社”(社中多女曲友)等,因时代距今较近,社中诸老现有健在者(嚶求以后诸社大都成立于光绪三十三年以后)。当时度曲者如胡瑞棠、赵鉴湖、王三省、俞粟卢、陆霏堂、王伯年、包剑秋等,堪称为昆曲艺术一时泰斗。当然到现在已是云烟过眼,当作掌故谈了。到后来有“赓春曲社”和“平声曲社”。“赓春曲社”曲友会唱很少间断,后由徐凌云主持,徐氏一门三杰(他的儿子子权、韶九均通曲艺),对昆曲艺术作了很多贡献。其后有穆藕初创办了昆曲传习所,徐凌云亦担任过指导。当传习所艺人们初次搬演时,“赓春曲社”及个别社友曾赠与戏衣、戏箱,很重视栽培第二代昆曲艺人,期望青年艺人能发扬光大。“平声曲

社”成立于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社友以上海本地人居多数，由陈奎棠、郁炳臣、唐秉照等共同组织，该社有个特点，除每月同期合唱之外，都能够袍笏登场，演出时却又绝对不用班底，什么都能自己包办。这原因是由于老艺人陈凤鸣先生数十年如一日悉心教授后进所致。陈氏是“聚福班”中素负盛名的扇子生，也是昆曲艺术中最精湛的一个典型人物。此外如丁兰荪、陆寿卿、沈盘生等，都是该社踏戏（学习排演）的老艺人。陈氏直到去世（一九四三年）始终不离平声曲社，他为艺术而奉献其毕生心力，值得后来称道。因此，在上海谈昆曲艺术的有北“赧春”、南“平声”之誉。这两个社在三四十年过程中对昆曲是起着奖掖作用的。其他组织较晚的有“润鸿社”，诞生于一九一四年，王慕诘、杨成庵等为社员，社址在南市群学会。又有“同声社”，成立于一九二八年，社员有管际安、张余荪等，专重彩排，往往参加赈灾戏义演。又有“啸社”，成立于一九二九年，社员有吴翼安、居逸鸿等，它的特点是专研究音律曲调，多唱创新曲本。其他昆曲团体俱乐部的组织有“银联”、“上银”、“海关”等，大都是业余研究曲艺，由京剧改习昆曲。最后还有个“嘘社”（其名甚怪），成立于一九四〇年，内女社员居多，有如辛亥以前的“风社”。解放后的上海昆曲研习所，是一九五七年正式成立的。百余年来昆曲集社的沿革，是上海戏剧历史的一环，庄一笏老先生是昆曲家前辈，他举出以上历史，是信而可徵的，特录其概况，以供参考。

附记：上稿经徐凌云、赵景深两先生过目。

# 上海戏园琐话

王仲钧 胡仲龄

## 一

上海的戏园最初设在城内，仅演昆曲。京戏风行后，戏园纷纷开张，并发展到租界。

余等幼年观剧，在当时法租界小东门外沿城河边的三家戏园，其中一是“丹凤”，一是“月桂”，这两家都演京戏，新北门外吉祥街有“宝丰园”，系徽班，后改名“宝兴”。在英租界之宝善街及石路一带，“丹桂”与“金桂”皆为高等京戏班，满庭芳街曾开“三雅园”文班，一洞天有“久乐园”小班。在清同治年间，丹凤、月桂两戏园生意清淡，时演时停。后丹桂和三雅园营业兴盛，分设“南丹桂”、“南三雅”于小东门，即丹凤、月桂旧址。金桂管坐亦佳，另有“宝丰”、“久乐”，均小戏园，开支省，亦皆获利。

当时各戏园价格不一，坐位亦不相同，票价昂者正厅包厢每位售七八角，廉者四五角，起码则青蚨百文或数十文。宝丰与久乐两小戏园，其池子并无坐位，皆系立听，日戏每人三十文，夜戏四十文。有正厅者，设于楼上，日戏每人二百文，夜戏二百八十文，楼厢日戏一百二十文，夜戏一百八十文，日戏较夜戏低廉。正厅占正中一方，自戏台起约五六排，每排设小方桌

五六只，每桌配交椅五把，两椅分置两旁，余三把一字连排，包桌者即以五客计算。稍后之处及正厅左右，另设狭长小木几，置椅其后，称为边厢，价照正厅打八折。楼上包厢以间计，房屋略大者每间十坐，小者八坐。正中亦排列方桌作为正厅，后面为正厢，售价一律。坐位后尚有余地，设骨牌凳数张，以便仆从服侍主人观剧，不另收资。楼下左、右、中三面之边厅，各围以三尺许之短栏，使与正厅隔开，其后再隔以短木板，则为起码坐位。客至一律不取茶资，正厅、包厢皆用白瓜楞有盖茶碗，边厢之碗无盖，以资区别。客若约妓女同游，妓女所用茶碗系绿色，示与家庭妇女有别，戏资则须加两角。如请洋人，亦须加资两角，茶碗则同为白瓜楞无异。正厅各桌上，置有六碟，四碟瓜子，一碟廉价水果，一碟云片糕，仅四五片。戏演到中场后，送上点心一道，春冬为桂花核桃圆，夏秋是绿豆汤或百合汤，然皆不堪入口，客亦鲜有食之者。此清同治、光绪年间售坐之大概也。

清光绪中季后，各戏园营业日盛，因在戏台上添设坐位，装置七八寸阔之木板一条，置茶碗，后列木椅，谓之“添凳”，价与正厅相同。同时，将正厅左、右、中之边厢撤去，以木板铺之使高，概设一小方桌，作为正厅，售价与前排相同，桌上之果碟不复陈列。

彼时小东门已无戏园，吉祥街宝丰园小戏馆及一洞天久乐园小班早已淘汰，戏园都在宝美街满庭芳石路一带，均演京剧，昆班则屡演屡辍，大有不能复振之势。既而各园边厢亦皆清淡，后排坐位乃以木板搭高，置椅，外装木栏，栏上设一木板，置



茶壶什物，于是包一全厢，仅只十人，他人不能入栏，后来则非连前带后全包不可。演戏至中场时，照例送不堪入口之桂花核桃圆一类点心，后来各园皆废去此种习惯，但到年终，案目于每一熟客桌上备水饺与烧卖供应，且在正厅包厢各装干点果碟，以索犒赏(俗呼为打野鸡)。若在平日，案目遇熟客看戏，也装果碟索犒，然亦有不愿给赏，令其撤去者。

戏园有客入坐，彼时并无戏票，正厅包厢边厢之客，由案目引导而入，以茶碗为标志，有一茶碗即须一客戏资，由经手之案目报告大小水牌落账。管理大小水牌者楼上下各有一人，置一大粉牌于桌上，先书各案目之名，有一客至，案目送坐后即记一划，满五客则书成一正字，以正字为五笔，符五客之数，结账时，极易计算。彼时小孩十岁上下不收戏资，亦无半价，须至十五六岁始作全客算。舆夫、车马夫、仆从概不收资。

戏园看门者，以天津人为多，大都孔武有力，负责阻止看白戏者闯入，兼管观客不得自由越坐，且有权稽查案目匿报客数。案目若与争执，彼可查点茶碗，有茶碗必有看客，故当时茶碗甚为郑重。茶房绞送手巾，各看客照例须给零钱，其数并不一定，各听客便。彼时尚无铜板，只有角洋与小青铜钱，大约正厅包厢每人三四十文，边厢二十文，起码十文，每有争多较少，以致大声喧嚷者。茶则一泡之后，开水亦不再来，来亦半沸之水，不敢下咽。每值新年，或新园开演、新角登台之夕，必加添骨牌凳无数，纵横满布，使观客举步为难。当时并无良好消防设备，若有事故发生，真是不堪设想。

## 二

最初邀京班南下者，系石叻（音石力）人罗逸卿，隶属英籍，寄居上海，行四，人称罗四虎。太平天国起义后，苏杭各地乡绅官吏纷纷避战于上海。上海系通商口岸，租界可以安全无事，逃难者皆集居于此。罗以身入英籍作护符，遂在工部局缴纳捐税，于西棋盘街金隆里公开设立赌窟，当时因赌而倾家荡产者不知几何。缘此抢劫掠夺之事，日甚一日。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清政府为粉饰太平，劝工部局严禁赌博，罗四虎数年来囊中饱满，自知此种营生亦不久长，遂以余资在宝善街、南清远街、北横街建造戏园，一切按照北京戏园式样，又派专人到天津邀聘京班演员，并制全新行头。戏园落成后取名“满庭芳”，为上海最初私人开设较完善之戏园。第二年开张营业，楼上下每位票价一元，该班到沪演出后，上海人大为惊讶，营业情况空前。其实所邀之演员，皆为默默无闻的角色，全班包银犹不及后来谭鑫培一人之收入，这是京班到沪的开端。

首次获利，不少人为之心动。有刘维忠者，宁波人，昔日曾因私运军火资助太平军，为清朝官员刘松岩获悉，下令逮捕。维忠闻讯，潜逃他乡，托泉塘遗老陈艾白向刘松岩缓颊，不获所请。适有应敏参新任上海道，陈又单独为之说情，应恐触怒刘松岩，惟允姑不紧缉，暂缓其事。事隔多年，刘维忠潜回上海，捕缉之令已不如当时严厉，又托陈艾白向当道疏通，遂得完案。于是刘维忠又遨游在上海租界，积资甚巨，见罗逸卿开满庭芳获利甚厚，跃跃欲试。他潜逃藏匿在北京时，常与三庆

班的京剧名角往来，认为罗办戏园所邀角色皆为下驷之材，居然营业鼎盛，自己若创办戏园，所邀角色定比他强。这时乃出巨资，租宝善街适中空地，订期二十年，按照北京戏园之规模及式样，建造戏馆。落成后取名“丹桂”，与“满庭芳”戏园竞争。同时派人去广东采购绣工精细的行头，定制银鼠出锋的长靠（从前粤剧班中有此装束）。自己亲去北京邀请名角，被邀者有铜髻子刘某、夏奎章（月恒、月珊、月润之父）、熊金桂（文通之父）、周长春、周长山、景四宝，后又邀架子花脸董三雄、宁大吉，武生胖羊儿，开口跳棚匠张三，青衣王桂芳（荣祥之父），老旦冯双喜（子和父），尚有老旦周某、何某（名已忘记），花脸疤瘡王（永利之父）、大奎官等。以上角色邀妥后，次年皆联袂而至，场面也是北京带来，打鼓佬程章圃（长庚之子）、李奎山亦属名手，其余已不记得了。开台楼上下佳坐一律八角，包厢售六角，余下散坐，价目较廉。因属北京名角，备受群众欢迎，盛况空前，从此，北京名角不绝南下，京剧在上海开始盛行。

### 三

从前，上海旧式戏台大都是方形的，台上左右两个门帘，分上场门、下场门。台中间是场面打鼓的座位，前面俗称“九龙口”。自灯彩戏开始，场面则摆在下场门台口，台前挂上布幕，伶人扮演各种神仙，多站在凳上，或坐在地上，手中拿着彩灯，这就是灯彩戏。戏有“大香山”、“游十殿”、“白雀寺”等等。并有以色彩绘画之洋布或洋纱布景，大香山有山水景，游

十殿有油锅、刀山、十殿阎王景，白雀寺有火彩景致，演至大火烧时，在台上夹层由检场人连放彩火（即松香粉火，检场人放松香有特殊艺术，现已失传），台上将夹层之彩棚翻下来，变成火焰冲天，以博观众叫好。后来石路天仙茶园在元宵上灯时，全体演员排演“洛阳桥”，有点金石、采莲船、宝藏库、水晶宫等等灯彩制作，较以前精致。如采莲船能在台上行动，水晶宫纯用玻璃片制成，反光闪耀，观之令人目眩眼花；还有果子幡电灯、明暗九莲灯、八仙手提灯，等等，以及三十六行彩灯，哄动一时，坐客常满。后来丹桂茶园园主想九霄（即田际云）亦排“斗牛宫”灯彩戏，天仪园排“风莲山”，大观花园排“福寿山”，天仙茶园又排“碧游潭”、“一本万利”等灯彩戏。各园勾心斗角，为灯彩戏的黄金时代。

清宣统初年，老伶工潘月樵（即小连生）及夏月珊、夏月润昆仲与沪南绅士等，在南市十六铺创办新舞台，这是新式舞台的开始。一切建筑装置多欧化，首先装布景，设计绘画者由画家张聿光任之，有硬片、软片、附片种种。软片即挂片，备有亭台殿阁、山林瀑布、园圃池塘、书斋绣阁等画片，按戏中情节挂之。硬片镶以木框。临时设备附片，附放在左右两面，以遮蔽后台。新建之舞台顶高三丈余，以便悬挂一切软片，临时放下应用，不用时仍拽放原处。顶部上空建一木桥，称“天桥”，遇演雪景等剧，剪纸作雪片，由桥上散下，形似落下真雪。台心下层挖成地窖，用以盛水，凡演水景等戏，旁设有自来水龙头，开放时，真水滔滔不绝，观众颇感兴趣。窖中无水时，人可行走，如演侠客等剧，演员可由地窖内上升。新舞台并有转

台设备，台中心可以转动。有些戏，前半台为厅堂，背半台为房间，或上半台演的是郊外，后半台则是村镇，演出时不须闭幕，只须电灯一关，打一个四记头(锣)，台即旋转。有些观众觉得新奇，甚为赞赏，若演神仙鬼怪等剧，则台上更可发挥。随后各舞台皆仿效之。但当时尚无电机设备，单凭人力，转台不灵活，不久皆弃而不用，改从布景上找窍门，彼此竞赛，花样日新月异，舞台布景逐渐进步和提高。

二马路新新舞台(即后来的天蟾舞台)首创舞台背景中有风、云、雷、雨、日月、星辰，其机件从日本采购而来，操作者雇用日人，名坪田虎太郎，调度一切事宜，并以施某赵某两人辅助。第一日演“御碑亭”，遇雨一场，风声、雷声、片云、雨丝、日月星辰各景俱有出现，闪烁有光，可于幕上升降，观众觉得新鲜有趣，叹为奇观。后该台施、赵两人努力钻研，将操作法学会，机件损坏时也能修理，乃将日人辞退。后来，各舞台都有了机关布景，人们称之为“魔术化”，如借用镁光，于一刹那将全台背景一律易去，更换一台别的背景，仿佛象魔术一样。又如变服易容，老变少，少变老，全在化装敏捷，转移迅速。又如空中来去、空中舞蹈，一切全靠铅丝及活葫芦作用；山崩桥坍，全赖机关玲珑；火景纯恃火酒与红色电光；水景则绘出水彩画轴，下有活动轴，一经旋转，如波浪汹涌。

从前各戏园雇用的茶房，因泡茶不取茶资，又无额外进益，故园主不收押柜金，按人发给工资。领坐者(即后来之案目)工资较厚，送茶者次一等，打杂者更次之。园中备有红纸请客单，又有招妓女来观剧的局票，由观客写就后，打杂者按地址前往

邀请，按请客单路程之远近，再向主人略索车资。邀一妓女则每位请客费六十三文，由妓女在月底结算付给。自十六铺新舞台开设后，废除此种旧习惯，改用新办法，泡一碗茶收费一角。于是茶房乃付押柜金，并穿有号码之号衣，小账一律不收，请客票、局票皆废除，妓女和客人一同前来，不另收费。亦无起码坐、边厢名称，改为特、二、三等。各戏园之名称渐渐改为某某舞台，都以新舞台为模范，这是上海戏园革新之始。后来小账又恢复旧观，然不经茶房之手，乃刊茶资价目于戏单上，一律由案目带收，以免勒索讨厌，二、三等座位则于购票时带收。但茶房生财有道，凡定坐之观客，泡茶则以玻璃杯送进，以示特殊，于是一角之茶价，改为两角。园主窥知其弊，每壶亦收两角，若辈又别开生面，特加花露水毛巾，以博赏资，且备有搁脚小木凳，备女宾们之需。于是泡茶者，有给四角、六角、八角者不等。除充阔气、讲排场的顾客外，十之八九的观众都对之讨厌。

戏园改建舞台后，房屋坚固，空气畅通，卫生设备齐全。当时救火会限制售票甚严，走路口一律不准排坐，以防意外，黑暗中但送点贿赂，即可通融。戏台放大，改为半月式，台前装上一排电灯，照耀甚亮，一扫旧时茶楼形式。楼上下座位亦有改变，座位愈远愈高。大的戏院可容观众两三千人，小的亦可容千多人，且设有太平门多处，散戏时，一齐开放，四通八达，通行无阻，便利非常。

#### 四

当时“案目”两字，是外界一般名称。他们自己对外的名称叫做“接业”，同行中称为“办戏单”。他们有一个组织，附属在梨园公所。每一案目都要缴付一笔押柜金，由案目头子统办，照大小股分担。一个案目可以在两家戏园兼职，只要派一位代表去顶自己名字，执行此项工作，所得佣金与园主三五天一结账。熟客、富豪、客帮<sup>①</sup>看戏，一律记账，月底结账收款。昔日戏园并不靠广告招揽生意，案目象忠实掮客一样，每次有新角色登台或排演新戏，案目们就向熟客兜揽生意，只要送一张戏单到客帮或大公馆中，再作口头宣传，即能获得效果。每逢新角儿打泡，或新戏上演，案目中有特别能力者，往往预先定下若干好坐，个中人谓之“拍”，以便在老主顾未定坐或临时来看戏时，讨好熟客。同行中人亦可以向他情商，互相移借。所以有经验的案目，手下有大帮熟客，看机行事，可以不担风险，不吃赔账。案目除佣金收入外，尚有以水果、干点享客，博取赏金。所以他们家庭生活甚为阔绰，不象一般劳动人民清苦。但他们在执行职务时，因当时阶级地位低下，不能着上流人物的长衫马褂，只能穿对襟马夹(背心)。一年之中案目最大的希望，就是年终拉局，唱戏的叫“搭桌”，上海同行中称为“打野鸡”，象演反串戏及四位名角合唱一戏等等，全看案目的手腕，对象多是上海大富商、洋行买办、客帮商人等，因此一次打野鸡，

---

<sup>①</sup> 外地有势力者在上海设字号做买卖的商人。

利润十分可观，可以过一个快活年。

从前旧式戏园，每家大门上悬挂名角的牌子，上面写着“特请北京内廷供奉”、“超等名角”、“某某派正宗”，还有特请山西、陕西秦腔须生、青衣、花旦等，名字前面都有一个头衔。另一面则挂上水牌，写出当日与翌日戏目。牌子和海报一样大小，挂在大门两旁，以吸引观众。进大门便是院子，两旁设有专做园内生意的水果摊，供给场内托盘做生意及案目享客装碟子之用。开锣之前，全班案目都侍候在门口，各人手拿一卷戏单，戏单上盖上各人的别名（如顺发、招财、财福等），以便外路来客招呼，招揽下次生意。他们做生意，并不你抢我夺，亦不乱拉，态度甚好，听客人呼名，则上前招待入坐。如所喊案目不在场，则由别的案目代之，但这笔生意仍归熟案目所得。凡新角到上海，在登台之前几天，由案目领往有势力的官商富豪家拜客，其中山西帮票号最占面子，因为当时上海捧角儿都由客帮开始，他们仗有钱有势，自以为是上等人物。假使新角儿不去拜客，便认为是看不起他们，就仗势作难，使用种种手段来欺压艺人，所以当时艺人，因社会环境恶劣，只能忍气吞声。

以上所记，都是四十年前戏园情况，读者看后可以体会到四十年间梨园演变和解放后这方面的飞跃进步。

（祝文光 整理）



## 沪剧的起源

葛荫梧

沪剧原是流传民间很久的花鼓戏，后来改为申曲。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出版的《上海繁华小志》中的《花鼓》一诗云：“杨月楼中集女仙，娇音唱出《小珠天》。听来最是销魂处，笑唤冤家合枕眠。”诗中所称《小珠天》，系申曲剧目之一，至今尚在演唱，即此亦可证明申曲就是旧日的花鼓戏。

申曲亦称东乡调，东乡是指浦东一带地方，东乡调便是浦东调。申曲剧目《卖红菱》中所谓“吃子三口黄浦水，掰拉掰拉有点硬舌头”，这两句就是浦东调，中多鼻音。

申曲又称本滩，本滩即本地滩簧之简称，也就是上海滩簧。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由施兰亭、邵文滨、胡雪昌等发起振新集，把本滩改名为申曲。后来几经改进扩大，至抗战以后，改称沪剧，他们的组织成为代表地方性的剧团。

花鼓戏究竟起源于什么时候，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传说起于唐宋，未免估计得过早，有待于从文献中搜寻根据。清乾嘉时代，青浦人诸联有《明垒小识》一书，其中有一条是记花鼓戏的。书中说花鼓戏流传不到三十年而变者屡矣。就其书中别条所记年月推算，花鼓戏的产生当在乾隆四十年前后。就申曲剧本本身研究，如前述花鼓戏诗中所说的《小珠天》即系乾隆

时代的故事，其中时时提到马剑大洋钱(西班牙银币)。南汇人杨光辅所著《淞沪南乐府》中，也提到花鼓戏。从这些方面考究起来，说花鼓戏起于乾隆中叶，大致不会错。

花鼓戏是从乡间发生，而后逐渐流入市镇的。最初是在白天表演，后来改在夜间演。最初是由男子扮演，后来女子也参加。这些演变，还只是花鼓戏创始未滿三十年中的变化。

花鼓戏所用的乐器，据《淞沪南乐府》中记述，即男敲锣，女打两头鼓，和以胡琴、笛、板。后来除两头鼓改用普通鼓外，其他乐器至今未变。

过去士大夫阶级一致认为花鼓戏是海淫的东西。但广大群众却极爱好。《淞沪南乐府》中说：“花鼓演戏必以夜，邻村男女键户往观。”可见乾嘉时候就已为广大群众所爱好了。那时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杨光辅也说：“(一)所唱皆淫秽之词；(二)宾白亦用土语；(三)村愚亦能通晓。”后两者正是沪剧得以在民间长期流传的特点。

在封建社会中，花鼓戏既被认为淫秽，所以常被禁止，但是禁者自禁，唱者自唱，终于保存不绝。有识者也觉得禁止演唱是消极的办法，只有把它改良才是积极的办法。所以在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吴馨做上海县知事时，曾委李琦为上海县通俗教育事务所主任，组织通俗宣讲团，其是就有“改良花鼓”一项。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唱花鼓戏的一班领袖人物发起组织振新集，把花鼓戏改名为申曲。但那时名义上虽说改良，事实上也没有多大改变。后来终于得到了两个很好的办法，一是互相团结，办半日学校；二是将剧本交给有文化的人审查改良。

至一九三〇年(民国十九年)果然做到互相团结，组织了一个申曲歌剧公会，渐渐成为今日的沪剧。

(黄鉴铜 整理)

## 上海早期的西洋画美术教育

丁 悚

上海西洋画美术教育，最早是徐家汇土山湾天主堂所办的图画馆。该馆创立于清同治年间，教授科目分水彩、铅笔、擦笔、木炭、油画等，以临摹写影、人物花卉居多，主要都是以有关天主教的宗教画为题材，用以传播教义。画馆向不对外招生，学生都是孤儿院里抚养长大的孩子。间有杰出人才，学成离馆向外发展的，如当年的徐咏青就是其中的一个。

至于具学校形式的美术专科教育，当数上海油画院了。该院创立于晚清末季，并附设中西图画函授学校。创办人周湘，字印侯，又号隐庵，曾留学日本，擅中西画术，凡油画、水彩、铅笔、擦笔等画，全能应付，实际上他的国画、金石、书法更是精湛不凡。当时因西画新奇，易于招致有志从事于西洋艺术的学生，所以他就用油画院为名，设立了这个学院。最初的校址在法租界羊尾桥杀牛公司迤西的一段。现在这个地区，变成了西门路的通衢大道，旧迹已泯不可寻。后又迁往稍东的南褚家桥（今西藏南路）宝裕里（现改锦裕里）沿马路的两幢小洋房内。后再迁董家渡、长浜路、小西门等处。周湘一人独兼了校长、教授和其他职务，教授方法偏重临摹。由于学校缺乏人力、物力，组织也欠健全，就学者不多，断断续续，前后办了十余

年，终因无力支持而停办。

上海第二所美术学校，就是上海美专的前身图画美术学院。该院是一九一二年成立的，创办人为乌始光、刘海粟等人（乌并非文艺工作者，稍有资产，刘海粟当时没有财力，利用乌的资金作创办费，后乌脱离该校）。刘海粟任校长，乌始光主持经济。我是在第二学期被邀加入的。其时我的作品，已为全国读者所稔。张聿光由我介绍到校，被聘为正校长时，刘自居其副，我则任教务长。校址最初在乍浦路七号，继迁爱而近路（今安庆路）十号，三迁北四川路横浜桥，四迁海宁路，五迁西门方斜路白云观东的宝隆里，六迁同路南洋女子师范旧址。最后在一九二二年自建校舍于法租界的菜市路（今顺昌路），规模方始大具。延聘张聿光任正校长时，校址尚在海宁路。江小鹗任教务主任，则在一九一七年，也是由我介绍的，我自愿改任教授。一九二一年始正式改图画美术学院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由于每学期就学的学生不断增多，校舍不敷应用而屡屡迁移。直至一九二二年前，始有自建校舍的计划。其期选中了今顺昌路永年路口永锡堂殡舍地基，建筑基金系分头筹募而来，不足之数，则以尚未建成的房产向银行抵押借贷。教育宗旨为造就美术人才。教授方法最初创办时也系范本临摹，过了三四个学期，始改实物写生。约在一九一四年后，校舍在南洋女子师范旧址时，开始用模特儿作基本实习，成为当时全国唯一的艺术学府。

自从刘海粟等创办美专以后，一九二〇年，丰子恺、吴梦非、刘质平等合办艺术专科师范于西门黄家阙路，后改称艺术

师范大学。又有周勤豪(刘海粟的姊夫)于蒲柏路(今太仓路)办东方绘画研究所,后改东方绘画学校。一九二四到一九二五年间,两校因经济关系,合并为上海艺术大学,校址则在虹口东体育会路。一九二五年冬,上海艺术大学发生学潮,一部分师生分裂出来筹设新校,遂产生了中华艺术大学。该校美术部门由陈抱一、丁衍镛主持。一九二八年,丁氏赴粤,翌年,陈氏告退,由许幸之任教导。越一年,因故停办。

成立年份较久、仅次于上海美专的,当为新华艺术专科学校。该校创立于一九二六年冬,由潘天寿、俞寄凡、潘伯英、宋寿昌、张聿光、俞叔渊、练为章等发起。初名新华艺术学院,设国画、西画、音乐、艺术教育四系。院址在今瑞金二路南口。一九二八年,改名为新华艺术大学,迁至对面斜徐路。一九二九年秋,又改名为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添设女子音体系。一九三一年,汪亚尘自欧归国,请汪共谋该校发展,重组校董会,推徐朗西为校长,汪为教务长,潘伯英为总务长,添募基金,购置校产,取消女子音体系,添设图案系。同时又得市教育局核准,设立新华艺术师范,校长由汪亚尘担任。其后又在闵行路添置校产三十亩。校舍之旁,辟一广场,作为校园,栽植花木,蓄养鸟兽,使学生既可实地写生,又可观赏研究。自此十余年,校务蒸蒸日上,规模粗具。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该校全部被毁。抗战前期,该校犹赁今建国中路一五五弄内房屋作临时校舍,辟教室六间,继续维持上课,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租界始告结束。

还有一所上海艺术专科学校,是在一九二〇年秋,由王道

源接办人文艺术大学改组成立的，校舍迁至闸北江湾路。该校西洋画科主任为陈抱一，教授有陈之佛、倪貽德等。“一·二八”之役，校舍适当战区，全部毁废。一九四五年间，吴兴沈士风、吴县周牧轩、杭县王小摩等发起，设立中华文艺书画学院，每周末和星期日下午假今风阳路公中小学授课。科目有国画、书法、金石、诗文、史学、画理等等。教师有王小摩、张大壮、周以鸿、孔小瑜、张侣笙、张筠庵、周练霞、王贞珉、杜进高、叶百丰等。解放以前，似已无形解散。

学校之外，还有几个画会，也是以美术教育为宗旨的。如东方画会、晨光美术会、白鹅绘画补习学校等，规模都不大，属共同研究性质。东方画会创立较早，由乌始光、汪亚尘、俞寄凡等发起，时在一九一五年。会所在城内西门附近，仅一年余解散。晨光美术会为萧公权、汪英宾、朱应鹏、张聿光、陈抱一、宋之钦等发起，成立于一九二一年。会所初在方斜路崇庆里，同年迁今南京西路福源里，继又迁今风阳路七号，终迁今南京西路一七二〇号，有画室设备，供会员研究之用，其后继上海美专之后，雇用白俄女模特儿供实习。会员由三十人增至三百人。先后举行画展四次，不久因人事关系无形解散。白鹅绘画补习学校成立于一九二三——一九三四年间，由陈秋草、方雪鹑、潘思同等发起。一九二六年定名白鹅绘画研究所，地址在横浜路，由陈秋草主事，惨淡经营，人才辈出。后迁今溧阳路，更名白鹅绘画补习学校。初遭“一·二八”之役，继经“八·一三”之难，先后迁北京西路、武定路，终至停顿。

## 近代上海美术组织记略

王 端

**平远山房** 创立于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 创始人为沧州李味庄, 时任上海兵备道, 为附庸风雅而设, 凡有诗书画一技之长者都被延入。参加人数不详, 约在一八〇六年(嘉庆十一年)结束。

**小蓬莱** 创立于一八三九年(道光十九年), 系虞山蒋霞竹所设, 集诸名士于一堂, 吟诗作画无虚日。

**萍花社书画会** 创立于一八五一年(咸丰元年), 创始人钱塘吴宗麟, 初为诗社, 后发展为书画会, 属于雅集性质。约在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结束。

**文明雅集** 创立于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 创始人俞达夫, 初设于汉口路茶馆, 后迁至城内凝晖阁, 嗣盘与松月楼。

**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 创立时间约在光绪中叶, 停止活动在一九二七年秋季, 其间足有三四十年之久, 且具有规模, 订有章程, 驻有办事人员, 可算美术团体的首创。出资者盛宣怀, 白天到会的较少, 晚饭后常有二三十人次到会作画, 也有出示家藏珍品, 提供大家观摩, 也有书画贩子到会兜售书画古玩。会址先在福州路, 后迁汕头路。第一任会长为阳湖汪



洵，副会长吴昌硕。汪去世后，吴继任会长，哈少甫和王一亭为副会长。驻会办公的前为俞语霜，后为骆亮公。经常到会的会员有汪洵、哈少甫、陆廉夫、李平书、商笙伯、任葺叔、钱瘦铁、陈巨来、吕十千、黄葆钺、邓春澍、钱化佛、吴昌硕、王一亭、朱古微、黄山寿、姚虞琴、赵叔孺、高野侯、丁辅之、俞语霜、吴待秋、吴东迈、曾农髯、褚德彝、黄宾虹、唐吉生、贺天健、丁念先、王个簪、张石园、马企周、熊松泉、洪庶安等八十人。

**豫园书画善会** 创立于一九〇八年（宣统元年），赁得月楼陈列各人合作画，售出之后，作者分得百分之五十，其余百分之五十充善举，夏施药、冬施米，赈济水旱灾害。由姚伯鸿、黄克明、汪仲山、高邕之、杨佩父等二十九人发起，会员百余人。历届会长为高邕之、钱吉生、杨葆光、马瑞西、沈心海、王一亭、汪仲山。

**宛米山房书画会** 创立于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由陈石痴、徐竹贤、袁天祥等发起，假豫园放鹤楼为会所，由徐竹贤主持会务。会员有杨东山、哈少甫、汪仲山、钱云鹤、朱文侯、蒋通夫、许铸成等人。至一九二六年改组，程瑶笙、杨东山、沈心海，先后当选为会长，会务由徐晓邨主持，至抗战起，会员星散，会址毁于火。

**上海书画研究会** 创立于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系上海收藏家和书画家所发起。会员有汪洵、李平书、哈少甫、倪墨耕、陆廉夫、何诗孙、蒲竹英、狄楚青等人，赁上海小花园商余雅集楼为会所，旋即停顿。

**青漪馆书画会** 创立于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由胡郅卿、洪庶安等发起。设总事务所在南京路贵州路转角，在福州路文明雅集茶楼内为会员陈列作品之所。翌年主办书画义卖，得款征助水灾。

**文美会** 创立于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创始人李叔同，时主编《太平洋画报》（《太平洋报》副刊）。会址附设在太平洋报社内，会员都是报社中人。李编《文美杂志》，刊载会员书画及篆刻。未及一年即停办。

**东方画会** 创立于一九一五年，为最早的西画研究促进组织，会址设在城内西门，由乌始光、汪亚尘、陈抱一、俞寄凡等发起组织，约一年余无形解散。

**天马会** 创立于一九二一年，是研究西画的组织，由刘海粟、汪亚尘及上海美专各教授发起，会员有江小鹞、陈晓江、汪亚尘、王济远、唐吉生、丁悚、杨清磐、张辰伯等人。先后曾举行展览会八次，至一九二七年停顿。

**晨光美术会** 创立于一九二二年，为萧公权、汪英宾、朱应鹏、张聿光、陈抱一、宋志欣等发起创设。会址设在西门方浜路崇庆里，半年后迁至静安寺路福源里，设有画室，雇用俄女模特儿，共同实习。一九二四年迁至白克路，一九二六年又迁至静安寺路一七二〇号，会员增至三百余人，先后举行展览会四次，旋即停顿。

**停云书画社** 创办于一九二二年，社址设在山东南路，由任薰、吕万、洪饒等三人主持。于一九二四、二五两年辑印社刊书画集二集，有社员二百多人。时江浙构兵，同道星散。

战后重行恢复，但性质和结构都变，成为辛亥革命的地下联络点，进行和资助各种革命活动。执行革命任务是出面的田桓，对外有于右任、田桐、张继、胡汉民、张人杰、蔡公时及当代诸名流，翕然称盛。北伐胜利后，会务结束。

**青年书画社** 创立于一九二二年，发起人为刘文渊、许铸成、丁念先等。翌年举行展览会，成立面授部及函授部。会址设在海上题襟馆过街楼一角，会员有吴幼潜、徐穆如、赵祖同、姜怀素、陈文潞、黄文农、朱承勋、姜屏翰、殷梓湘等。

**红叶书画社** 创立于一九二三年，由钱瘦铁创始和主持。会员会址不详。

**红梨金石书画会** 创立于一九二六年，由吴兴汪仰真、吴野洲、朱乐馥、张贻谷、蔡冠雄、吴慰庭等发起。会址在九江路，会员有王镜斋、张应巢、王子宪、仲冕臣、沈可庄、吴朴庄、周承峰、郑仲贤、李臻、张泳霓等四十余人，推选王镜斋为会长，汪仰真为副会长。每年春秋举行展览会。抗战开始，因避敌锋停办。

**素月画社** 创立于一九二六年，由杨东山之子秋宾及其门人沈珊若、范希仲、孙钧卿、叶渭莘等创始。社址在小南门俞家弄。社长杨东山，名誉社长王一亭，每晚有社友汪仲山、范香孙、陆兰阶、顾翔生、沙辅卿、杨松庆、钱瘦铁、吴东迈、高尚之、朱其石、徐晓邨、屈松声、顾墨飞、谢闻鸥、汪声远、李芳园、熊松泉等赋诗作画，兴尽而散。一九三〇年杨去世后，迁社址于北门沉香阁。抗战初起，一度停顿。胜利后复会，曾出版《素月画社画册》两集，《素月集锦》四期，《素

月画社扇集》五册，《素月特刊》十四期，《叶渭莘画册》、《孙琴轩山水画册》、《老秋印存》两册，《孙钧卿大岳楼藏画》、《大岳楼画集》等。

**海上书画联合会** 创立于一九二六年，由查烟谷发起和支持。会址设在老西门西林路，会员有于右任、田梓琴、黄素盦、王一亭、周逸安、龚铁梅、吴铁珊、马扶群、洪丽生、姚鸿、喻志韶、缪谷瑛、姚墨邨、郑烟樵、关富亭、高杭生、顾伯达、李芳园等人。一九三〇年举行五周年纪念展览，并出版《墨海潮》一册。

**上海巽社** 创立于一九二六年，发起人为长兴王修。社址在同孚路二六三号，出版美术周刊一种，定名《鼎齋》，一年后停刊。

**艺观学会** 创立于一九二七年，创始人黄宾虹等，会址在威海卫路，订有简章，收纳会费，出版双周刊《艺观》一种，惜仅数期即告停顿。

**古欢今雨金石书画社** 创立于一九二七年，一部分是题襟馆停办后的会员即“古欢”，一部分是新吸收的会员，叫“今雨”。社址在渭水坊，不收会费，一切茶水租赁以及服务员薪给，都由西冷印社主人吴幼潜负担。聚会时间，每晚六至十时。又有叙餐会、消寒会之组织，定时定期举行。会员有高野侯、骆亮公、姚虞琴、唐吉生、吴振平、丁念先、朱孝臧、王一亭、马企周、丁辅之、赵叔孺、吴幼潜、钱瘦铁、商笙伯、哈少甫、吴东迈、宗履谷、陈叔通、章显庭、郑曼青、程万里、邓春澍、王个簪、王禹襄、方介堪、马孟容、陈巨来等约五十人。

**艺苑** 创立于一九二八年，创始人是张辰伯、江小鹤、王济远、朱屺瞻、金启静、李秋君、唐蕴玉、潘玉良等，地址在西门林荫路。

**蜜蜂画社** 创立于一九三〇年，由郑午昌、王师子、张善孖、谢公展、贺天健、陆丹林、孙雪泥等发起组织。社址在西藏路平乐里，出版《蜜蜂画报》、画集，及《当代名家画海》、《国画讲座》等。社友分两种，一种是基本社友，每人认基金股至少五十元，另一种是普通社友，每年纳社费两元。会务由干事负责，先后任干事的有张善孖、谢公展、陆丹林、许澈白、李祖韩、钱瘦铁、孙雪泥、郑曼青、马孟容、贺天健、郑午昌。主任干事郑午昌、陆丹林、许澈白。会员有吴青霞、黄蔼农、沈子丞、郑曼青、赵半跛、张冷僧、施狮鹏、陆丹林、张善孖、俞寄凡、俞剑华、王式园、张红薇、叶渭莘、杨清馨、王个簃、方介堪、贺天健、郑午昌、王师子、李祖韩、马企周、熊松泉、陶寿伯、谢之光、张天奇、张大千、王一亭、应野苹、王季眉、顾坤伯、朱文侯等一百四十多人。

**长虹画社** 创立于一九三一年，由谢闲鸥、沈心海、金粟香、朱良材、陈竹汀、李蟠根、周小娜、洪颂炯等发起组织。社址设在尚文路何家支弄，先后出版《长虹社画刊》、《长虹社画集》，并举行扇展等。

**中国画会** 创立于一九三二年，由郑午昌、孙雪泥、贺天健、钱瘦铁、李祖韩、陆丹林、谢公展、马孟容等发起组织。担任执监委员者有张聿光、贺天健、郑午昌、孙雪泥、陆丹林、钱瘦铁、马公愚、张大千、丁念先、王师子、陈定

山、李祖韩、谢公展、汪亚尘、陈树人、经亨颐、张善孖、王一亭、商笙伯、熊松泉、黄宾虹、吴湖帆等。会所初在华龙路，由钱瘦铁主持；后迁于威海卫路中社，由贺天健主持。抗战前夕，移至新华艺专，由汪亚尘主持，曾编印《国画月刊》、《现代中国画集》，举办画展，代办中外画展。胜利后复员，改选理监事，常务理事孙雪泥、郑午昌、施柳鹏、丁念先、贺天健，理事汪亚尘、陆丹林、陈定山、马公愚、李祖韩、荣君立、张聿光、李秋君、熊松泉、张大千，候补理事钱瘦铁、吴青霞、朱屺瞻、应野苹、方介堪。常务监事王师子、田桓、姜丹书，监事商笙伯、张君谋，候补监事徐悲鸿、沈一斋。总务组主任孙雪泥，研究组主任陆丹林，事业组主任丁念先，总务组秘书徐邦达。

**百川书画会** 创立于一九三四年，为黄宾虹等发起组织，选王济远、吴梦非、黄宾虹、诸闻韵等七人为理事，推王济远为理事长。一九三五年假湖社举行第一次展览会，旋即停办。

**中国女子书画会** 创立于一九三五年，由冯文凤、李秋君、陈小翠、顾青瑶、杨雪玖、顾默飞等倡议发起，复得唐冠玉、虞澹涵、陆小曼、吴青霞、包琼枝、丁筠碧、徐慧、余静芝、周鍊霞、鲍亚辉、谢应新、谢月眉、杨雪瑶、庞左玉等响应，乃于一九三五年正式成立，选举职员，编印特刊。又组“画中诗社”，互相唱和，定期举行画展。十余年来会员发展到一百五十余人。抗战到沦陷，一度停顿。胜利后恢复，一切会务继续进行。会址初假克能海路，由冯文凤主持，后冯省亲回港，会址移中正北二路，由李秋君主持。

**中国工商业美术作家协会** 起先是“中国商业美术作家协会”，只吸收各公司各厂商画广告搞包装为商业服务的设计人员，因此创始人是“四大公司”的，如永安公司的薛萍、丁熙，新新公司的王端，先施公司的赵子祥、缪少贤，中国国货公司的柯定璽、林蔚如、陈施君共八人。一切称号编制、编印选集、教学方式都参考日本，后来又大量吸收了为工业服务的设计人员，以及大专院校的教授及优秀毕业生，并在会名上加上“工”字。创立在一九三五年，会址赁汉口路恭庆大楼。是全国性团体，北京、天津、武汉、南京、苏州、杭州等都有分会，会员共五百多人。理事长叶鉴修，常务理事王端、杭稚英，理事赵子祥、林蔚如、薛萍、郑人仄、陈亚平，监事长徐民智，监事王守仁、胡亚光、柯定璽、陈施君。

**中华艺术教育社** 创立于一九三五年，为鄢克昌、施文彬、傅伯良等发起，社址在文庙公园。曾于一九三六年举办全国儿童绘画展览。常务理事马公愚、施翀鹏、鄢克昌，理事傅伯良、王元功、朱允松、张眉孙、朱指微、张辰伯、沈萼庵、赵立民，监事陈颂春、丁念先、姜丹书、王龙章、俞寄凡。

**默社** 创立于一九三七年，由徐悲鸿、汪亚尘、颜文梁、朱屺瞻、张充仁、陈抱一等发起。规定每年举行展览一次，社友中勤奋钻研及推动工作者为潘玉良、吴作人、吕斯百、张安治、钱铸九、周碧初、吴恒勤、滑田友、黄珏如、荣君立等。

**清远艺社** 创立于一九四一年，由傅稚云、吴东迈、唐吉父、沈田莘、戚纪塘、杨清磬、凌万顷、谈建丞、张禹九等发起，推沈田莘为主任，定期进行画展。中途社务停顿。胜利

后复员，又有陆培之、沈迈士、陈立夫、孙绿卿、唐冠玉、吴登瀛、汪仰真、张锐、吴仲熊、徐雁秋、包小蝶、潘尧臣、黄敦良、高念慈、王贞珉、包句香、庞左玉、李绘秋、陈辛石、沈晋伯、王乐孙等四十余人参加，推选陈其采为社长，潘公展为副社长，常务干事凌万顷、沈晋伯、汪仰真、唐吉父、张锐、高念慈等，规定每天下午六到十时进行合作和研讨。

**上海美术会** 创立于一九四七年，原名“上海美术协会”，后改名为“上海美术会”，直属于“中华全国美术会”。会址设于陕西北路一二八号。理事为虞文、马公愚、郑午昌、施翀鹏、许士骐、朗静山、丁念先、徐蔚南、王进珊、吴青霞、刘狮、李咏森、严独鹤、汪声远、俞剑华、颜文梁、陆丹林、唐冠玉、张充仁、梁俊青、姜丹书、汪亚尘、孙雪泥、贺天健、王端共二十五人，监事为刘海粟、陈树人、吴湖帆、商笙伯、吴待秋、冯超然、王福庵等七人。常务理事为虞文、汪亚尘、许士骐、刘狮及作者五人。每年举行年会，宣读论文，进行书画、篆刻、应用美术等展览。会员近七百人。

**上海美术茶会** 创立于一九四八年，由王端、蒋孝游、史良黻等倡议，不设会长、社长、主席等，只有干事。每半月开会一次，进行各种文艺表演，也可置备茶点，举行余兴。每次可以一人召集，也可以合十个八个人召集，也可分送书画供会友观摩。任何美术家，都可以做召集人，只要事前向干事部登记即可。还有免费旅游，但以当天往返为限。



## 忆吴昌硕先生

谭少云

吴昌硕先生，浙江省安吉县韩吴村人。生于清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年），殁于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终年八十四岁。生长于书香世家，自幼聪慧勤奋，少遭丧乱，绝意仕进。先生笔名甚多，初名俊，又名俊卿，散见于各类作品的署名有苍石、仓硕、缶庐、苦铁、破荷、大聋、老缶、缶道人、酸寒尉、芜菁亭长等。他是晚清杰出的艺术家，诗、书、画、刻均能擅前人得失，博采众长，自成一家，在国内外有深远影响。予以弱冠之年，曾从先生学画，先父组云公与先生为文字交，时相过从，是以得知其生平概略。

先生自云：“三十学诗，五十学画。”年逾古稀，尤专致于书法创作。初以篆刻名于世，其书法篆、隶、真、草皆以篆法出之。楷书先学钟、王、颜鲁公诸家，草书学王孟津，隶书初学唐碑，再学汉碑及三老碑，篆以石鼓为主。画则远师白阳、青藤、八大、石涛、复堂、枊叔、让之，与同时辈伯年、作英诸公互有影响。所作以松、梅、竹、石及杂卉为最著，亦间作山水、佛像。常以书法入画，汪洋涵润，一变乾嘉以来花卉画纤细画风，风格独特。先生治印研习尤深，初宗浙派，继法邓石如、吴熙载、汇石鼓、泥封、砖瓦诸体特色，融会贯通，自成

一体。刀法亦有创新，善以“出锋钝角”刻刀入印，秀丽苍劲，流畅厚朴，兼而有之。先生存世印作仅七百余方，近年来继有发现，据云系一白芙蓉石章，全为阴文，仅十二字，尤奇者该印不用刻刀，纯用一大铁钉凿成。盖先生客吴门时为其友朱砚涛所治。以钉治印，自先生始。昔人云：善书者不择笔，先生治印，殆有类之，亦印坛之佳话也。

先生绘事之余，亦或发为歌诗，诗亦奇古。所与为师友者如藐翁、伯年、退楼、大澂、公寿等，皆一时之彦。先生与王一亭(震)交往最深，一亭为先生入室弟子，相从有年，日常谈艺挥毫以为常课。日人最喜王画吴题，一时蔚为风气。哈少甫云：缶翁作品，奇特古秀，有金石气，出类拔萃，五百年来无此作也。信然。

先生治学严谨，极重根基。自幼好学，家贫无以给纸笔，常以秃笔蘸水于砖上习书。后居苏、杭、沪滨，日与收藏、书画家过往，得纵观古人墨迹，博学广闻，艺业精进。常云：欲学治印，必先习篆。又云：人常以为我画好，其实书好于画，篆刻更甚于书。先生处师友间善自谦抑，亦不轻许人，然得一善则赞之不容口。尝与伯年论画，极赞其下笔往往超越古人，出时人笔墨之上，出之天授，不可学而致之。先生曾为拙作画梅题词云：“少云之绩，豪气天开，半从人事，罕有是才。”时先生年八十二，垂暮之年，其奖掖后进有如是者。曩时春风化雨，获益良多。今予亦耄矣，回思往事，不禁泫然。

初，先父组云公来海上，因京口王维清先生介绍至题襟馆得识先生。出所临碑帖求教，先生极赞父书，尤称所临《十七

帖》、《书谱》及《争座位帖》诸书，是以先父终其生喜书此三帖也。先父寓沪时，曾与先生及梅庵、邕之、作英、一亭、墨畊、山寿、瑶笙诸公合作四屏，率由先生题句：

玉堂富贵常春花，瑞朝清供乐无涯；我所思兮崖下家。

莒蒲蜀葵当礼送，榴花可为端阳供；我所思兮益智粽。

芙蓉秋色满挡路，黄花一枝带晓露；我所思兮《秋声赋》。

天竺腊梅论担买，水仙娟娟发光采；我所思兮香雪海。

先生于诸卉中酷爱梅，曾有题“梅花书屋”诗云：“梅花石屋坐谈诗，梦里清游偶得之，如此芜园归不得，岁寒依旧费相思。”先生居家亦喜种梅，某年，迫于生计，将外出，自题一律：“梅花铁骨红，旧时种此树。艳击珊瑚碎，高倚夕阳处。百迎绕不厌，围涉颇成趣。太息饥驱人，揖尔出门去。”铁骨风标，恬淡清远，诗如其人。先生尤爱超山宋梅，捐馆后竟葬于斯。

先生美丰仪，躯仅中人，颧颊丰满，细目疏髯，七十高龄，须发无白者，望之若四十许人。晚号大聋，寡言笑。然遇知交，每倾谈忘倦。先父尝语先生曰：“先生非真聋，其有所托耶？”先生笑颌之。先父又语先生曰：“大作合南北为一辙。”先生答：“简直不成东西，还谈什么南北！”两人相视而笑。此先生之谦虚也。

七十而后，不标润格，求书多不应。然遇知交相泥，亦偶为之，寸笺尺楮，并皆佳妙。初，西泠建社时，印人共推先生为首任社长，李叔同、王福庵、丰子恺诸公均为该社同仁。今年为先生一百三十六周年诞辰，日人朝仓文父父女为先生两次铸像，藏于西泠印社。先生作品流传海外者甚多，师之者尤不

乏人。海外著名学者往往论及“吴门艺术”：“缶庐流风余韵，远及东南亚；新加坡儿女，私淑之者尤众。”其影响之深远如此。

# 上海早期的讽刺画和漫画家

孙 俊 王敦庆

## 一、早期的讽刺画

漫画起源于讽刺画。逊清末年，革命党人曾利用这种美术形式，揭露清政府的黑暗，唤起民众革命。这种画政治思想性很强，当时许多革命报纸如《民立报》、《民吁日报》、《神州日报》、《大共和报》、《太平洋日报》等，都不时刊登讽刺画。但专门出版讽刺画报的要以高剑父、陈树人创办的《时事画报》为最早。约在一九〇五年左右，他们与潘达微、何剑士、陈垣（援庵）等人共同组织出版，最初在广州秘密发行，后来改在上海租界公开销售，发行量颇大，所起影响不小。

高、陈两人均从岭南名画家居巢、居廉兄弟为徒。绘画造诣很深。后来两人又留学日本，对日本的漫画深有研究。陈对高说：“中国画至今日不可不革命。改进之任，子为其奇，我为其正。艺术关系国魂，推陈出新，予将以此为终身责任。”《时事画报》的创办，可以说是他们改革的尝试，效果较为显著。

继《时事画报》之后，《真相画报》出版，参加讽刺画的人才更多，名画家黄宾虹也参加了这个行列。《真相画报》在辛亥革命前努力宣传革命，宾虹、剑父、奇峰、树人的讽刺画刊载最多。辛亥革命后，曾刊出“床下都督”、“伟人出床下”等讽刺

画，讽刺黎元洪被迫参加革命的情景。后来又对窃国大盗袁世凯进行口诛笔伐。袁为网罗亲信，对北洋军阀大封上将、中将、少将等军衔，《真相画报》就登了一张“酱园大开张”，画面上是一月酱园店，柜台上陈列了许多酱油瓶，并贴着“大将”、“中将”、“少将”等字样，讽刺性甚为辛辣！在吴禄贞被暗杀、宋教仁被刺死后，《真相画报》都一一用讽刺画揭露袁世凯的卑鄙阴险手法。冯玉祥当时有一付揭袁的对联：“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这些漫画可干之媲美。后袁世凯帝制虽然被推翻，但国家政权仍旧掌握在北洋军阀手中，后继者仍然丧权辱国，内战不断。一九一八年，《上海泼克》创刊，系沈泊尘一人所办，以反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为主要题材。第一期封面就是一幅非常辛辣的讽刺画，明显地针对徐世昌，题为《十年老女犹画娥眉》，画出一个和徐世昌面孔一样的新娘，在男女嫖相搀扶下粉墨登场，令人作呕。又有反对军阀混战，涂炭人民生命的讽刺性很强烈的画面。该画报更有一特色，即中英文兼有，对后来漫画家的影响很大。

后来但杜宇编辑出版了《国耻画报》，沿袭了《上海泼克》的做法和风格，抨击帝国主义和卖国政府。其中有一张题为“呜呼鲁民，呜呼圣地”的画，画了一个带了枷锁的山东人，枷锁上一面太阳旗；又有一张题为“私相授受”的画，揭露了北洋军阀与日本军国主义勾结，把中国主权让给帝国主义。还有一张题为“阿瞒请客，珍馐杂陈”的画，借用曹操来比喻亲日派，阿瞒是指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自从《上海泼克》、《国

耻画报》消失后，上海漫画界一度处于冬眠状态。

## 二、漫画会的发生、发展及其活动

漫画会是在“五卅”惨案发生前一年，由丁悚、黄文农、张光宇、叶浅予、王敦庆六人发起的，直到国民革命军北伐到上海，会员又增加了鲁少飞、曹涵美、季小波、蔡翰丹、张眉荪、胡旭光六人，共计十二人。其中叶浅予、季小波、鲁少飞受过高等美术教育，张光宇、胡旭光从张聿光为师，黄文农、张振宇是石印工人自学成材。丁悚亦靠自学成名，会员中以他资格最老，地位最高，蔡翰丹、王敦庆都是教会大学毕业。

漫画会的六位发起人中，黄文农以《晶报》及《东方杂志》为基地，丁悚、张光宇、王敦庆以毕倚虹办的《上海画报》为据点，张振宇和叶浅予以《三日画报》为堡垒。此时六人都想组织一个学术性研究机构，用以教育自己，提高自己，团结同志，扩大漫画阵地。同时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激起省、港同胞大罢工，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军，于是漫画会应运而生。论战绩，六人中以黄文农最为突出。譬如他在“英国洋行中的出品”一画中描绘了几具人体骨骼架子，坐在地上，以表现“五卅”惨案中牺牲了的中国同胞。还有一幅画，描绘了一个挑担的卖破铜烂铁的旧货贩，以表现英帝国主义在与中国军阀做军火交易。这幅画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后，英帝国主义恼羞成怒，立即在租界法院对商务印书分馆和《东方杂志》负责人提出控告。这一东方杂志漫画事件曾经激怒过上海文艺界和舆论界。漫画会这一组织本来是一个地下工作机构，因此一切活动都是悄悄地进行，没

有会章，没有会长，不收会费，没有账目，没有会议记录，没有固定开会地址，更没有招牌。每逢星期日上午，一个一个悄悄地溜进法租界天祥里丁悚家里，喝杯香片茶，漫谈古今中外画坛轶事。据王敦庆回忆，当时他们漫谈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古往今来的名画家，大都是勤学苦练，法古创新自成一派。如法国的梵高、塞尚，我国的石涛、任伯年、吴昌硕，日本的桥本关雪、藤田嗣治等，可贵之处都在自学和创新。自远至近，上海美专的老师张辰伯、王济远，也是边干边学而能成为名画家和美术教育家的。又如：黄文农本来是中华书局印刷所石印车间的学徒，干石印描样，在描样中辛勤探求，逐渐掌握漫画艺术，从实践中不断深造，成为名家。还有但杜宇，是贵州人，出生于书香人家，曾祖父但明伦是清末第一个批注《聊斋志异》的人。他自幼酷爱绘画，一九一六年来上海，无力从师，就在旧书摊上找资料，苦苦练习，看到好资料，不惜典了衣服买来临摹，精益求精，终于成为漫画名手。

（二）提出“非漫画家的漫画”这一新词，扩大了漫画的范畴。他们从文人画，扬州八怪谈到印象派、立体派，认为梁楷的泼笔人物《仙人图》是地地道道的漫画。石涛的拖泥带水的山水画及其点缀的人物，八大山人的花鸟画，黄瘦瓢的淡彩人物，甚至罗两峰所刻两房山肖形印，任伯年的钟馗，虚谷的简笔山水等，也都是漫画。有一位举例说，有一个不出名的荷兰油画家，画一口棺材，上面放了一副决斗用的手套和一柄钢剑，下面坐着一条狗在哭泣，画题是《孤哀子》，这完全是讽刺



十八世纪决斗成风的欧洲社会的，也是“非漫画家的漫画”。又谈到塞尚的《两个玩纸牌的人》，梵高的《囚犯放风》，高更的《月亮与大地》，都是正规的漫画。除此以外，俄国诗人普希金和其他印象派的速写自画像，梵高的速写风景《露咖啡馆》，戈耶的素描《斗牛士》，马蒂斯的女人群像，毕加索的许多速写，以及塞尚的裸体素描，都应列入漫画范畴。

从“非漫画家的漫画”深入到古籍《金石索》，找到了武梁祠石阙和孝堂山画像石中奇形怪状的人物、动物、植物以及建筑等，从广义上说都是漫画。又从冠有绣像的《水浒传》、《聊斋志异》、《三国志演义》、《西游记》、《封神榜》的插图中发现大批漫画作品；从民间手工艺品中如桃花坞的木刻八仙图、门神，杨柳青木刻的《荡湖船》、《骑驴回门》，都含有漫画因素。再从儿童玩具中看北方的布老虎，南方的惠山泥人，虽不是画，却富有漫画的趣味，如果请张辰伯描在纸上，就是一幅很好的漫画。

（三）摸索漫画制作时必不可少的条件和漫画的功能。会员们常常喜欢谈论自己多年来最欣赏的漫画，作者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内容是政治讽刺画还是社会讽刺画，或是一笑了事的滑稽画。从这些评价中，考查了中国所谓讽刺画家或滑稽画家，不同于英国的漫画起源于政治或社会人物的漫画像，所以称为“漫像作家”，也不同于美国漫画发源于幽默画——卡通，因而称为“卡通作家”。日本的讽刺画或滑稽画虽是从英国引进的，但没有采用漫画这一称号，只用一个“漫”字（如称相声演员为“支那漫才师”）。漫画会用“漫”字，则含有不受拘束的意

义，与日本人使用“漫”字截然不同，他们用“非漫画家漫画”一词来扩大漫画的范畴，就是一个显著的证明。漫画会前面不添加“上海”或“中国”等字样，也说明了不受地区拘束的意思。

对于什么是漫画？其功能又是什么？会友也一再进行探索。他们认为一个漫画家作画时，应该抓住事件的可能夸大性，掌握事件可能的讽刺性或幽默感，还要假借一个比喻来含沙射影，阐明作家对某一事件的观点。这些都是漫画必须具备的条件。当时上海的新文艺界对某大报的某某编辑所写的不痛不痒的社论，认为是“懒婆娘的裹脚布又长又臭”。会员们从这一批判中得到启示，便在漫画的必具的条件后面，再加上“漫画的功能等于一篇报刊的优秀社论”。象这样集体讨论自己专业，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会员们还讨论了真正的漫画与冒牌漫画的问题。为了提高鉴别能力，大家举出许多实例来作证。比如美国的《纽约人》和日本的《东京泼克》，登载过许多“猎奇漫画”和“名人采访漫画”，都是以插图冒充漫画。《晶报》的经理余大雄往往心血来潮，设计一张所谓漫画，找几张名人半身照，交给黄文农剪剪贴贴，拼拼凑凑，涂涂抹抹，弄成一幅画，这不能算是黄文农的漫画作品。此外，他们还批评《新闻报·快活林》和《申报·自由谈》有些“讽刺画家”，常在新闻标题上找几个字拼凑在几个人的面孔上，这是在拆字，不存在一丝半点漫画传统，看了使人啼笑皆非。

漫画会后来解散，起因是《申报》馆的经理张竹平和该馆留学美国回来的汪英宾想办一个“漫画托拉斯”，聘请徐卓呆为荣

誉编辑，出版一套叫《改造博士》的长篇漫画，又邀约鲁少飞、张眉荪担任助编，挖了漫画会的墙脚。接着擅长交际的张振宇从邵洵美、张珍候处获得一笔微乎其微的资金，开办《上海漫画》，又拉走黄文农、张光宇、叶浅予连同张振宇本人等五人。于是漫画会的活动分子只剩丁悚和王敦庆两人。丁悚是一位很早就出名的漫画家，他和马星驰、钱病鹤在《新闻报·快活林》上画了不少的漫画。“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他又画了针对蒋政权的讽刺画。由于这些画，张道藩几次召他到南京去，对其威胁，施加压力。后来他转移到新亚药厂，当广告宣传科主任。这样，漫画会就无形结束。这可算是上海漫画界蓄积力量的时期。

### 三、上海漫画界的崛起时期

《上海漫画》(在此以前，叶浅予和丁悚曾办过《上海漫画》，因第一期封面登载讽刺蒋介石的漫画，被迫停刊)，由鲁少飞、王敦庆合编。《上海漫画》一出版就受到上海广大读者的欢迎，第一是因为它印刷考究，其次是它增加许多新鲜的内容，如时装妇女、裸体模特儿剪影，以及鲁少飞的新妇女画，曹涵美的《金瓶梅》，张光宇的民间情歌和名人漫画像，叶浅予的五彩长篇漫画《王先生》，黄文农的巨幅政治漫画等。

后来张振宇又说服邵洵美独资经营时代图书公司，以巨资向德国订购影写版印刷机，出版《时代画报》，由叶浅予任编辑，黄文农和陆志庠任助编。另出《时代漫画》，由鲁少飞单独编辑。黄文农病逝后，该公司聘请王敦庆任主编，叶浅予任助

编。后来叶浅予、张光宇、张振宇、曹涵美都做了该公司的股东，而赢得了“漫画资本家”的雅号。

《时代漫画》发现和团结了许多新的漫画家为它工作，后来漫画画坛上的健将如张乐平、张文元、朱吾石（米谷）、胡考、朱金楼、江栋良、董天野、汪子美、丁聪、陈涓隐、高龙生、廖冰兄、窦宗洛、窦宗淦等人所作的反蒋反日漫画和讽刺社会现象的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此外《时代漫画》还特约了许多文化人为它撰写杂文和报导文，三言两语的短评，以及有关漫画人物和理论的文章。因此这本刊物无论在绘画技术上或在文字的精炼上以及发行的数量上，都比已往的《上海泼克》、《上海画报》、《上海漫画》等更有进步和提高。

随后又出版了许多漫画刊物，如《漫画界》、《漫画之友》，由王敦庆编写；《救亡漫画》，王敦庆编；《上海漫画》、《独立漫画》，张光宇编；《漫画世界》、《漫话生活》、《生活漫画》，黄士英编；《漫画漫话》，蔡若虹、李辉英合编；《漫话半月刊》，张鸿飞编；《漫画和生活》，张谔编；《中国漫画》，朱金楼编；《电影漫画》，顾逢昌编；《现象漫画》，薛志英编；《非常时漫画》，江牧编。其中编成专集的有叶浅予的《王先生》专集，一出版就受到读者的欢迎，后由汤杰、茵英等人拍成电影，卖座率很高。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再版时，竟有年逾七旬的老太太为小孩排队数小时才购得一部，拍成电影后，卖座盛况空前。黄尧的《牛鼻子》取材不够现实，不能吸引读者。张光宇的《民间情歌》虽然收集不多，却很精彩别致，出版后不胫而走。张还编过一种彩印有冠盔的脸谱，各地京剧界都纷纷争购。丰子恺画的《众生相》、

《都市相》等《四相集》，其销售力之佳，实为罕见。黄文农编的《文农讽刺画集》、《初一之画》都比丰老的书出得早，因缺少宣传，未成热销书。在漫画理论方面，鲁迅翻译过江本一平氏的《漫画论》，并无单行本，只刊在《鲁迅全集》内。丰子恺写过《怎样画漫画》，该书通俗易懂，读者较多。之后，又有沈同衡的《怎样学漫画》，但不及叶浅予写的《怎样作速写》受人欢迎。鲁少飞的《北游漫画》，文多于画。一些期刊也陆续刊载有关漫画理论的文章，只是没有汇集成书。这一时期可算是上海漫画界的崛起时期。

#### 四、全国漫画作家协会和全国漫画展览会

《时代漫画》发起成立全国漫画作家协会和举行第一届全国漫画展览会，开辟了中国漫画运动早期的新局面。他们通知上海全体漫画作家及苏州等地的漫画作家于一九三六年某月某日在半淞园举行全国漫画作家协会成立大会，到会三十余人，随即分成小组讨论今后的工作打算。不久，《时代漫画》刊载了成立会的消息，并宣布举行第一届全国漫画展览会的规划。约一个月后，精彩的作品源源而来。两个半月后，评选及装帧工作初步完成。此时他们面临着两个难题：一是如何筹措会场租费，二是如何避免上海市党部的吹毛求疵的检查。后来决定由鲁少飞与时代图书公司当局磋商，先借一笔钱，俟展览会结束后，将展品由《时代漫画》出一期特刊，以各作家应得的稿费抵偿借款，从而解决了第一个难题。其次再请展览会筹备人之一黄苗子于预展时，请当时的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前去走马看花地浏

览一遍，便发新闻报道说潘公展看过。这样，第二个难题也解决了。

展览会借大新公司画廊展出，共有漫画二百多幅，上海从来未见过漫画作家如此集中、作品如此多种多样的展览。参观者络绎不绝，诚属破天荒之创举。有的一早等开门，有的到了关门时候还舍不得离开，有的连续来了几次。参观者以学生、店员、工人占多数。参观者订购漫画也很踊跃，一幅漫画往往几个人订购。展出期本来规定一星期，由于群众一再要求，延长至一月之久。闭幕后整理了几天，又到苏州巡回展出。从苏州到南京时，适逢西安事变，不得不折回上海。时代编辑部的宣国杰同志在展览会的筹备工作中，不辞辛劳，在整个展览期中，还率领编辑部营业部的青年同志轮流照料，终于以比较优厚的稿酬，偿清了债务，也促进了漫画运动的蓬勃发展。这些带有反蒋反日浓厚色彩的漫画触痛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的神经，成为他的眼中钉，起先是控诉《时代漫画》编辑人王敦庆、鲁少飞，使他们受到法院处以罚金的判决。最后两人还是不肯屈服，这位部长干脆勒令该报停刊，王、鲁两人又出版了《漫画界》来抵抗。

## 五、抗日战争中漫画活动

抗日战争开始后，郭沫若先生曾囑叶灵凤邀王敦庆喝茶，希望王和其他漫画家从速到后方去做宣传工作。因为当时王在筹备《救亡漫画》的出版工作，所以没有立即离开上海，只许诺要尽一切努力组织年青有为的漫画家，从速输送到后方。《救

亡漫画》只出了三期，便同《救亡日报》一同成为上海救亡协会宣传抗战的左右两膀。那时日本及汪伪的势力，一步一步地侵入租界，公开的抗日活动很难开展。等到《救亡漫画》第七期发稿时，该报的主持人鲁少飞只得将剩余的白报纸变为现金，交给叶浅予组织的漫画宣传队作为开拔费用，直奔汉口，队员有张乐平、陶谋基、陆志庠、宣国杰、席与群等，大都是单身汉。他们抵达汉口后，郭老即从第三厅拨款支援，以后他们展开了形式多样的声势浩大的抗日宣传活动。

（王 端 整理）

# 上海的江南丝竹

张萍舟

我喜爱江南丝竹，自幼跟随丝竹老前辈在春风得意楼茶室演奏，后曾参加并组织过一些国乐社团。兹回忆江南丝竹在上海的发展情况，并参考有关资料，写出此文，就正于方家。

## 一、江南丝竹的起源

江南丝竹是长江南部江浙地区的一种民间丝竹音乐，在上海一带流行很广，不但为当地群众所喜闻乐见，而且引起各地音乐者的重视。

十九世纪中叶，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在苏州、无锡等地。当时民间演奏的主要形式是苏南吹打和十番锣鼓，江南丝竹尚未成为一个乐种，上海地区流行的《锣鼓四合》就是以锣鼓击打乐加上笛子奏的一种夹打乐曲。它以笛子领奏，乐曲首尾及中段都有较长的锣鼓击打。《四合》是三个以上小曲联奏曲体的名称，有《扬州四合》，《苏州四合》等。

《锣鼓四合》是由《大十面》、《小拜门》、《玉娥郎》、《云庆》、《小十面》、《急急风》等曲，加上《走马》为主的联合而成。它与《扬州四合》在许多细节上相吻合，并非上海地区的乐曲，但此曲演奏形式及曲调，对后来江南地区的丝竹音乐有很大影响，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为江南丝竹奠定了良好基础。



## 二、江南丝竹名称的由来

丝竹是我国民族音乐中合奏所用的器乐，可说是民间管弦乐的总称。“丝”是指丝弦乐器，如胡琴、琵琶、三弦、月琴、秦琴以及打弦乐器扬琴等等。“竹”是指竹管乐器，如笛、箫、笙、唢呐等。各地的丝竹音乐都具有自己独特的地方风格。江南丝竹流行在上海、江苏、浙江一带，盛行于江苏南部，因此在丝竹加上“江南”两字，叫做“江南丝竹”。它是我国民族器乐中一个著名的乐种。

一九五八年上海市群众艺术馆编印的《上海民间器乐曲选集》，正式把丝竹音乐命名为“江南丝竹”。

## 三、使用的乐器和乐队编制

江南丝竹使用的乐器常见的有笛、箫、笙、二胡、琵琶、扬琴、三弦、秦琴、阮、低胡和鼓板，现在，又加上古筝等乐器。

乐队的编制一般在十人左右。但小合奏时，也有用箫、二胡、琵琶、扬琴四件乐器合起来演奏的，如《春江花月夜》、《阳八曲》等。偶尔在人数众多时，亦有每种乐器用两种来合奏的，如演奏《打双桥》或《清客串》、《行街》时用之。乐队编制的精简自如，是这个乐种的方便之处，所以江南丝竹能在民间易于普及，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

## 四、江南丝竹的初步形成

江南丝竹首先是由农村中的《清客串》以及城市茶室中老茶

客的集会合奏发展起来的。《清客串》是上海郊区农村的一种民间演奏形式，对江南丝竹的形成有直接影响。据老一辈人回忆，这种风俗至少已有一百多年了。他们经常演奏的乐曲是流行的传统曲目，如《六板》、《三六》、《欢乐歌》、《云庆》、《四合》、《行街》等，同时也演奏当地流行的小调和歌曲。

《清客串》由演员们自愿参加，为至亲好友的喜庆事义务演奏，不取报酬，具有清高和宾客会串的意义，因而得名。大多数演员是城镇或农村的业余爱好者，他们自备乐器，扎上龙凤、彩珠、彩球，挂上五彩排须等美观的装饰，接受喜庆亲友们的邀请，去演奏助兴。

《清客串》的乐队演奏形式，大多是在街上花轿或彩车前面，列队进行。《行街四合》一曲(简称《行街》)的名称，即由此而来。

《清客串》也在室内演奏，于筵席终了后，在厅堂中摆开演出场面，围坐演奏。也有应贺客们请求，加上曲艺演唱，增添热闹气氛的。这种《清客串》队伍为数不多，为了适应旧社会大城市日益增长的需要，于是产生了职业性的《清客串》，那就面貌不同了。

## 五、乐曲的产生

《六板》和《三六》常为江南地区民间苏滩、弹词等用作器乐前奏曲。《六板》，又名《老六板》、《老八板》，清嘉庆年间，蒙古族文人容斋著的北方民间合奏乐谱《弦索十三套》的《十六板》中已有记载。书中称这些乐曲为古曲，因为宋朝时代，它已在北

方民间流行。例如五台山僧寺中流传的宋朝乐谱(八板儿),即现代的《老六板》,或称《八板》,开头一句记作“乙乙工四合”,就是现在工尺谱中的“工工四尺上”,亦即简谱中的“33 621”,只是调式不同耳。一九六二年十月李重光编写的《乐理知识》一书中有此记载。

《三六》是由小曲发展而成的组曲。一八九五年出版的《李芳园琵琶谱》中这首乐曲,经文人加工分为三段,冠以小标题《寒山绿萼》、《姗姗绿影》、《三叠梅花》,结尾加注《春光好》等,并改称为《梅花三弄》。原曲早已在民间流传。

## 六、丝竹社团的初次出现

鸦片战争后,上海经济畸形发展,成为江南地区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民间音乐也随之发达。由于市区的音乐合奏是在室内演奏的,所以完全摒弃了锣鼓,只用丝竹乐器加上少量的打击乐器来演奏,在演奏技巧和对乐曲的再创造等方面,都有显著提高,而农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保持早期锣鼓丝竹的形式。

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在上海福州路文明雅集茶楼里出现了第一次丝竹集会,乐师都是爱好音乐的老茶客,他们自带乐器,每周定期聚会合奏,作为消遣。此时,上海地区的丝竹音乐正式成为一个乐种。其标志是:(一)乐队的组合形式和演奏风格基本相同。(二)乐师定期聚会,活动地点大都在茶室等公共场所。(三)掌握了一批曲目,如《六板》与由《六板》变奏而成的《花六板》和《中花六板》以及《三六》放慢加花而成的《花

三六》，由《四合》片断变化而成的《云庆》和《行街四合》，还有由《三六》与《四合》段落联系而成的《四合如意》，由民间小调变化而成的《欢乐歌》，等等。目前所说的江南丝竹就是指这些。

### 七、八大乐曲初步定名

江南丝竹通常号称八大名曲。它们是《中花六板》，《欢乐歌》、《三六》、《云庆》、《行街》、《慢六板》、《慢三六》、《四合如意》(简称《桥》)等。这八大曲基本上是由流行在上海地区的民间小曲和器乐曲逐渐发展而成的。据老艺人传说，《六板》之所以定名，因为此曲共有六十记板，即六十拍，《三六》有三百六十记板，因此得名。《欢乐歌》在基督教赞美诗中也有，我在教会学校读书时，唱过这首歌，考其曲调，完全相似，那是赞美诗抄袭丝竹曲调填上词句的。

### 八、丝竹乐队的组织

丝竹乐队以笛子、二胡领奏，此外，有箫、笙、琵琶、三弦、扬琴和打击乐器和板鼓，这种鼓在丝竹中称为荸荠鼓。后来又增加了秦琴、中胡、阮等乐器。合奏时，各种乐器在每小时拍子上所奏的音几乎完全一致。其他部分则可就乐器性能和演奏技巧即兴发挥，造成一种音响丰富多声部的支声复调效果，给予听众悦耳的艺术享受。

一九一五年上海浙江中路成立“钧天集”丝竹会，民间艺人许仙、张志翔、金忠兴、周星宝等传授乐艺，对当时音乐界影响较大。一九一七年，南京路劝工银行成立了以银行职工为主

要成员的音乐团体“清平集”。以后，市区的民间音乐界分成两派：一派以奏丝竹、滩簧(沪剧前身)和时调为主，称为俗乐派；另一派以研究古琴、琵琶和古乐曲改编的丝弦合奏乐为主，称为雅乐派。前者有“同声社”、“群学会”、“乐林国乐社”、“云和国乐社”和浦东农村中的“梅友国乐社”、“听松国乐社”等；后者以一九一七年成立的“国乐研究社”及一九一八年成立的“大同乐会”影响最大。

当时，丝竹乐最有代表性的集会地点是上海城隍庙中的春风得意楼茶馆，市内各区和市郊各社及苏南、浙西一带的丝竹爱好者，常在此楼汇集，彼此学习交流。上海地区音乐社团的出现，大大推动了音乐艺术的发展，爱好丝竹音乐者也迅速增加，据老艺人回忆，当时经常演奏丝竹音乐的有七八百人。

### 九、丝竹音乐的不同倾向

五四运动前夕，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形成和发展的江南丝竹音乐，一开始就带有反封建的色彩，完全不同于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旧礼乐。它的音调来自民间，具有明朗、欢快、健康向上的气氛，人民大众把它称为“国乐”，作为抵制西方靡靡之音的一种抗衡力量。另一方面，由于参加丝竹演奏活动的主要成员是市区的中下层市民，他们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社会地位不稳定，向往安定富裕的生活，在音乐上反映则是将乐曲一再放慢加花，追求幽闲雅致的情趣，因此往往带有脱离现实的倾向。

## 十、丝竹乐谱的出现

一九一九年，上海梅溪小学音乐教师周石增编印的《国声集》，是研究上海民间音乐的重要资料。书中刊载了当时上海地区流行的丝竹乐曲、时调、苏滩和昆曲等乐谱，与原始曲调相仿，为今天我们研究这些乐曲的来龙去脉提供了方便。通过对曲谱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乐曲的演变情况和彼此之间的关系。

一九四九年八月，民间艺人金筱伯编印的《中国古乐曲谱集成》，刊载了丝竹音乐的主要乐曲及《鹧鸪飞》、《阳八曲》等民间乐曲共二十三首。

解放后，打破了传统保守观念，出现了音乐上雅俗合流及各地兄弟乐种相互交流学习的新局面，使丝竹乐队的曲目更为丰富。如由琵琶谱《浔阳夜月》改编的合奏曲《春江花月夜》，杭州名曲《霓裳曲》、《灯月交辉》，广东音乐《平湖秋月》、《走马英雄》，福建大埔乐曲《采茶调》，潮州乐曲《暹罗诗》等，都是常奏的节目。

## 十一、丝竹音乐的挫折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邮务工会国乐组发起，组织全市业余音乐社团，为救济难民举行募捐播音大会。上海沦陷后，丝竹音乐日趋衰落，这个时期抱着爱国热忱而聚会合奏的乐师，为避免敌人干扰，转向柔婉徐缓的缠绵哀怨的曲调，使丝竹音乐脱离现实的倾向更加严重。抗战胜利后的几年

中，黄色歌曲与爵士音乐在上海风靡一时，江南土生土长的丝竹音乐，则遭到轻视和排挤，到城隍庙茶室去的音乐爱好者只有少数老人。

## 十二、江南丝竹八大曲的定型

一九四三年前后，上海新世界游乐场有人以商会国乐会的名义，设立了一个音乐游艺场所。场内有八个牌子写上曲名，顺次插立，凡能奏这些乐曲的游客可以参加合奏（八首曲子的名称已在前面载述）。从此，丝竹八大曲的名称更加固定。其实丝竹音乐不止八大曲，如《花六板》、《快六板》、《乌夜啼》、《月落》、《苏桥》等曲，都未列入，今后是否可以列入，尚待丝竹爱好者共同研究。

## 十三、江南丝竹的特点

江南丝竹演奏时，所有乐器都能充分发挥各自的特点，强弱交错、相互配合，增添了乐曲的厚度和色彩，并使乐曲有一种多声部的效果，从而丰富和加强了乐曲的表现力。这种特点在《中花六板》一曲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各种乐器相互间配合默契，乐曲句读的段落衔接自如，民间特有的你简我繁、我简你繁的演奏方法运用得恰到好处，可以说达到了完美的艺术境地。

我写本文承各位江南丝竹老友大力支持，谨向陆春龄、陈永禄、金祖礼、施济康、陆德华、丁力等同志表示感谢。

### 江南丝竹社、团表

社团名称	成立日期	负责人	主要会员	地 址
钧天集	1915	袁仲尧	蔡子伟、张志翔、金忠兴、许仙、周星宝、倪璠耀等	上海浙江中路 宁波路
中华俭德会国乐组 (原名俭德储蓄会国社)	1916	沈公谦 1920年后由程午嘉、张萍舟负责	吴桐初、郑若荪、吴国梁、陈葆藩、陈葆元、俞光芝、俞光昌、吴晨良等一二十人	天目路俭德里， 1920年前后迁入福生路，该会自建高大楼房
清平集团乐社	1917	楼向如	王云甫、任梅知、柏寿生、王逸才、徐念椿等十余人	南京路劝工银行
国声集	1918	周石僧		
雅歌集国乐社	1918	蔡子伟	袁仲尧、张励生、张志翔	芝罘路
大同乐会	1918	郑谨文	汪煜庭、柳尧章、卫仲乐、秦鹏章、许光毅、程午嘉等	嵩山路 44 号
群乐国乐社	1919	周石僧	周国祥等人	南市城内周玉麟家
乐林国乐社	1923	金祖礼、蔡金台等	许仙、张志翔任编导，社员有苏泳新等	上海城内淘沙李廷松家
华光乐社	1923	王巽之	杨荫博、严工上、严固凡、吴振平、陈葆藩、陈葆元、金祖礼、郑若荪、朱文彬等	
少年宣讲团国乐组	1923	汪龙超	吴桐初、张萍舟、蔡金台、俞光芝、俞光昌、杨清磐等	嵩山路 35 号
云和国乐社	1925	陈永禄	金祖礼、许雅勤、陈永年、唐纪香、吴国梁、金培根、朱文振、胡贤俊、闵华露、闵华玉、张征明、刘中、周国祥、赵甫庸、石泉、屠橡根、王伯祥、张嘉福、诸国兴、顾进余、张根发	爱多亚路多福里 46 号
友声旅行团国乐部	1923	周俊卿	张励生、张志祥、蔡子伟、袁仲尧、金筱伯、李林根、姚涵勤、周惠、周皓	牛庄路 47 号， 后迁黄陂路
民间国乐会	1924	许光毅	陆春龄、林律等	



(续表)

社团名称	成立日期	负责人	主要会员	地址
华联国乐会国乐组	1926	顾秉尧、金祖礼、金筱伯、马桓章等辅导	顾启华、顾启骊、康铸新、金培根、赵甫庸、刘中、唐纪香、柏瑞生	
紫韵国乐社	1937	周晋陞	朱少梅、姚守梅、顾凤祥、顾金林、纪友良、丁章根、施济康、王士亢、瞿斌	北四川路白保罗路
中国国乐团	1943	陆春龄	陆春龄、林律、袁瑞卿、尹效翔等	后迁泰山路钱家塘陆家
梅友国乐社	1928	李林根	郑克昌、石维泉、王赞廷、沈福根等	浦东
公余国乐社	1930	周晋陞	李林根、姚守梅、瞿斌	闸北童家浜
上海国乐研究会	1941	孙裕德	陈重、陈大为、陆印陶、周惠、周皓、陆振宇、高志远、王乙珉、祖英等	
商会国乐会	1941	薛孝慈		在新世界
中国管弦乐团	1949	卫仲乐、许光毅、金祖礼、姚学勤、马桓章辅导	龚万里、张仁德、高亨、谢德熙、朱安祥、厉不害、陆德华、叶德灿、张金溢、虞子初	

附记：

此外还有各区茶楼的丝竹集会，如杨浦区“虹镇茶楼”，主持人朱少梅（茶楼主人）、笛子名手；沪西徐家汇彩云楼，有朱林根、汤家宝、潘季发、汤龙宝等；豫园“春风得意楼”，主持人袁仲尧、蔡子炜；闸北天目路火车站“月华楼茶室”，有吴华生、蔡阿兰等。其中规模最大者为春风得意楼，外地比较著名的社团有：“吴平音乐团”，1929年成立，创办人项学臣，团员有陆修堂、张季让、姜守良等；无锡市“无锡钧天集”，主持人杨荫溥；无锡华光乐

会，杨荫浏；杭州市“正始社”，创办人王云程等；“国乐研究社”，吴毅臣、许我致；“乐风琴社”，主持人俞易堂、徐元白；“青年会国乐组”，王巽之、王元九。